

黄冈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黄冈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1998·黄州

明改革

好文史资料更好地服

协联络促进全市两个

建设

湖友凡 ■

主　　编　　徐又良
副 主 编　　彭仕雄　詹道喜
特约编审　　杨行义　万学华

封面设计　　余南轩
封面照片　　赵　毅
封面题字　　叶钟华

政协黄冈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1998·黄冈

序

黄冈位于湖北省东部，自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此设置郡治起，黄冈作为省、县间一级行政区，已有1600余年历史。

千百年来，黄冈人民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于改造自然的同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自古以来，黄冈就是人文集萃之地，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古代有医圣李时珍，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升，佛教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等，近现代有京剧奠基人余三胜，民主战士、诗人闻一多，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等，他们在各自历史舞台上大展风采，为祖国、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近百年来，黄冈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波澜壮阔，气壮山河，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诞生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其中有中共“一大”代表3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国家主席两位（李先念、代主席董必武），还有近10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二百多位。革命前辈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创立了非凡的功绩，他们的光辉业绩，彪炳青史，他们在黄冈留下的足迹，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由是观之，黄冈真可谓古圣今贤，名流先哲，代不乏人。

丰厚的人文资源是一笔巨大财富。市政协建立之后，高度重视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把征集、出版文史资料作为政协工作重要任务之一，要求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突出“三亲”特色，发扬求实精神，增强精品意识，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不断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据此，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经过近一年工作，征集到80篇、近40万字的初稿，范围较广，内容颇丰，然后从中选出31篇集辑本册，将境内部分有影响的人物和较突出的历史事件介绍给读者，以期增进读者对黄冈的了解与厚爱，爱这一方热土，爱这一方人民。

第一辑《黄冈文史资料》的顺利出版，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编辑过程中，得到各县市区政协、社会各界和印刷厂家的大力支持，还有许多同志热情来稿，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编辑文史资料，在许多地方历史已久，经验丰富，而在我们则是首次，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我们愿在以后的工作中提高、改进。

遵编者嘱，略书几句，权以为序。

周維新

一九九八年十月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科学巨匠李四光…… 詹卫东(1)
《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 …… 团风县政协文史委(11)
杰出的国学大师黄侃 …… 朱鸿考(15)
父亲梅龚彬的革命生涯 …… 梅向明　梅昌明　梅建明(23)
独飘一帜的著名作家废名 …… 徐耀宸(37)

民　国　人　物

居正重视教育的发展 …… 舒　徐(41)
饶汉祥生平纪略 ……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44)
纪振纲无私支援抗日 …… 陈凯文(48)

史　海　纵　横

李先念统战思想的历史见证 …… 詹道喜(54)
黄冈人投身黄埔军校为全省最多 …… 贺全斋(61)
鄂东走出的外交官 …… 杨行义(74)
鄂东清末留学生及其革命活动 …… 白战存(84)

名　人　剪　影

李贽讲学钓鱼台 …… 吴昌发(98)
京剧创始人之一——余三胜…… 毛志英　周　杰(100)

章水泉与武穴竹器……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104)

文 苑 天 地

浠水县博物馆搜集古籍纪事…… 王学晋 程 谦(108)
东坡赤壁诗社与《东坡赤壁诗词》…… 童怀章(113)
我所知道的黄梅戏…… 桂遇秋(123)
黄州现代民间绘画发展历程…… 熊明生(133)
珍贵的货币…… 詹道喜(144)

胜 迹 撷 英

鄂东革命历史第一镇——七里坪…… 黄树生(149)
禅宗古刹五祖寺…… 吴洪激(155)
稀世国宝——蔡山晋梅…… 雷 靖(160)
乌云朱迹 三楚奇观…… 陈凯文(164)
长江流域第一龙…… 洪 志(166)

热 土 采 风

田家镇的两次保卫战…… 程 仪(173)
蕲黄四十八寨丛谈…… 余彦文(178)
“雷池在黄梅龙感湖”的考证…… 李华白(187)
蕲春达城毛家嘴西周古遗址掘考…… 张梁森(191)
武穴理发业探源……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196)

往 事 回 眸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始末…… 吴子勋 万学华(204)
后 记…… (233)

科学巨匠李四光

黄冈回龙山，在中国近、现代剧烈动荡的百年里，不仅产生了革命家、军事家“林氏三兄弟”，而且产生了科学巨匠李四光。

居住在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回龙山镇东五里下张家塝的李氏家族，到了清代中晚期，尽管国运艰难，但李家的书香不废，连续产生了三代秀才——李四光的祖父、父亲、长兄。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诞生。父亲李卓侯给他命名仲揆。小仲揆聪颖好学，6岁就读于其父私塾启蒙。李卓侯对儿子倾注了八年的心血，传授他诸子百家之学；小仲揆对中国儒学的领悟几乎达到了出神出化的境地。李卓侯曾私下对人说：“我的老二应该比我家的三代秀才强。”

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只身赴武昌，报考南路高等小学堂，误将年龄“十四”填进姓名栏，就将“十”改为“李”，颇觉“李四”不雅，凝思间，见大厅中悬一横匾——光被四表，立受启示，在“四”后面加一“光”字，从此，用名李四光。

1904年，因成绩优秀，被送日本深造，在弘文学院习日语，后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在学好理工科知识的基础上，李四光还注重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对西方的新思潮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很感兴趣。

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活动，成为同盟会中年龄最小者，仅16岁。孙中山喜其年轻有志，亲书“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八字相

赠。

1910年，李四光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程师，后来又就教于武昌工业学校，并从事同盟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推翻清王朝。

1911年，清朝举行留学生廷试，李四光成绩列为“最优等”，被授予“工科进士”称号。清廷要他参入海军造船，他力陈教书传技更重要，终于返回武昌。就在这时，他受同盟会总部委托，积极联络“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组织成员，参与筹备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理财部参事，后任实业部长，他是当时军政府成员中最年轻的部长。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使振兴实业计划无法实施，他愤然辞职，中山先生叹惜痛失良才。

部长不当，回家事父说：“自己力量不够，造反不成，国家不兴，揆儿有耻，好在年龄不大，不如再读十年书，学会一套真本领，外抗列强侵略，内反专制压迫剥削。”在革命党人的共同关照和力争下，1913年7月，李四光享受公费赴英留学，时年24岁。

在英国，经一年大学预科学习后，1914年考入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兼听物理等课。1919年获硕士学位。是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李四光急切思归，为国效力。归程中，顺道法国、德国，当短期矿工，积资到瑞士与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作地质考察旅行。因此，他除精通日语、英语外，还学会了法语和德语。途经法国巴黎时，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现代繁荣与碳》的讲演，被中国同胞学人称为“真正讲学的精神”。为了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特地取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接到两份电报：一是英国老师鲍尔敦教授为印度某公司转聘他为待遇优厚的工程师；一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为新成立的地质学教授。他谢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听从祖国的召唤，1920年回国任北

大地质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创建中国地质工程的艰难而宏伟的光辉事业。

1921 年，任北京大学庶务主任和地质系主任，次年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同年，筹建中国地质学会，被选为副会长。此后 50 年间，历任该会会长或理事长。在北京大学六年多时间，主讲“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等课程。

他重课堂讲授，也重野外考察，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为其研究古生物，发现中国第四纪冰川，创建地质力学奠定了基础。他研究中国的蜓科化石，见其形似纺筵，想到中国妇女纺线把纺筵称做“筵子”，就在“筵”字左旁加上“虫”字，创造了“蜓”字。通过研究蜓科，对当时含混不清的石灰二叠纪地层重新进行了划分，其划分标准，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在北大期间，经刻苦钻研写成《中国北部之蜓科》一文，并以此文于 1927 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1921 年，李四光赴太行山东部进行野外考察，发现冰川遗迹，随后发表了《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论文。此为中国首次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1926 年发表《地球表面现象变迁的主因》一文，提出“大陆东阀”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理论，这是创建地质力学理论的萌芽。

1927 年，李四光不满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蔡元培一道南下声援北伐革命。在南京、上海筹建中央研究院，并任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北伐军攻克武昌，李四光就奔赴湖北，建议武汉国民政府把原武昌大学、武昌商科大学、医科大学合并成综合性的武汉大学，实施“科教兴国与革命并行发展”之策。这一建议被武汉国民政府及时采纳实施，并委任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他考察校址选准喻家山（与闻一多商议改名为珞珈山），对设计图纸，一一审定。1929 年武汉大学正式开学，李四光到校致贺

词，热望教育和科技成为国家振兴的开路先锋。

当本世纪石油勃兴成为主要能源时，中国当时工业落后，确实没有采到多少油；二十世纪初，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勘探石油失败。从此，“中国贫油论”逐渐传开。1928年，李四光发表《古生代后大陆上海水进退之规程》和《燃料的问题》。在后一篇文章里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首先驳斥了“中国贫油论”，为国人渴望石油振兴民族精神注进了新认识。

1934年，李四光应邀前往英国伯明翰、剑桥等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指出“在新华夏系的沉降带内，如用地震的方法，在华北平原进行勘探，可以探及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即石油……。”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李四光的科学观察是完全正确的。

三十年代初期，李四光在庐山、黄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写成了《扬子江下游第四冰期》一文，立时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外国教授巴尔博、德日进等人否认中国有第四纪冰川。为此，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前，于1934年3月，在庐山与外国一大批学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经过辩论，中国冰川学几乎建立起来了。1936年，李四光从英国讲学归来，又赴黄山、庐山考察冰川，先后发表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冰期之庐山》等著名论文。自此，中国第四纪冰川逐渐被世界公认，人们敬称李四光为“中国冰川之父”。李四光的“冰川学”研究成果证明：亚洲是人类的早期发源地之一。这对当时流行的“西欧文化东渐论”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理性上的有力打击。因为持这种观点的西方“文明”人认为：亚洲自古落后，其文化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派生的，以此来为帝国主义侵略东方国家制造舆论。李四光在中国近代首先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者研究相互结合起来，为中国建立新的边缘科学埋下了奠基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四光以对庐山地质情况较熟之便，将地质

研究所搬到庐山。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也跑上了庐山。不久，蒋以商讨抗日为名，召见教授、学者。时人多以“庐山召见”为荣，而李四光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送请贴的人捎话蒋介石：我是老同盟会员，不受任何人召见，断然拒绝召见。武汉失守，蒋介石躲到重庆，李四光不愿与蒋介石同道，以“重庆机关太多，广西文化落后，迁几个学术机关去有好处”为由，将地质研究所迁到桂林，后因日机轰炸市区，又迁良丰。1941 年，迁到良丰的广西大学学生因不满中统特务高扬任校长而罢课，100 多名学生遭逮捕。李四光以著名学者的身份，三次找高扬交涉，营救被捕学生出狱。学生们一致要求他出任校长，经再三婉言解释，才作罢。因此事，中统特务扬言要加害于他。经友人劝说，暂避居于架桥岭乡间。先后到川东、鄂西、黔东、桂北等地考察地质构造和第四纪冰川遗迹。途经湖南资兴县时，在各界欢迎大会上作了《沧海变化的解释》等讲演。为纪念这次讲演，资兴县中学将其下榻处命名为“四光楼”。到福建长汀考察地质时，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这门边缘新学科的命名。

1942 年，他的得意学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朱森教授，被人诬告多领购 5 斗平价米，明令“停职追米”。朱森一气之下，胃病发作，不治身亡。李四光深为悲痛，为纪念朱森，将新发现的“有孔虫化石”命名为“朱森蠙”，并在《南岭何在》一文前写下了《悼子元》(朱森字子元)诗一首：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现，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厉蒙全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1944 年秋，日寇侵入广西。李四光将地质研究所迁至贵阳洛湾，后迁重庆。因长期颠沛流离，抵渝后患心脏病。住北碚北温泉，

一面养病，一面就近考察地质，还在重庆大学讲学，并写成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他从运动的观点出发，去探索地质现象的本质，地壳结构及构造规律，提出与西方传统地质学不同的新学说，建立了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尽管这一理论在当时国难当头无法实施，但后来对我国的石油探测和地震预报，有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抗战期间，连续六七年，中央研究院每年在渝召开一次院务会议。会后，蒋介石总要宴请与会人员，以装潢门面。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提前离渝，拒绝赴宴。但在重庆期间，他却两次会见了周恩来。他对家人和友人说："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日本投降后，李四光立即派人到南京接收了原来地质研究所的房子并开展了工作。1946 年夏，他离渝赴沪，不久转杭州小住，继续养病和从事科研，写成了《新华夏海的起源》一文，这是他对地壳结构及构造规律和古生物化石研究的重要成果。

1947 年"五二 0 惨案"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非法逮捕。李四光闻讯后出面交涉，要求立即予以释放。交涉未成，于子三被杀害于狱中。他对于子三之不幸非常悲痛，向新闻记者披露："中国没有民主！"。就在这一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李四光哲学博士学位。

1948 年应邀前往美国，出席第 18 届国际地质年会。会后转程英国，在南部海滨城市博恩养病，在病中他时时默思祖国的前途。11 月初，看到英国报载沈阳解放的消息，知道祖国快要解放，马上预订船票（因当时船票需要提前半年预订），作好回国准备。在计划启程的前一个月，国民党驻英大使馆要他发表声明，拒绝中共安排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送往台湾。李四光决定只身提前秘密起程，并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一封信，劝其不要一误再

误，继续为蒋介石集团效劳。他退掉原订船票，从不被人注意的货船港普利茅斯动身，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到瑞士，甩掉了跟踪监视的特务，到巴塞尔城与夫人许淑彬会合，再转意大利，12 月 25 日，由热那亚港乘船回国。为纪念印度古植物学家萨尼逝世一周年，他在船上写成著名论文《受到歪曲的亚洲大陆》。

1950 年 5 月 6 日，李四光抵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往六国饭店看望，拉着他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祖国需要你啊！"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1952 年 9 月，地质部成立，出任地质部长。他调整机构，部署力量，使中国地质工作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正轨。五十年代，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寻找石油，摘掉了"中国贫油论"的帽子。毛泽东主席称赞他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就是对他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年过花甲的李四光，虽身患多种疾病，但精神焕发，不知疲倦地工作。1955 年夏，在大连养病，到附近白云山考察地质，发现了一个小型旋卷构造，当即写成了《莲花状构造》一文，丰富了地质力学的理论和佐证。他在做了左肾切除手术后，利用 1959 年和 1961 年两次到青岛养病的机会，写成了《地质力学概论》这部代表作。这是对过去地质力学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其科学性更为严密，其天体哲学、地质哲学的许多新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的启示下获得的新成果。

1958 年 12 月，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 年，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他除了担任科学院、地质部行政领导工作外，还被选为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世界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副主席、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等。他虽身兼多职，工作繁忙，但从不放下科研活动。他兼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把自己的住宅和研究室连建

在一起，便于了解情况，指导研究。他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陈放有多年收集的冰川和地质力学的石头标本，成了科研场所。

李四光晚年对我国地震防震和地下热能的开发利用工作特别重视，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1966 年 3 月 8 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后，亲赴现场观察，了解地应力站的工作情况。他主张用地应力测量方法解决地震预报问题。1967 年冬，冒着严寒，亲自到房山，站在风口上，脱掉棉手套，握住冰冷的铁手炳进行操作，做“地应力解除”试验。他认为“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是可以预报的”。1970 年 10 月，已是 81 岁高龄的李老，亲自到天津视察地热综合利用情况。后又到延庆、密云等地观察地下水位、调查断裂带和微量位移观察站工作。好象要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中国所有的地质难题。有趣的是：这一年他还写成了毛泽东主席向他索要多年的、属于他自己认识的自然科学知识读本《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毛主席如获至宝，读了、看了、眉批了，还要请他来向他再请教。

1971 的 4 月，他在生命垂危时，仍念念不忘工作。28 日晚，他在医院嘱咐秘书第二天早晨一定要把全国大地图带去，并说：“我只要在医院还能活半年时间，组织人力，我有信心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不幸的是，29 日上午 8 时半，我国近现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享年 82 岁。5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亲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号召大家继承他的事业，发展他的学说。周总理指出：“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是爱国的科学家、革命的科学家，入党晚了一些，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政治上不是动动摇摇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詹卫东

《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

1901年初春的一天，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王家坊乡一个农民的家庭里，诞生了一个婴孩，他就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

王亚南3岁丧母，12岁丧父。好在长兄对他疼爱有加。6岁入私塾，哥弟同读。农忙时，哥哥让亚南在田边读书。父亲逝后，哥哥辞学，力保亚南弟读书成才。

幼年王亚南在家乡奋读中，有两位启蒙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鄢文卿，一位是汪孟仙。鄢先生教他格致新学，汪先生教他古文。两位老师谆谆善诱，给王亚南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因此，王亚南对鄢、汪二位老师的尊敬伴随终身。建国后一直每月向两位先生接济10元生活费，直至两老去世。

1910年，亚南父亲仰慕李卓侯（李四光的父亲）先生的学问，把10岁的亚南送到回龙的亲戚家，拜读于李卓侯先生。12岁的王亚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州高等小学堂读书。从此，他对黄州赤壁发生了兴趣，利用课余时间抄录赤壁碑文。每当放寒暑假，他都要伏案夜读，练习诗文。在黄州奋读4年，学业独占榜首。

1916年，王亚南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第一中学，1922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在大学里，王亚南争分夺秒，晚上到10里外的地方当家庭英语老师挣几个钱补贴生活费用。平时，他总是带着笔记本，钻进图书馆抄抄写写。他读书的兴趣很广，哲学、政治、经

济、法律、教育、历史、文艺、诗文、小说无所不及，古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都有涉猎。1926年7月，王亚南大学毕业。

这时，大革命如火如荼。热血沸腾的王亚南于1927年初，毅然只身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任政治教员。“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王亚南目睹与他共同战斗的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在“清党”中遇难。他愤然离开长沙，去寻找新的出路。

1928年初，他离开长沙，经武汉转上海，均未谋到职业。因生活所迫，流寓杭州大佛寺，以写小说谋生。一天，王亚南蹲在大佛寺院里纳闷，迎面走来一位书生，两人互叙身世，亲热异常。原来这位青年是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的郭大力，也因谋职业无路而寄居在大佛寺内。两位热血青年，文化素养和境遇相同，很快结为至交，从此，两人形影不离，不是谈论个人抱负，就是讨论政治、经济、哲学等问题。两人互换了所有的携带之书进行阅读，郭大力又在外面借了一些书回来互看。大佛寺的主持和尚受了感动，主动为两位青年的斋饭加足了份量，并建议他们为佛寺的经文整理作一些工作，以获取庙产的一些收入，为生活和学习筹集一点经费；并许诺找不到工作可以一直寄寓大佛寺，甚至走了以后遇到困难也可以再来。在郭大力的影响和帮助下，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他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大力建议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正合王亚南的心愿。但因生活所迫，没有经费，两人商量决定：暂时分手，寻找工作，筹集经费，收集资料，保持联系，分担任务，着手翻译，一二年后，会合汇总，完成《资本论》翻译工作。议决之后，郭大力返回上海任教，王亚南继续在大佛寺寓住一段时日。1929年初，王亚南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深造。

王亚南在留日期间，涉猎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方面的书籍，注重研究了西方传到日本的各种思想流派的

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尤其对马克思主义更为关注。这时，日本军国主义正大肆进行仇华的反动宣传，中国人在日本很受欺凌，王亚南痛在身上、气在心里。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亚南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起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游行完毕，愤然回国，投入到抗日斗争洪流中。王亚南首先到达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并兼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时，他与郭大力取得了联系，着手合作翻译《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1932 年译著出版。当人们得知大卫·李嘉图这部扛鼎之作的译者，原来是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时，无不为之震动。初次的成功，鼓舞着王亚南更加珍惜时光，迎难而上。此后的两年间，他和郭大力合译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他自己著述的《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初露头角。

1932 年，国民党军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举行了“一二八”抗战，但因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牺牲了抗战成果。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动了反蒋救国的“闽变”，王亚南离开上海赴福州，投入了反蒋救国的革命行列，任革命政府文化委员兼《人民日报》社长。他拿起笔撰写文章，揭露蒋介石罪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不久，蒋介石勾结日本，夹攻十九路军，“闽变”失败。王亚南遭通缉。这时，王亚南取道香港赴欧洲，在德国柏林一面学习德语，一面进行社会考察，搜集西方经济学资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旅德的一年中，翻译了奈特的《欧洲经济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著作。

1935 年，王亚南离开德国柏林，经英国，到日本，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两人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商定正式翻译《资本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名著谈何容易，

最大的困难是《资本论》中的一些名词概念在中文字典、辞典中查找不到，而这些名词中国绝大多数读者看不懂，这可以说是一次再创作。王亚南怀着对事业的追求，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跑遍了上海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第一个钻进阅览室；中午啃点干粮，直到图书馆闭门才离开。在他的房间里，桌上摆满了英文书籍、笔记本和字典、辞典；每当人们甜卧梦乡的时候，他却用冷水洗洗头，挑灯笔耕。星移斗转，冬去春来，经过长达3年的努力，1938年秋，《资本论》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国经济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资本论》像一把冲天的火炬，燃烧着旧中国腐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又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给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力量，给了中国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的心声。

王亚南抢译完《资本论》后，上海就在日军的炮火下沦陷了。王亚南离沪经香港到武汉，参加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王亚南又离开武汉经湖南、广西、贵州转到重庆。王亚南通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关照，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沿途宣传抗日救国。董必武对他努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

1940年，王亚南应聘到粤湘交界的坪石镇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除了从事教学工作外，还创办并主编《经济科学》杂志，撰写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本书是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代表作之一。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慕名来坪石镇访王亚南，畅谈中国官僚政治问题。事后，他又写出一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王亚南在中山大学讲抗日救国，讲授马列主义经济理论，鼓励、支持进步学生，受到广大师

生的尊敬，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王亚南常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但他不屑一顾，仍泰然自若。一次，他收到一封信，信里装着一颗子弹。他气愤地骂国民党当局："卑鄙！"。

1944年，王亚南离开中山大学，赴福建临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创办了《社会科学》杂志，撰写了《中国经济丛书》和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并于1946年集印为《社会科学新论》一书出版。

1947年，王亚南应聘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讲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学史。1948年，厦门大学聘王亚南为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极为关注王亚南。1951年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指着王亚南向毛泽东介绍："这就是《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毛泽东当即握手说："我读的就是你的译本。"党和国家全力支持王亚南的经济科学研究。他全力从事高等学校经济学说史教材的编写和经济科学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学派，对国内外经济学界、史学界有重大的影响。王亚南身兼数职，忙于科学研究和社会公益活动。先后任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1956年，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一生追求的夙愿。1957年年底至1958年初，率中国教育专家组赴缅甸工作3个月，为中缅人民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王亚南在中国现代学界被称为"奋斗的学者"，他一生勤索苦探，写的笔记本存留的就有3大箱；他学识渊博，著作宏丰，计有译作、著作41部，论文334篇。这些著作论文，字字句句浸透着一代

学者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风貌。1969年11月13日，因患癌症逝世，享年68岁。

□团风县政协文史委

杰出的国学大师黄侃

蕲春，山川毓秀，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是饮誉海内外的教授县，境内北部，青石岭地带有一个地貌奇特、景色迷人的山村——黄家村。该村座落在靠椅山下，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村后两棵千年隔河相望的古樟，枝繁叶茂，矗立云天；村口镶嵌着一个形似海砚的池塘，池水长流，终年不枯；离村北面和西面，约五、六十米远处，白水河和蕲河两条秀水，宛若碧绿的彩带，在此地交汇，清浅的河水，转过急弯，缓缓朝南流去。村子对面，有一座水形山，名叫笔架山，佳木葱茏，蕙草英蕤，风景十分秀丽。我国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就长眠在这块风水宝地笔架山麓南面的“燕子捕梁”山中。

黄侃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国学教育家、声韵训诂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是章(太炎)、黄(侃)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1886 年 4 月 3 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金玉街三道会馆，原名齐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字季刚，一字季子，晚年号量守居士。1935 年 10 月 8 日卒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享年 50 岁。

黄侃先生出身书香官宦之家。其父黄云鹄(字翔云)曾中清朝咸丰年间二甲进士，先后历任成都府知府、四川盐茶道、四川省按察使等要职。他虽为清朝重臣，但能体察民情，为官清正廉洁，被川民颂为“黄青天”，并以文章显名于咸丰、同治年间，著述甚多。黄侃

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家父渊博的知识，对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黄先生少承家学，读书多神悟，3岁即从江叔海（名瀚）先生问字，初授《论语》，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4岁随父游武侯祠，见壁联，便过目不忘，父问他：你能记住壁上的联语吗？黄侃即朗声背诵数联。人以其早慧，皆呼为圣童。6岁时，黄侃随家迁住南京，值家用缺乏，奉生母周孺人命寄书自状，作了一首诗云："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真是才智过人，出语不凡。父母喜形于色，实指望日后儿子成龙。是故，其父以书勉励他："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先生禀承父言，利用家藏的丰富典籍，日居"归学处"，博览经史诗书，诸子百家，其学早成，15岁时便应试考上了秀才，17岁入文普通学堂深造，与宋教仁、董必武，查光佛、陈锟等志士同学。时黄兴（克强）肄业于武昌两湖书院，由宋教仁介绍，先生与黄兴结识，遂成莫逆之交。三人志同道合，心怀天下，见国势危弱，尝怀愤慨，奋然宣传革命，主张排满，在学堂中密造舆论。堂监李贡三闻之惊惧，先生被开除学籍。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先生为"故人之子"，又惜其才，便以官费资助，送他去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读书。

黄侃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少怀壮志，博览群书，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在《上留田行·序》中云："予年十四，始读《黄书》（王夫之著），由是以得春秋之大义。"尔后，他饱经世变，目睹"甲午风云"，败于日本，"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割地赔款，豆剖瓜分中华，危机四伏，国势衰危，民怨载道，思之义愤填膺，并清醒地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救人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求图强复兴之路，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5年，先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思想活跃，秘密结社，活动频繁，在异国与学友宋教仁相逢，情投意合，鼓吹革命，如云龙风虎，时日不久，

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主《民报》社。当时，章太炎为《民报》社长，许多留学生集章君门下请业。一日，黄侃随众往谒，看见壁间的联语："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东汉戴良语）便退出章舍，心中颇疑章太炎俯视一切，难与接近，不想再往。后来章太炎在《民报》上看到笔名运甓、不佞、信川等写的论文：《专一之驱满主义》、《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释侠》、《哀太平天国》、《哀贫民》等文，大奇之，即以书相约。书辞有"知君为天下奇才"之语，黄侃先生才应约投章太炎门下，后拜章为师，受其师训，并共谋革命大事。这一时期，先生的政论和时评文章，其矛头直指推翻清王朝，如在《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中，他号召，"兴兵伐罪之业，在吾国人之一心"，"甘殉驱满主义而不悔"，只有这样，才能推翻清政府，拯救"汉民之不亡"。在《哀贫民》一文中，他无情地揭露了广大农民贫病交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天命，即封建礼教所说的"命"与"分"，而是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并提出农民要摆脱困境，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就必须起来造反，进行革命。这篇政论文说："我躬之贫，微我之旧，富人夺之，而我乃贫。非平之道，盍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真弗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哉贫民，曷兴乎来！"在《哀太平天国》一文中，他通过太平天国兴哀历史的回顾，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号召革命党人"仗太平之所志，而勿太平之所为"，肩负起推翻清王朝，拯救民族的历史重任，表现了一位民主革命家的卓识和大无畏的胆略。

黄侃先生不仅积极鼓吹革命，唤起国民，引导革命党人，而且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深入到火热的反清斗争的第一线。1910 年秋，湖北革命党人函请他回国，商讨共举大事之策，先生即返国抵汉。时值湖南萍乡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离课起事，先生审时度势，

认为武汉革命力量单薄，时机尚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应吸取湖南萍乡教训，眼下最重要的是宣传发动民众，组织力量，扩大队伍，嘱友人发刊报纸，激扬民气。此后，他往来于武汉、蕲春之间，甚至不辞跋涉之苦，深入大别山区，召集群众，宣传民族大义，国家危急，积极筹设“孝义会”组织，号召百姓，揭竿而起推翻清王朝。经先生奔走呼号，苦心经营，蕲春、浠水、英山、金寨、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8县的志士仁人和贫民百姓，纷纷响应，众至数万，共推戴黄侃先生，称“黄十公子”。

1911年7月25日，黄侃经开封回到武汉，《大江报》社长詹大悲设宴招待。酒后，大家谈论时政，评击现实，群情激愤，怒不可遏。黄侃痛斥立宪党人，无情揭露他们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是欺骗他人，充当保皇的丑恶嘴脸。当时他奋笔撰写了《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交给了詹大悲。翌晨（7月26日），该文发表在《大江报》上，文曰：“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都张贴有此文。凡阅过时评的人，皆为震惊，革命党人，为之一振，清庭鹰犬，如针芒在背，惶恐不安。顿时，武汉变成了一只即将爆发革命的火药桶。1911年10月10日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告捷，结束了满清296年的封建血腥统治。

武昌首义后，因刊载大乱一文而遭监禁的《大江报》社长詹大

悲被迎出狱。10月14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受命为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何海鸣、温楚珩、黄侃等人参与分府工作。时清军疯狂反扑，轮番围城，10月29日，清军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市区，黄侃与詹大悲、何海鸣等人组织新军，与之巷战数日，至11日1日拂晓前，终因孤军奋战，势单力薄而失败，汉口沦陷，他们3人同登一舟离开汉口。为复得汉口，詹、何、黄3人计议，决定分途求援，詹、何去上海，黄侃回蕲州。黄侃回蕲后，即四处加紧活动，联系革命党人，发动“孝义会”故旧，与方伯芸、汪翔云、陈楚香等志士，重组革命军，并议定：先取县城，夺军械，然后联系各县“孝义会”党人，引四路集中北上，攻敌后，以解汉口之危。因此举遭到当地士豪劣绅极力反对，并密告清军，敌闻讯派军队剿蕲，通缉黄侃。黄侃得信出走，辗转赴上海。

辛亥革命之后的局势，世乱如麻，军阀政客，争权夺利，日益频繁，宋教仁被杀，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太炎先生被监禁……都使黄侃先生忧心如焚，襟怀苍凉，感到政途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1913年，黄侃先生被直隶都督赵秉钧提携，抵天津，出任秘书长之职。两月后，辞职返沪。从此，他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承父师之业，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一意撰述，并主编上海《民声日报》。

但是，黄侃兴国爱族之心，仍然象一团暗火在燃烧着。他目睹外患日深，满目疮夷，百生苦难，时时烹煎着他的心。这百感萦怀的心情，常常倾吐在他的诗词文章中。如在《七律》癸丑十月(乱后始至南京作)诗所述：“道旁一望皆荒土，乱后重来似隔生。纷纷成败何须数，独为遗民诉不平。”又如《行路难》诗指出的那样：“十城荡荡九城空，大军过后生荆杞。恸哭秋原一片声，谁人不起乱离情！已知杀掠成常事，终羡共和是美名。游氛蔽天关塞黑，历京留滞归不得。谁令虎豹守天阊？坐见豺狼满中国。”忧国忧民，情溢纸上。特

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黄侃爱国热忱，形诸颜色，悲愤伤时之心，多发于吟咏之作：如《读史至靖康之事有感而作》七律诗中示：“天心人意两茫茫，时世何期似靖康？城闭言开终不听，师全地削倍堪伤。乞灵六甲皆儿戏，卖国三川足货郎。犹幸东西能退保，主和无用责汪黄。”寥寥56字，深刻地揭露蒋介石退让求和，卖国求安的嘴脸，表达了自己的政见和悲愤情怀。直至1935年10月8日，先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国事，询问家人说：“河北近况如何？”最后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他终因病发，抱恨而终，与世长辞。

黄侃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国学教育家。民国以后，他痛恨权奸窃国，目睹社会黑暗，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忧虑。但是，他手上并未握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权力，他认为自己要实现兴国爱族爱民之抱负，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继承和弘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启迪今人。他说：“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今日国家，第一为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为保全未来。”“现今自救救人之法，曰：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可见，黄侃先生将兴国爱族之心，寄托于治学与教育，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归宿了。

他治学严谨，造诣闳深，淹贯古今，著述硕丰，无愧是名播中外的国学大师。黄先生不仅苦读勤研，精通经史子集，而且才华横溢，独运匠心，对传统的语言字学，引申探微，见解精辟，推陈出新，自成系统，学术成就，无如伦比。今究其治学精神，可以概括有三个特点。第一，黄先生治学的思想十分明确。辛亥革命以后，他开始回到自己所喜爱的学术领域中。但是革命并没有使国家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挣脱出来，军阀混战，外患日深，国事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心总是系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上的，时时注视着时局的变幻，倍加忧心如焚，愁肠寸断。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学术看作是救国家民族，匡扶社稷民心的唯一办法。正如他说的那样：“学问当以四海为量，

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民主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肺腑之言，表白了他博大的胸怀，这就是他治学和教书育人的根本动力。这一点可以说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

师古而不固封，发明而不离宗，是黄侃先生治学的第二个特点。黄先生学习勤奋，展卷不休，凡大部头著作，从头至尾，圈读数遍，若遇故典有讹误，或读书有所得，即批注于书上。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提到：“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谈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数遍。”他还手批《白文十三经》、《说文解字》、《尔雅正名》等典籍近百部，功夫浩繁，态度不苟，标心托旨，吐纳风云。用黄先生总结心得的话说：“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察文义，而不必骤然通俗，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虽不可尽信，而无条件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为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诤。”“然则吾侪所务，必在去繁就简，去妄存真。”“师古而不为所役，趣新而不畔其规。”

开展学术研究，同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结合起来，这是黄侃先生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如前所述，黄先生认为：“刻苦为人，殷勤传学”是“现今自救救人之法”。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以教育事业为已任，以培养人才寄托于未来。是故，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高师、中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在执教期间，他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精心传道，授业门生，把学术研究同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新路。他言传身教，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极力推崇“不放松一字”精神，常常告诫学生：“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因而师从他的学生，多能刻苦自砺，勤奋研读。他还注重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不拘一格，

教导学生治经史子集典籍，必须先治小学，并开列小学书目 10 种及经史子集必读书目 20 种，以供学生平时研读。不仅如此，他经常约自己的门生到家中面授学识，切磋学问，常常秉烛夜教，直至达旦。他还注意不断改进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每每他个人研究学术有得，就增开新的课程。他授业讲课，即使他教过多次的课，每次重讲都增添有新的内容，所以学生反复听而不厌，学所新得，解义日深。在黄先生谆谆教诲下，象程干帆、潘重规、范文澜、许嘉璐、殷孟伦、陆宗达、黄焯、刘博平等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后来多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学者。黄先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育出了众多栋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黄侃先生英才早逝，使我国文坛失去了一位科学巨擘，令人万分哀痛。但他的光辉成就如高悬日月，将永照中华文化园地，孕育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他的事业和精神永存。

□朱鸿考

1998.4.25

父亲梅龚彬的革命生涯

父亲梅龚彬原名电龙，湖北省黄梅县人，1901年8月12日（农历辛丑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县城东门梅家新屋。

梅龚彬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为了谋求出路，从小就外出求学。他博览群书，热爱真理，学生时期就深入社会，广泛接触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的薰陶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逐步成长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7年至1920年，梅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1921年春，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是一所日本人办的高等学校。1926年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

他在中学时期就接受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参加学生宣传队到街头演讲。1924年秋，由贺昌和施存统（即施复亮）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恽代英和沈泽民。

他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期间，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是该校国民党基层组织的骨干。1924年，代表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学生会出席上海市学联大会，同年被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聘为宣传委员会委员。1924年底，被恽代英派往湖北，进行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传。在家乡黄梅宣传期间，帮助进步青年组织少年黄梅学会。

1925年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投入“五卅”运动，发动上海市

学生声援工人罢工斗争。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工商学联合会，参加了对上海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联络和指挥。

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的右翼分子追随西山会议派疯狂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上海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团结起来与右翼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地召开了国民党上海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梅龚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时间大约在1925年底。

1926年春，他放弃了由东亚同文书院保送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专职党务工作。1926年9月，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还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机关中的中共党团书记。后来，又任国民党苏浙皖沪四省市特别委员会委员。

1927年初，由于梅龚彬本人的请求，党组织将他调往武汉。先在汉口总工会任教育委员，后又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4月中旬，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任政治部主任。5月，随军北伐，北伐军在豫南击溃奉军后，6月下旬班师返回武汉。7月，梅原在的部队被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汪精卫调往九江。“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后，郭沫若、李一泯、阳翰笙和梅龚彬四人立即离开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

1927年8月4日傍晚，梅抵达南昌，被编入叶挺的部队。在第十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任指导员(即团政委)。5日清晨，他同团长刘明夏一起率七十一团撤离南昌，向广东潮汕地区挺进。部队经过赣南会昌时，突破敌军堵截，继续向南行军。起义军进入潮汕地区时，尚未立稳，被优势敌军包围于汤坑(广东省丰顺县)。激烈的战斗使起义军受到严重的损失。10月初，七十一团在流沙(广东省普宁县)被打散，与前敌指挥部失去联系。在紧急关头，梅和刘团

长立即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重新聚集起来的队伍经过整编开赴海陆丰地区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梅、刘二人则按照前委和南方局的部署，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潜入汕头，然后由海路取道香港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1927年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见夏曦和梅龚彬，宣布中央关于改组中共浙江省委的决定。新的浙江省委由夏曦任书记，梅龚彬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周恩来指示他们在浙江发动武装暴动，以响应浙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梅协助夏曦将已遭破坏的浙江省委机关恢复起来并将它从杭州迁往宁波，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指挥部。武装暴动虽然于1928年春在浙东奉化发动起来了，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盲动错误，最后因寡不敌众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但是，英勇的共产党人在浙东播下革命种子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8年6月，夏曦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梅龚彬代理他主持省委工作，而梅则请求中央另行安排合适的工作。1928年8月，中共中央将梅调回上海。

梅回到上海后，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秋至1929年夏，一边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参与编写《社会科学词典》，还经常为《北新》杂志撰写论述国际问题的稿件。

1929年8月初，中共中央要派一名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去东京执行重要任务，周恩来向中央推荐梅龚彬前往日本。临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向梅交代了具体任务。8月7日梅告别了家人，冒充留日学生高乔平，登轮东渡。

8月16日，梅去东京上野的一个牙医诊所同日共联络员接头时，因接头地点已遭日本特务破坏而被日本警察逮捕。面对酷刑，他毫不畏惧，沉着机智地同日本法西斯当局作斗争，保住了党的重

要机密，挫败了日本法西斯当局制造“第三国际颠覆案”的阴谋。1930年12月15日，梅龚彬出狱，恢复自由。

由于法西斯酷刑和监狱生活的摧残，梅的身体极其衰弱，需要治疗和休息。他接受了友人的安排，出狱后在东京休养了半年。在东京休养期间，结识了正在东京进行访问的胡秋原。胡秋原建议他回国后为上海神州国光社撰稿，梅表示同意。

1931年5月，梅在东京收到我母亲龚冰若从上海寄去的回国旅费，心中万分激动。他知道，党在召唤他，他又能献身于祖国的革命事业了。梅的归国费用确实是党组织提供的。那是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交给龚冰若寄的。6月，梅启程回国，7月，经天津回到上海向陈云作详细汇报。陈云当时代表中央，向他布置一项重要任务，以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非党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

梅抵达上海后，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仍旧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不过，这时他转为秘密党员，只能同党组织指定的同志取得联系。还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不再以左翼文化人士的面目出现，为的是能同国民党cc系周旋，以适应白区工作的需要。梅经常同吴开先和吴醒亚往来，并通过他们认识了陈立夫、潘公展等人。

1931年冬，梅进上海晨报馆任编辑。1932年春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讲师，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他因教学有方深受大学生欢迎，1932年秋，即晋升为教授，先后受聘于暨南大学和上海商学院。他辞去晨报馆工作后，又被中华书局聘为《中华》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党组织交给梅龚彬的任务是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梅选定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为团结对象，争取他们脱离蒋介石的控制而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他通过胡秋原的关系经常参加神州国光社的活动，又通过神州国光社同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和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接触。为

推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后来还有李济深等人进行反蒋抗日，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梅写文章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5月淞沪停战，蒋介石把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他看到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加深，就介绍蔡廷锴的代表徐名鸣与潘汉年相见，帮助十九路军与中共建立联系。10月，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十九路军损兵折将，使得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险恶用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十九路军官兵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不满，促使蒋光鼐、蔡廷锴联络李济深、陈铭枢以及国民党内其他反蒋力量，准备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福建人民政府。此时，梅对李、陈、蒋、蔡反蒋斗争的支持也就从后台转到前台。

1933年初，梅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去福建漳州为十九路军干部训练班讲了一期政治课。同年暑假，又去香港会见李、陈、蒋、蔡，参与研究有关发动事变的准备工作。回上海后，又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同党组织取得联系，以求中共对十九路军的进一步支持。11月，辞去上海商学院的教职，前往福州参加建设“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梅被任命为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民众运动处处长。他因学识渊博，办事干练，受到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的赞赏和器重。有关文化宣传方面的问题，文化委员会主任陈铭枢都交给他处理。梅还被福建人民政府委派筹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和红军代表张云逸到达福州后，梅负责联络并配合他们工作。

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三路大军的进攻下宣告失败。事变失败后，梅离开福州去香港。到达香港后不久，潘汉年

返回中央苏区。此时，梅为了继续同党组织保持联系，冒险去上海寻找党组织。8月，返回香港，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帮助李、陈、蒋、蔡组织和发展反蒋力量。

李济深和陈铭枢在福州时曾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当时梅虽也附议了，其实他并不赞成。到了香港以后，梅正式提出他的主张，建立一个体现抗日政治力量大联合的组织。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人赞成梅的意见。不久，陈铭枢被说服了，放弃了组党的打算。陈铭枢转变后，仍有人鼓吹“第三路线”。怂恿李济深组织生产人民党。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李济深的身边展开了。最后，梅的观点获胜，李济深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1935年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在香港成立。大同盟虽未能同救国会统一成更广泛的抗日反蒋阵线，但在梅龚彬和李章达等人的推动下，救国会的各项活动，大同盟都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梅龚彬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宣传处长。分管宣传工作的陈铭枢出国考察后，大同盟的宣传工作由梅全面负责。他通过各种方式用大同盟的语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春，大同盟创办不定期理论刊物《民族阵线》，在梅指导下由陈章红等负责编辑。

经过梅龚彬等人的努力，大同盟很快在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中建立组织，积极参与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春，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梅龚彬非常重视这次会议，通过出席会议的华南代表方少逸（大同盟成员）同大会保持联系。梅还曾协助李章达建立华南地区救国会。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和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先后传到香港，梅龚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联系到大同盟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广

泛发动人民群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逼蒋抗日上，而不是策动军事倒蒋。在这个问题上，大同盟领导层内是有分岐的，突出表现在对待两广反蒋运动的态度上。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他们在认识上才趋于一致，认识能够统一到逼蒋抗日上来。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耐心做大同盟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工作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以抗日的姿态出现。1937年春，李济深和陈铭枢请梅龚彬去上海和南京了解情况，看看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真正抗日。5月，梅动身去上海，7月到南京。在南京会见国民党政府秘书长张群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张群向梅龚彬表示政府已下决心抗战到底。梅看到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七一五”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实现，认为可以放手大干了，就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时，后援会为支前、慰军、抢救伤员和安置难民做了大量工作。

9月，梅龚彬再次去南京，在陈立夫分管的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任设计委员。11月下旬，他接到第六部的通知先行去武汉。

在南京期间，陈铭枢提出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梅龚彬一再劝阻，可惜未能说服陈铭枢，大同盟终于被解散了。大同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爱国进步力量，它的解散对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是不利的。梅始终认为未能阻止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他的重大失误。

1938年春，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撤销，梅龚彬转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特约编辑。8月，以慰问前线抗日战士的名义去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访问，随即又去江西进贤访问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由于教育部已从武汉疏散到重庆，梅离开进贤后就取道衡阳、桂林去

重庆。在衡阳时，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指示梅龚彬路过桂林时向李济深致意，并将中共希望李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意见转告李本人。梅在桂林完成此项任务之后，于1938年底抵达重庆。

梅到重庆后，按李济深的要求离开教育部进入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会委员。由于设计委员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他主动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编辑内部刊物《战地通讯》。

由于蒋介石对抗战转向消极，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李济深和梅龚彬都想离开重庆。1940年夏，战地党政委员会苏北分会要求重庆总会派人来苏北处理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之间“磨擦”。梅龚彬以视察苏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去苏北执行“视察”和“调解”任务。他庆幸自己得到了脱身的机会，很想投奔新四军随叶挺抗日。为去苏北前线，他从重庆飞往香港。然后从香港坐船到上海。一到上海，就找党组织设法送他去苏北。鉴于苏北战事激烈，潘汉年要梅在上海租界等候一段时间。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叶挺被捕，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下令取销。此时，梅龚彬已不可能去苏北，潘汉年指示他去香港暂住。

1941年3月，梅抵达香港。当时，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不满，纷纷从重庆和桂林来到香港面向海外华侨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梅接受沈钧儒的建议，同救国会的朋友们一起做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党的统战工作，梅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竭力团结各方面的民主进步力量。

1941年夏，廖承志召集梅龚彬和李章达商议建立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根据廖承志的指示，梅、李二人在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后，起草了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纲领草案。纲领草案的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摩擦

和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草案写好后，交廖承志审查批准，然后梅、李带着纲领草案前往韶关和桂林分别征求蒋光鼐和李济深的意见。李济深对纲领草案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也愿意牵头发起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但由于他感到力量单薄而顾虑重重，就以“先作酝酿，从长计议”为由把这件事情搁下了。抗战期间未能把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与顽固派对立的民主派，这是梅龚彬一件难忘的大憾事。

1941 年底，梅应聘去中山大学任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当时，中山大学在粤北坪石。

1942 年春，李章达通知梅去韶关会见廖承志。梅赶到韶关向廖承志汇报了桂林之行，他为 1937 年解散大同盟之事再一次作自我批评。如果大同盟还存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肯定能建成。这是梅龚彬抗战期间最后一次向党组织汇报。他离开韶关返回坪石后不久，廖承志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于是，他中断了同党组织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梅才找到潘汉年重新接上组织的联系。在失去组织联系那一段时间里，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同他认识的共产党员交往，因为他是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

梅龚彬在中山大学任教五年半，1947 年 6 月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才离开。梅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担任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有时还兼授会计学和簿记学。大学生不仅爱听梅龚彬讲课，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到梅家中讨论学术问题和国内外时局。1944 年下半年，梅担任经济系主任。1944 年底，中山大学疏散，他随西路去粤北连县。1945 年春，任中山大学连县分校法学院主任。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梅于 1945 年 10 月底到达广州。1946 年初，任法学院代理院长，仍兼经济系主任。由于梅龚彬是经济系的学术带头人，1946 年夏，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两年期的聘书，成为中山大学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

梅龚彬因支持学生反美反蒋斗争，拒绝解聘和开除进步师生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7年5月30日，中山大学学生在广州举行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示威游行。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宪兵和特务冲入石牌搜捕中山大学进步师生，梅龚彬夫妇也在被捕之列。愤怒的中山大学师生包围了中山大学三青团部，迫使特务释放了临时拘押在那里的梅龚彬夫妇。6月，梅被中山大学解聘。

为了保障梅龚彬的安全，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副主任的蒋光鼐，借用行营主任张发奎的专车将梅接出石牌，并帮助他在广州隐藏起来。张发奎是梅北伐时期的老上级，他劝梅去上海从事与政治无关的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忙。梅知道自己已不可能留在广州，但也没有去上海，而是按照方少逸的意见取道中山、澳门去香港。

梅路过澳门时，受到老朋友柯麟、柯正平兄弟的热情招待，并通过他们结识了新朋友马万棋。马万棋是澳门的爱国资本家，非常开明，梅很快同他成了莫逆之交。此后，梅经常同马万棋谈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马万棋也多次资助梅的革命活动。

1947年8月，梅抵达香港后，应聘到达德学院任教授。1948年初，又被在香港刚创刊的《文汇报》聘为社论撰稿人，但仍在达德学院兼课。

梅在香港时期的主要工作是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帮助李济深筹备和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筹备期间，梅被推选为民革成立宣言的起草人。据说，当时在国外访问的冯玉祥见到宣言时，对宣言的文笔赞不绝口。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瑗六人的《上孙夫人书》是梅通过党组织送往上海交给宋庆龄的。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在香港宣告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担任主席。梅龚彬虽

没有进入第一届中央常委，但是，他代理李章达的主任秘书工作，又同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参与了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除了李济深为首的大同盟成员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也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组织。

1948年5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号召。梅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等重要文稿，还帮助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人草拟响应“五一”号召的联名电稿。

1948年底，梅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陪同李济深去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和梅龚彬等在大连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1月10日，他们到达沈阳，1月22日，李济深等55位在沈阳集中的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梅是55人之一。

参观东北各地之后，李济深和梅龚彬于2月下旬到达北平。一到北平，梅就将民革中央机关从香港迁来北平，并着手有重点地整顿民革地方组织。

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梅龚彬。在听取梅关于民革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的组织关系已转到中央统战部，仍为秘密党员。

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梅龚彬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青联执行委员。

9月，梅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冬，

政协全国委员会建立秘书处。作为副秘书长的梅龚彬协助秘书长徐冰分管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并联系各工作组。他一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直到“文革”动乱时被停职为止。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梅龚彬欢欣鼓舞地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升起五星红旗，万分激动，热泪盈眶。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

1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梅龚彬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秘书长。此后，他还是民革的第三届、四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

1950年6月，梅龚彬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历任第二届、三届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2年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民革中央内三位秘密党员梅龚彬、王昆仑和屈武组成秘密党支部。秘密党支部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和管理，在民革中央起党组的核心作用，统战部指定梅为秘密党支部书记。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梅龚彬作为湖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57年3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由刘少奇主席提名梅龚彬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他历任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梅龚彬待人真诚，推心置腹，遇到不同的意见，他既能够坚持原则不迎合于人，又做到耐心说理不强加于人。正如陈校通所说的：“不厌周旅融众见，所持坚定任谁真”，党外人士都愿意同他交朋友。

他长期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看到了党外人士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而取得的进步，充分了解他们对

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以及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依然谨慎从事，尽量避免过火行为。即便对那些戴上了右派帽子的，梅仍一如既往地同他们交朋友。

他非常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和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既严格要求，又放手让青年同志自己干。对青年同志来说，他是一位好老师。

他体察下情，平易近人；不摆资格，埋头苦干；不讲排场，艰苦朴素。政协机关和民革机关的同志们都说他是位好领导。

尽管政协和民革的工作很忙，梅有时也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要求接待外国友人，主要是来自日本的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梅龚彬未能见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他也曾为此出过力。

“文革”动乱期间，梅龚彬受到林彪、康生和“四人帮”的迫害，在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期间受尽折磨。他肺部本有在东京受难时留下的后遗症，“文革”期间的摧残又使肺部的创伤发展为不治之症。1975年8月1日凌晨，梅龚彬含冤病逝于江西宜春，终年74岁。

拨乱反正后，梅龚彬的沉冤得到了昭雪。1980年1月18日，党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胡耀邦、宋任穷、季方、王首道、胡子昂、李维汉、王昆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乌兰夫、邓颖超、彭真、廖承志、朱蕴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刘宁一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中说：“梅龚彬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同志，是革命事业的损失。”又说：“我们要学习梅龚彬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如此哀荣，父亲当含笑于九泉。

□梅向明(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主席)
梅昌明(化工部青岛化工学院副院长,教授)
梅建明(中国地质大学高级讲师,武汉市特种工程技术研究厅副厅长)

独树一帜的著名作家废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新文学百花园群芳吐艳，众多的大笔如椽的文学名流，挥毫泼墨，写出了许多划时代的壮丽篇章。当时，有一位新秀，以表现乡情的作品独树一帜，闻名于文坛。他，就是著名作家废名。

废名，本姓冯，名文炳，字蕴仲，笔名废名。1901 年生于鄂东边陲黄梅县城小南门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一位正派的读书人，废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废名天资聪颖，小时上私塾启蒙，思维想象力与一般儿童迥异。虽然他十分厌恶私塾里枯燥、死板的学习生活，但他善于从那些生涩的文字中进行美好的联想，从而找出乐趣。当时私塾塾舍是一座古庙，老师教他读《论语》，当读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一句时，他就联想到庙里和尚每天晨钟暮鼓的情状，于是感到欢乐；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联想到学校对面绿洲上风吹草动的场景，也感到欣慰。这些，不能说不是一个作家先天的敏感。

1912 年，12 岁的废名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15 岁即远离家乡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毕业后留武昌任小学教师。时值“五四”新文化思潮席卷全国，他受到《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的影响和启迪，决心致力于新文化活动。

1922 年，废名来到久已向往的“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英语系，1929 年毕业，留北大任教。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迫于形势，他辗转回黄梅老家居住。日本投降后，重返北大任副教授，旋升教授。1949 年新中国成立，1952 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被选为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

废名从事文学创作，是入北京大学后开始的。由于他先天的秉赋和执着的追求，很快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和鲁迅、冯至等人过从甚密。他的小说、新诗、散文、评论，多发表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鲁迅主办的《语丝》以及他和冯至主办的《骆驼草》。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废名童年生活是在家乡度过的，成为作家以后，又回到家乡居住了 9 年，家乡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难忘的印象。也正是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给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在废名的作品里，家乡的山水村庄，风情习俗，随处可见。诸如黄梅县城内外的乱石塔、火神庙、竹林、绿洲、洗手塔、青石板桥、河沙滩边的搓衣石、万寿宫顶上像李铁拐帽子款式一样的建筑以及城北山乡停前驿的历史、停前街的牌楼，都成了富有色彩的画面，就连土桥铺那里的黑田土、大芋头，也是作者笔下的珍品。

小说《柚子》里，作者写外祖母的村庄，“被一条河抱住，河东约半里横卧着起伏不平的山坡。放牛的小孩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他们把系在牛鼻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让它们在山下吃草，我们走上山顶折杜鹃。”这简直是一幅生动的牧牛图。逼真地再现了儿时的生活情趣。

废名还渲染了家乡传说的许多神话故事，比如《洲》里，写县城的乱石塔，“比城墙高很多，相传有一年发大水，城里的人统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一座塔，站在上面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童女。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不觉流出一滴泪，就在承

受这眼泪的石头上，长起一棵树，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菱荡》里，又写到县城河边的洗手塔，“塔不高，一棵大枫树高高地在塔之上，远路行人总要歇住乘一乘凉。传说这塔是摆渡的张老汉死了之后才有的，张老汉死的那夜，何仙姑为了超度他，下凡来修了桥，修好桥，洗一洗手，手上洗落的泥装就成了一座塔。”言为心声，作者润饰这些美妙的故事，意在表达家乡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对善良者的怀念与赞美。

废名虽然长期客居异地，而始终与故乡人声息相通，他的作品里的人物原型，大都是他在故乡接触的形象。他把对故乡人民的爱，特别是对处于低层普通劳动者的爱，尽情地倾注在他的笔端，小说《浣衣母》里主人翁李妈，就是取材于县城里长年为人洗衣的老妇。作者把李妈写成公共的母亲，把她的茅屋写成公共的乐地。李妈慈祥的面孔，博大的胸怀，使人感到可亲可敬。

《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是一个种菜、卖菜的年轻女子，她有着纯朴的品质，美好的心灵。她卖的菜，隔夜不浸水，称起来比别人的轻，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所以人们争着买她的菜。还有长年在猪肉店捉脚的杂工四火，终身在火神庙劳动的苦和尚全喜等等，废名都是深怀爱心和同情心，带着诚挚的感情，创造他们的形象的。

一枝一叶总关情。废名时刻关注着故乡人的苦与乐。《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全是写抗日战争时期故乡风闻，其中有一节内容是莫须有先生大年初二留几位拜年农民吃饭，席间，互倾思想，畅叙家常，这里的莫须有先生和淳朴憨厚农民之间的感情亲密无间，而莫须有先生，也就是废名自我。还有一节写道：“莫须有先生感叹地说‘他从县城逃到乡下，中国的外患，忽而变成内忧了。日本佬不是他们（老百姓）切肤之痛，日本佬来了逃就是了，而苛政猛于虎则是他们当前的现实。’”显然，作者是在为故乡受国民党苛政折

磨的苦难人民呼号与控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故乡人民获得了自由幸福，废名在欣慰之际，更加深了对为故乡人民创造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的怀念。1958年他一口气写了《歌颂篇三百首》，其中《歌烈篇》，就是歌颂大革命时期家乡为革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由此可见废名与故乡人同呼吸共患难的深情。

废名是一位乡情浓重的作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批评家都赞美他的作品是美文、奇闻。1982年，在纪念废名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著名文学史学者唐弢在《文学评论》上著文说："废名写的是日常生活，风土人情，跃然纸上。反映了中华民族淳厚的气派与作风。"这是对废名创作风格最精当的评语。

废名在文坛上不倦地耕耘；一生创作成就很多。解放前结集出版的作品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桥》、《枣》、《莫须有先生传》等等。

解放后著述出版的有《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讲义》、《新民歌讲稿》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了《废名小说选》，1984年又出版了他的《谈新诗》。

1966年，废名身患癌症，1967年9月逝世于长春。临终时，他嘱咐亲属说："务葬我于黄梅故土。"

哲人已杳，乡情永在。

废名的乡心乡情，将永远永远激起故乡一代又一代儿女的乡心乡情。

□徐耀寰

居正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

居正(1876—1951)，字觉生，号梅川居士，武穴市(原广济县)居文胜垱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曾任司法院长，并同蒋中正“竞选”过中华民国总统，解放后客死于台湾。

辛亥革命前后，居正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在同盟会——国民党内部，他是一位大名鼎鼎，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这里，谨就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一方面，简述如下：

1935年，居正出主意、出资金在他的家乡居文胜垱，办起了一所养正小学(养 正学塾)。这养正小学，吸收当地农民子女入学，不收学费，还给贫困学生发书籍文具，开支悉由居正负担。

1946年夏，居正返乡探亲。在武穴镇(属原广济县)受到盛大欢迎。在武穴停留期间，他欣然允诺出任私立刊江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刊江中学，1946年办有初中，到1947年还办起了高中，是当时武穴镇办得较好的私立中学之一。1946年冬，居正“复自京请假回籍”，曾亲自到刊江中学视察，勉励该校师生发奋攻读，为国效劳。

北京朝阳大学，是民国初年新创的，以专攻法学著称。虽然属私立大学，但毕业生“任法官者不少”。1936年起，居正被推选为私立北京朝阳大学校董会董事长，凡办学大计，每自亲躬。抗日战争中，朝阳“初迁沙市，继迁成都，复迁巴县兴隆场”，于颠沛流离中，未尝辍学，成绩斐然。1944年冬，国民党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参加青

年军，由各大学学生志愿者应征抗日。朝阳校长孙晓楼，率先倡导，全校学生慷慨投笔者达五分之一以上。大学生们参军时学校举行签名典礼，居正偕夫人钟明志到校为参军学生送行。居即席致词鼓励；其夫人当场捐万金为礼并高歌岳武穆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用以壮其行色。

抗日期间，朝阳大学改称为朝阳法学院，抗日胜利后复员回北平，但在重庆仍然办有朝阳分院（后称为正阳法学院），居正兼任正阳法学院院长。

应该承认：朝阳大学——朝阳法学院和正阳法学院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早期法学人材。据当年在重庆读过朝阳分院的杨奔先生说："那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无朝不成院'，就是指当年国民党执政时的法院，有许许多多的法官、推事，都是朝阳毕业的学生。"

也应该承认：居正为培养法学人材，用过许多心血。凡朝阳的迁校、选聘校长、筹措经费等重大事宜，他都一一过问。就是抗日胜利后，朝阳复员回到北平，也仍然不遗余力，于 1947 年仲春"飞北平，视察复员后朝阳学院及法院法学学会"。

还有一件湖北教育事业上的大事，居正出面干预过，也值得一提：抗战胜利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拟由恩施复员回武汉；但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却欲迁该院于湖北沙市。居正为此事，曾会同湖北籍的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联名致函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该院只宜迁回武汉，而不宜迁到沙市的主张。信中明确指出："敬启者，湖北师范学院迁移问题，有主迁江陵（沙市）一说，期于教育普及，诚有苦衷。但正等窃以为迁武昌较妥。所以者何？一、武昌据长江上游，南北关键，教育影响所及，至巨至遍……。民国以来，仅有武汉大学号为学府，对于特殊人材之培养，似嫌不足。师院如设

武昌，则与武大有相得益彰之雅，可多容四方才俊。二、中等师范因以分设各郡为宜，而国立师院为最高学府性质，所以提倡高深学术，培养特殊人才，必须设置通达之区与文化根基深厚之地，方可收教育实效。江陵虽复滨江而半壁殊僻，文化复鲜根基，若师院设此，似难陶冶特别人才……。”

此事，虽然当时朱家骅没有卖居正和熊十力的帐，仍然决定国师由恩施迁沙市，但事后国师广大师生，掀起迁院学潮，还是在1947年把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由沙市迁回了武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办小学到办大学，从办法学院到办师范学院，居正都是热心关怀、具体支持的！他个人，尤其重视培养法学人才，主张：“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居正文集494页）；教育群众“养成守法精神”（居正文集571页）。

□舒　徐

饶汉祥生平纪略

饶汉祥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字必僧，又字羼提，广济县(今武穴市)南泉乡饶为市塝人。出生书香之家，自幼随父就读。10岁时以“明郑和以中官下西洋百余国其策安在”为题作文，日书万言，乡里奇之。16岁中县案首。20岁中举人，名列十二。其后投考京师大学堂，三试皆第一，未赴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暑期，与同邑居正、彭汉遗赴日本，入法政大学攻读，1907年回国。次年赴福建，先以盐运使候补，后任学务所视学近三年。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彭汉遗及饶二弟(校文)电促回鄂，饶与其他报效人员同住集贤馆，等待考核任用，刚从两湖师范毕业的革命党人谢石钦为该馆考核科长，饶以谢之学历不过童生，以童生考举人为耻，不入试，后复经彭汉遗及二弟等党人荐入都督府秘书室任文牍。因其办事精干，工于表现，渐为黎元洪所赏识，乃升为秘书。秘书长杨玉如惯写报章时事文字，文体不当黎意。而饶汉祥行文理事，多方迎合，甚得黎欢。乃将重要文电交饶主办，例行公事则委杨处置。杨乃请调，由陈寿熙继之，不久陈走，饶得晋升秘书长职。自此黎、饶关系密切，互相依附，进退与共，随黎沉浮。时袁、黎勾结，以制革命党人。饶以动人文电，凡袁所追求的，黎一发电拥护，各省从而拥护之；凡袁所厌恶的，黎一发电反对，各省即从而反对之。饶因而甚为黎所器重，黎为饶制装送钱，无不从优。饶请假回乡祭祖，黎派小型兵舰护送。黎并以武昌私田五百亩相赠，饶不

受乃止。在饶母 60 寿辰时，黎撰文谓："忽僧尤雄于文，羽檄书移，星驰电布，每有所属，扬思秉笔，宿昔而成，采藻葩流，哀痛激发，读者莫不唏嘘起舞。一篇脱手，八徼风传。"时有"饶一支笔能当十万师"之谓。

袁世凯为了篡政，百般笼络黎元洪，饶汉祥乃为袁的拉拢对象之一。袁每次接到饶为黎代拟的电文，都要回电加以赞美。袁对饶特垂青眼。如饶回乡省亲，袁特派员携亲笔信前往慰问，并赠红参两斤。饶乃将袁当作文字知己，多方为其效力。1912 年 8 月，袁世凯电召武昌首义将领到京另委职事，阴削其军权。张振武识其奸，自请领兵赴边，以避羁縻。饶汉祥乃迎合袁、黎剪除党人意图，草拟两份电稿，由黎署名，分别于 11 日、13 日电北京，妄加张振武、方维等"图谋不轨"的罪名。并参与"不杀三武(张振武、孙武、蒋翊武)则鄂无宁日"的舆论活动。袁世凯杀张振武、方维后，革命党人纷纷提出质问，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袁将黎署名的密电公诸于众，全国各地纷纷指责黎元洪阴险毒辣，黎的政治威信扫地殆尽，黎乃请饶为其撰文辩护，起草了所谓"辩诬"的长篇通电，答复党人"不得已而杀人"的苦衷，为黎开脱罪责。

1912 年 11 月，湖北都督府改组，不设秘书长职，饶改任内务司长。次年 9 月升任民政长，曾遭省议会国民党议员群起反对，提出弹劾饶氏案。饶阴悉黎元洪有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之意，乃禀黎意出席省议会，发表政见，促成大会公决将国民党议员除名，遭到国民党反对。黎复派军警围住省议会，强行搜查追缴国民党议员徽章证书。又于同年 11 月 11 日发布命令，取消省议会国民党员之全部议员资格。24 日，饶复以民政长的名义，通令各县知事："无论已改选或未改选成立之参议会及自治会，一律停止解散，听候颁布新章，再行组织。"

1913 年 12 月，袁调黎元洪入京，饶辞民政长职随黎入京。

1914年，黎任参政院院长，荐饶为参政。此时袁图谋帝制，极欲拉黎入伙。1915年8月，袁氏帝制自为之意已决，乃由筹安会发起，召开参政院会议，申决国体并上推戴书，定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封黎为武毅亲王。黎召集亲信张国淦、饶汉祥议商。张进言："以副总统立场，万无接受王位之理。"饶则曰："就名义上想自不能接受；就安全上着想，不能不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张复言："袁固枭雄，但在此时，决不敢危害副总统，以冒天下之不韪。如有心危害，即令今日接受，将来仍难避免，况事变尚未可知，即不幸发生危险，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频频点头。饶言："我并非赞成王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尔。"黎颇不怿于饶，大言："我志已决，坚不接受封号，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黎之不造成帝制态度坚决，因此被袁囚禁于瀛台。饶汉祥为黎之亲信，亦受监视。寓门设警布岗，亲友不得进出。幸饶有一少年传达和警长张光裕搞熟，答应设法放饶离京，乃得连夜乘车南下，潜返家乡隐居。

1916年袁世凯死，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黎乃招饶赴京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后因"府、院之争"，攘成张勋复辟，黎乃引咎去职。饶汉祥亦去职，随黎寓居天津。虽有江苏、直隶、湖南等省督军相继聘饶为民政长，均被拒绝。闲居天津5年，生活全由黎氏资助。饶此时因失意而吸食鸦片，常写诗词自娱。

1922年7月，直系军阀拥黎元洪为傀儡总统。饶曾阻止黎不听，饶赠诗有云："缅怀拥戴时，恸哭挽骐骅，屏人上封事，先后积百楮，凡经横逆来，一一皆目睹。"黎复召饶为总统府秘书长兼侨务局总裁。饶免为其难，乃入任。饶于是年10月，曾呈请开复："追赠辛亥起义革命党人官爵"，被采纳。并受黎之托回鄂筹办江汉大学，此举在当时颇得好评。又于次年一月，为黎元洪草拟了《致京外劝废督通电》、《致京外劝息兵通电》，虽为不切实际之空论，亦获各方赞

许。及至直系军阀曹锟等驱走黎元洪后，饶汉祥又随黎寓居天津。

1925年直系军人郭松龄在河北滦县反戈讨张，郭在出关前，曾到天津密见黎元洪，极言张作霖媚日，请饶汉祥代拟通电。饶在通电中列举了张作霖五大罪状，并亲往郭部赞襄文告。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干涉破坏，郭军溃败，郭惨遭杀害，饶汉祥幸得逃脱。

1926年6月，张作霖击败冯玉祥进入北京，其时饶汉祥正在北京就医。因张部先有通缉饶汉祥令，饶走避法租界，后化装藏于木船舱底，由永定河逃抵天津，辗转返回家乡。1928年5月，饶母病殁，饶因悲痛过甚，引起心脏病复发，于6月27日病逝。时年44岁。其爱妻美姬吞食鸦片，以身殉夫。黎元洪闻之，痛哭失声。

饶汉祥善写骈体文章，喜用僻典怪字，各省军政当局纷纷模仿，形成民国初期的一种文风。饶的骈体文电，在1912—1913年之际，为袁世凯、黎元洪排斥异已，打击革命党人出了大力，如反对定都南京，通缉、杀害革命党人、破坏癸丑讨袁等等。但另方面对当时推动革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他以动人的文电，促使各省响应武昌首义和赞成民治，反对武人专政，首倡军民分治，一再主张废督裁军，以及反对袁、段、曹、吴等拥军乱政，取得全国一致好评。饶汉祥亦因此而名噪一时。遗著有《珀玕文集》八卷，《珀玕诗集》十六卷，《珀玕词集》一卷，还有《黄陂文存》八卷，即代黎元洪所拟文稿。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

纪振纲无私支援抗日

纪振纲，清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初六生于英山县麓溪冲，幼年聪颖好学。1905年考入南京讲武堂习陆军，毕业即至湖北编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曾任黎元洪的秘书、冯玉祥的军事参谋。不久离开军界，到九江办报，抨击时弊，揭露袁世凯的窃国野心，遭袁通缉。遂于1913年6月潜往南洋新加坡等地经商，历时4年。

回国后，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在冯玉祥、聂云台、谢绳祖等友人支持下，他以华侨巨商身份，于1917年6月，用四十万银元在江苏省金坛、句容两县间的茅山东麓购地1万5千亩。雇工开荒种茶、植树、种稻，创办“茅麓农林场”，自任经理。黎元洪为其题写场名。1928年春，纪到德国购回发电机、开山机、扈水机、揉茶机和汽车等机器，增办米面加工厂、畜牧场、罐头厂、制茶厂，又修筑了通往薛埠、西旸的公路，生意更加兴隆，工人增至千余人，“农林场”改名为“茅麓公司”。1933—1936年，纪振纲在上海买了法租界环龙路18号楼房，常往来于上海。与李次山、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等，过从甚密。“七君子”被捕，他极力设法营救。

纪振纲鉴于时局混乱，茅山盗贼蜂起，便购买枪支弹药，组建自卫队以保境安民。1937年11月，日军进犯上海，吴淞战败，广东兵携武器溃逃至茅山。他收留200多人枪，将自卫队扩编为自卫连。此时的纪振纲，集军人、士绅、资本家于一身，成为苏南有钱、有

权、有势的头面人物了。

1938年6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而当时茅山地区，既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又是日军进犯的军事要地，且是当地土匪称霸的地方。陈毅根据先遣队侦察的情况，跨过封锁线进入茅山，面对敌、伪、顽三方夹击的险恶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定首先做好纪振纲的统战工作。因当时日寇对纪振纲表示过“亲善”，欲使其成为他们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曾派代表找纪振纲谈判，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自卫连。然而，纪振纲都推三阻四不肯屈从。陈毅在参谋处干部会上，分析了以上情况后说：“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真的投降了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在苏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很大。我们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纪振纲争取过来。”会后，陈毅亲自写信，邀请纪振纲到司令部共商抗日大计。

纪振纲接阅陈毅的信后，反复思考决定，不论是福是祸也得应邀前去。他脱去西装换上浅兰色派力斯长袍，头戴礼帽，带着自卫连中的心腹十多人，挑着自产的茶叶和沏茶专用的天水，他坐着凉轿，来到新四军司令部临时驻地——宝埝镇拜会陈毅。陈毅接过纪振纲的名片，热情地请进屋。纪便对陈毅说：“我给您们带来点自产茶叶和泡茶用的天水，不成敬意，请陈令司笑纳。”陈毅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收下了”，并吩咐勤务兵：“就用纪先生送来的茶叶和天水，泡一壶茶来。”入室分宾主坐下，纪振纲说：“久仰陈司令大名，接到信就匆匆赶来了。”陈毅笑着说：“我相信纪先生一定会来的。纪先生是实业家，对‘新’字头的东西定会感兴趣的……。”

纪振纲警惕地察言观色，聆听陈毅滔滔不绝地讲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国内、国际形势。陈毅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今天请纪先生来，就是希望先生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战行列中来。”纪有些踌躇，适逢勤务员送上茶来，便介绍如何用“天水”沏茶才能存性，使其叶绿汤清、醇正可口。陈毅饮了口茶，既赞扬茅麓的茶好水好，又引据唐代陆羽的《茶经》，畅谈品茶之道。纪振纲连连点头，暗暗称奇。顿时，两人的思想距离缩短了许多，他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戒备之心也减去许多，谈得十分投机。在谈到抗日时，纪振纲对国民党消极抗日表示许多不满；对共产党新四军抗日力量表示疑虑。他分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固然好。但日寇兵力强大，国民党上百万正规军都抵挡不住，何况陈司令只有千把人，装备又欠佳，要抗击日军，无异以卵击石。”还说“‘我对陈司令十分钦佩，你们主张我十分赞同。可茅山山脉小，附近大都是丘陵和水网地带，不适宜打游击。我奉劝您不要对江南抗战抱什么希望为好。”陈毅觉得纪振纲的这些话，是他洞悉苏南情形有一定军事常识的肺腑之言。陈毅吸了一口烟朗然大笑：“纪先生的看法，我无法苟同。我认为：敌强我弱是相对的，以日军几万甚至几十万对我几百、几千，自然我弱；但我们可以打小仗，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嘛！茅山不宜打游击也是可以克服的。我曾说过‘寇能往，我亦能往’，我为‘主’，敌为‘客’，利在何方？我相信纪先生比我清楚。抗日救亡乃民心所向，有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已得人和之利，天时、地利的情况自然跟着变化。何况我与日军相比，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其利均在我方。只要苏南人民在，我们就能存在，中华民族儿女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一定会打败日寇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是抗日，希望先生同我们合作，共同对外。”陈毅不厌其烦地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纪振纲听着，不时地点点头。陈毅叫勤务员拿来文房四室，铺笺染翰，写了“一览众山小，豪唱大江东”的条幅，送给纪振纲。纪起身接过条幅向陈毅表示：“鄙人旨在经商，

以实业救国。已投资四十万办企业，经营二十年了，无心卷入军界。但请陈司令放心，鄙人不会当汉奸，更不愿做亡国奴。我会支持抗战的。如果有什么要我办，听陈司令吩咐！”遂握手告别。

陈毅认为纪振纲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物，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对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便先后三次亲自到茅麓公司，与纪振纲促膝交谈，谈论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耐心细致地做纪振纲的思想工作。

陈毅第一次到茅麓公司，走到大门口，抬头望见黎元洪题写的“茅麓农林场”巨大匾额，不禁脱口而出：“好大的气派，纪振纲果然名不虚传。”陈毅说明来意，自卫连的门卫引他走进一间大厅。厅内坐满了人，纪振纲正在演讲，待纪讲完，陈毅走到纪振纲面前说：“我代表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和我本人，向你表示问候。”两人握手言欢，纪将陈毅引到客厅，吩咐勤务人员沏茶（茶杯现存镇江市博物馆抗日战争历史文物陈列室），彼此拉开话匣，从古到今，从中华民族的兴衰到当今抗日救国的时局。陈毅告辞，纪振纲送出三里外握手言别。纪送走陈毅后对自卫连连长李安邦说：“新四军中真有人才，陈毅不愧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陈毅又先后两次登门看望纪振纲，并派新四军战士与茅麓公司自卫连联欢，又派文工团到茅麓公司慰问演出。一来宣传抗日，二来增进友谊。无怪乎李安邦在纪振纲面前说：“昔日，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今日，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先生合作抗日。”

纪振纲是个机警的人。虽然对陈毅及新四军有了好感，但仍存有戒备之心。有一次，陈毅约定纪振纲在下午1点到彭城庙附近一家农户会面，说是“有要事相商。”纪按时到达约会地点，但不见陈毅。约等了1个多小时，仍不见陈毅来，纪振纲看看怀表，踱来踱去。怀疑陈毅是存心耍弄他，即对警卫班长盛学文说：“走，回去！”

陈毅来到约会地点，不见纪振纲。便问户主，户主说：“纪先生

来等了好多时，看看怀表，等了一会儿，似乎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他们回去了。”陈毅觉察到失约定会造成误会，便命随从部队返回驻地，只带军事参谋吴肃、夏光等5人直奔茅麓公司。陈毅一行来到茅麓，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岗楼上架起了几挺机枪。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大门口4个持枪的自卫团丁，刀出鞘，弹上膛，不让陈毅等进去。军事参谋吴肃觉得危险，劝陈毅不进去为好。陈毅断定纪振纲绝不会加害于他，他拨开团丁的枪刀，闯进大门，进入第二道门岗时，叫吴肃、夏光留下，他只身直闯会客厅，在客厅门前，陈毅把腰间的手枪和子弹带解下放在石墩上，空手走入客厅。纪振纲在客厅屏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便迎上前接待。陈毅说：“我因军务缠身爽约，以致产生误会，茅麓戒备森严，弟兄不让进。我陈毅只好闯进来了。”纪振纲给陈毅沏茶，笑着说：“司令不必介意。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情况十分紧急。为安全计，不得不有所防范。”陈毅风趣地说：“先生对我陈某，是不是也有所防范？”纪振纲连忙表白：“哪里，哪里！陈司令不必多疑。”陈毅开怀大笑：“请纪先生把我随从4人也叫进来如何？”纪应诺。6个人在客厅里，便计议反扫荡和奇袭日军驻地——新丰车站的行动。并要求纪振纲作些后援和接应工作。

纪振纲按陈司令要求行动：不几天新四军奇袭新丰车站取胜，且连连挫败日军。

纪振纲看到了陈毅豪爽真诚待人的品格、率师抗日的战绩、官兵一致的作风、严明的军纪和英勇善战的军威，他心悦诚服。从而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纪振纲消除了一切疑虑，尽力与新四军合作。

1939年秋天，新四军供养极度困难，纪借给新四军5000银元。冬天到了，新四军棉衣奇缺，纪振纲出主意，向区长、士绅、富商募捐，他个人就捐棉衣300多套，同时购胶鞋和西药送给新四军，

并帮助养护伤员。又给新四军递送军事情报。

1940年1月底，纪振纲见形势恶化，决定离开茅麓公司去上海。他将200多支步枪、20多挺轻重机枪、1门迫击炮和300多箱弹药及218名官兵，全部交给陈毅改编为新四军。2月在上海给陈毅写信，并将自己心爱之物：16倍双筒望远镜、勃朗宁手枪、56发催泪弹、7省军用地图，托警卫二班班长盛学文送交陈毅。同时，与夏衍、吴媚、李一氓等组织义演义卖。将他储存在上海发行所的大批茶叶卖掉，购买一批药品和物资，派人护送到浙江金华，支援抗日的新四军。

纪振纲从事实业救国和支援抗日，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在苏南地区的金坛、句容、镇江、溧阳等县(市)，享有较高的声誉。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神话般的故事。镇江市博物馆、茅山抗日斗争历史陈列馆和英山烈士陵园，都陈列有纪振纲支援抗日的部分事迹。

□陈凯文

李先念统战思想的历史见证

浠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新四军第五师李师长给三十九军刘军长的一封公开信》。它是李先念在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

刘和鼎，国民党三十九军军长，抗战初期，因“作战不力”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1942 年 10 月，刘和鼎奉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命，从浙赣线率部增防鄂东。初莅斯土，坚持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给他写了这封公开信。

李先念为什么要给刘和鼎写公开信？他希望刘和鼎“调解鄂东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了解这些问题，必须从国民党在鄂东制造的反共磨擦说起。

信中所说的“程仲苏先生”，就是国民党鄂东（指平汉线以东，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行署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程汝怀，拥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纵队（1941 年 8 月改称湖北省鄂东保安一、二、三、四旅）共两万余人的地方武装。他不满五战区桂系的歧视，便投靠蒋介石，与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过从甚密。他的地盘属五战区的防区，又不能不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鄂东挑起内战、制造磨擦的“土阴谋家”。

武汉失守以后，湖北沦陷区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局的发展，组织民众纷纷建立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仅鄂东就建立了新四军抗日游击第五、六、七、八大队等人民武装，分散在鄂东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为加强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派遣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李先念从延安到达河南竹沟。1939年1月，李先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率领竹沟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南下，于同年6月将豫南、鄂中的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其时，程汝怀接到蒋介石和五战区当局的反共密令，开始在鄂东挑起反共磨擦。7月，他命令王丹侯十七纵队围攻活动在黄梅、广济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抗日第八大队，残杀共产党员、抗日战士百余人，搜捕抗日干部、群众30余人，制造了“鄂东惨案”。9月，他命令王啸风十八纵队配合桂系第七军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围攻活动在麻城、黄冈交界地区的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残杀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战士百余人，搜捕后勤人员、伤病员50余人，制造了“夏家山惨案”。同时，他命令李九皋十六纵队、蒋少瑗十九纵队围攻活动在鄂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第六、七大队，迫使鄂东的人民抗日武装向鄂中转移，与李先念部会合。1940年1月，豫南、鄂中、鄂东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任政治委员，在大小悟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6月，张淦第七军与程汝怀十六、十九纵队进攻大小悟山，逼迫豫鄂边区党委、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退出大小悟山。李先念通电全国，揭露桂程破坏团结抗战罪行，并向五战区当局提出抗议。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所属十三、十四、十五旅和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分散在鄂中、鄂东、豫南等地开辟敌后根据地。是时，五战区当局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计划，将豫鄂边区划为鄂

中、鄂东、襄西三个“清剿”区，集结重兵围攻新四军第五师。新四军第五师既要与日伪作战，又要与顽军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自卫，在敌伪顽夹击之下，处境极为困难。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新四军第五师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与打击反共势力。针对五战区的反共部署，五师一面组织鄂东、豫南、天汉、襄西四个作战指挥部进行反磨擦斗争，一面利用《七七报》、《七七月刊》、《挺进杂志》等舆论工具进行反内战、反磨擦、反投降的宣传，动员开明绅士呼吁团结，给国民党部队写信、派代表谈判、帮助安置伤病员、发动群众慰劳等形式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与三十三集团军、六十八军等部队建立了统战关系，表示互不侵犯，唯有桂系和程汝怀在鄂东又燃起反共战火。他们在组织军事进攻的同时，派遣特务打入新四军内部拖枪、暗杀，制造血案，先后杀害陂安南县委书记杨业珍、安麻县委书记田东及后方医院伤病员、工作人员数十人，在冈中杀害新四军地方工作人员 20 余人，为打击鄂东顽军的反共气焰，五师主力集结鄂东，发起礼北战斗，生俘十九纵队司令蒋少瑗以下官兵 2000 余人，迫使李九皋十六纵队与五师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十八纵队傅训民支队保持中立。为逼迫地方顽军积极反共，排挤蒋系在鄂东的势力，李宗仁派桂系四十八军副军长程树芬兼任鄂东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以监视程汝怀、驱使地方顽军作反共牺牲品，削弱其实力，相机取而代之。程汝怀对桂系居心吞并甚为不满，对新四军在鄂东的发展惶恐不安，在桂系威逼之下，甘当反共先锋。为争取程汝怀合作抗日，李先念以五师和同乡人身份两次写信给他，劝其悬岩勒马，携手合作，共御外侮，程置之不理；组织正义士赴绅鄂东游击总指挥部(驻黄土岭)请愿，竟遭冷遇；多次派代表谈判，程坚持以《奸伪投诚实施办法》收编新四军，拒绝合作，并在军事上继续扩大磨擦。程汝怀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在鄂东挑起的

反共磨擦连连失败。五战区当局认为程汝怀反共不力，遂于1942年10月收编了程的部队，将其改编为鄂东挺进军，委任程树芬为总指挥。桂系达到了直接统辖鄂东的目的，程汝怀被迫到重庆当了蒋介石的军事参议。

桂系统辖鄂东之时，参加浙赣线作战的日军撤至鄂中“扫荡”敌后，五战区当局急调参加浙赣线会战的三十九军增防鄂东，加强鄂东地区的反共力量。李先念为团结三十九军共同抗日，调解国共两党两军在鄂东的磨擦，给刘和鼎写了这封公开信，信的内容是：

和鼎将军麾下赐鉴：

浙赣线会战节节胜利之际，将军率部增防鄂东，旌旗所指，行见敌伪披靡，先念不敏，谨代表敝师数万指战员及边区数百万人民，敬致欢迎慰问之忱。

惟据敝师在边区四年抗战经验，每当友军换防，敌伪无不利用时机，通过各种形式，施行挑拨离间之伎俩，企图破坏我团结抗战，以逐行其“以华制华”、各个击破之阴谋，为此不揣冒昧，愿为一倾肺腑。

敝师自到豫鄂边区以来，即不断与敌伪搏斗。廿八年曾击破伪“中国人民自卫军”金龙章、李汉鹏于孝感；廿九年争取伪军郭仁太千二百人反正于京山，策动伪军杨经曲部二千五百人起义于汉阳，并攻入云梦、黄陂等县城；卅年攻入孝感城及汉口附近之蔡甸；本年春季又歼灭伪“定国军”汪步青全部，攻入汉阳之侏儒山、及伪麻城县府所在地之宋埠。凡此微末之战绩，固不足夸耀于国人而自矜功善，然敝师指战员及豫鄂边区抗日人民对国家之无限忠诚，亦无负于最高统帅之训示，及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期望，此敢诉于将军者一也。

敝师在四年艰苦奋斗中，从未接到政府张纸只字之

鼓励，亦未获得一弹一械之补给，孤悬一隅，四面受敌，为抗战利益及边区人民幸福计，不得不自行领导人民，建立党政军民之各种组织，以维护困难条件下之生存与发展，不得已而为之，实绝于我，并非我绝于人，局外人不明真相，妄加责难，若设身处地而反诘己，又将如何耶？此敢诉于将军者二也。

以往四年中，敝师对豫鄂各地友党友军曾迭本敝党团结抗战方针，正式表明我方要求团结对敌之热望，虽迄未获得任何党政军民之谅解，然敝师解救一二五师李团千人之围于应山李店，抢救医疗九十四军二百伤员于应城田店，当一八九师今春在陂孝边大小悟山被困之际，敝师又不惜一切牺牲，击破敌寇左翼，以救其危。至于优待过往友党友军官兵，保障友党友军工作人员在边区之抗日活动，优待边区各抗日友军官兵家属……等。一切事实，均足证明敝师坚持团结之真诚，此敢诉于将军者三也。

豫鄂边各地方团队，英俊奋发，艰苦奋斗者，固不乏人，而以武装为资本，以抗战为招牌，以苛敛聚扰为营业者，亦属不少，此辈为维护其"土皇帝"之封建割据，乃播弄是非，伪造情报，挑拨我抗战部队内部之团结，以便忙于互斗，无瑕他顾。四年来敝师在此种"土阴谋家"诡计实施之下，精神物质之牺牲，诚属至大且巨，历次自相残杀丑剧之演出，无不使友我俩军，均受重大损失，此敢诉于将军者四也。

在鄂东一隅，程仲苏先生，自廿八年攻击并惨害我五、六、七、八大队以来，其惨杀敝党敝师工作人员，有案可查者数在二千以上，"搜剿"、"追剿"、"进剿"命令之颁

布次数无虑数百，蒙蔽上级，离间友军也；藉外力以行对敝师之压迫也；组织内奸，策动哗变也，无所不用其极。敝师由于对外界隔绝，虽申诉有心，终叹泣告无门，四年来一向以忍耐出之，除不得已时，实行自卫外，从未作主动之攻击。去冬今春，五次派人赴黄土岭谋求合作，均被拒绝，且竟被报以“按照伪匪投诚收编办法办理”之污衊。在此种情形之下，敝师虽有志贞贯日，要求停止内战之决心，岂奈对方拒我于大门之外者何！此敢诉于将军者五也。

凡此种种，诚不应用犹精神，惟以将军初莅斯土，不克了解敝师真实情况，特缕诉梗概，至祈勿为奸人所蔽而对敝师有所歧视，如蒙毅然伸出民族团结之手，从事调解鄂东问题，移彼此相戒相制之兵，共图相辅相成对敌之策，先念当更尽一切可能之努力，克己以从，殊无所紊也，仅沥肝胆，敬祈明鉴，如荷。

即颂戎祺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　李先念

十月　日

李师长在公开信中，一面代表新四军第五师指战员和边区人民对三十九军增防鄂东“敬致欢迎慰问之忱”，一面以一件件事实“表明我方要求团结对敌之热望”，“停止内战之决心”，揭露鄂东程仲苏先生挑起友我两军自相残杀之丑剧，破坏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之阴谋，希望刘将军“伸出民族团结之手，从事调解鄂东问题，移彼此相戒相制之兵，共图相辅相成对敌之策”，“勿为奸人所蔽而对敝师有所歧视”。信的内容表明五师“志贞贯日”，“坚持团结之真诚”。

三十九军进驻鄂东后，执行五战区的反共军事计划，为国民党在鄂东挑起反共磨擦推波助澜。当豫鄂边区军民在反击日伪冬季

“扫荡”之时，三十九军、第七军各一部配合鄂东挺进军进犯罗礼边、经麻边、安麻边、冈麻边、陂安南、冈东等地区，企图一举摧毁五师在鄂东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当日寇发起湘北、鄂西战役时，三十九军五十一师袭击五师陂安南后方医院，俘新四军伤病员7名，杀害在该院治疗休养的一军分区侦察科长路征同志。三十九军五十一师、鄂东挺进军十七纵队分别在陂安南之八里湾、浠水之白石山等地遭到五师主力自卫反击后，程树芬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和抗日部队，与日军汉口特务部签订秘密反共条约，勾结日伪夹击鄂东新四军，三十九军协同日伪进行堵截，逼迫五师主力跳出包围圈，使鄂东民众蒙受重大损失。仅黄冈一县被惨杀的群众就达三百余人。三十九军违背五师指战员和边区人民的合作意愿，不仅没有调解鄂东问题，反而充当反共磨擦的帮凶。

李先念给刘和鼎的公开信虽然对三十九军没有起到明显的统战作用。但依然闪耀着李先念统战思想的光辉。它使反对内战的一切爱国者看到了新四军第五师团结抗日的一片真诚，看到了李先念呼唤友党友军真正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心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到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本质，促使广大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日旗帜之下，满腔热情地拥护和支持新四军第五师，使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成为拥有近5万余人主力军和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成为中原战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詹道喜

黄冈人投身黄埔军校为全省最多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马林建议，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至1926年10月5日第四期毕业，毕业学生4981名，其中湖北省276名中有黄冈人97名，占全省人数的35.14%；加上当时隶属安徽省的英山县41名，共138名，再加上未及毕业死难2人，总共140人。占全省人数一半还强。现分期分县列表统计如下：

	合计	黄冈	红安	麻城	罗田	英山	浠水	蕲春	武穴	黄梅
第一期	10	3				5			2	
第二期	15	1	2	1	3	3		1	1	3
第三期	68	2	6		11	33	4	3		9
第四期	47	8	4	2			3	9	8	13
总　计	140	14	12	3	14	41	7	13	11	25

附注：黄冈即今团风县和黄州区

为了保存资料，特将具体名单及部分人的简况录于下：

第一期

徐会之(1901——1951)，黄冈宋家坳梨子垮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连队党代表，1938年7月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同年升中

将主任，先后任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五行政区督察专员、汉口特别市市长。1949年初任李宗仁代总统的总统府参军，1950年11月去台，1951年11月为祖国统一大业牺牲。

韩　浚(1894——1989)，黄冈傅家河下林塆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在校曾加入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入伍生团队排、连长。1925年9月同陈赓一路赴苏联学习军事，半年后被召回国参加北伐，后被捕入狱，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后历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四十八师政训处长、一〇四旅旅长、七十一师师长、七十三军副军长、中将军长等，1947年在山东莱芜战役被解放军俘获，1961年获特赦，翌年回湖北，为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五、六届常委，文史专员，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89年9月病逝。

张其雄(1902——1927)，武穴市张德先塆人，1922年在武昌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生队，为中共党小组长，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成员，毕业后任教导团连队党代表，后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副主任，授少将军衔，在北伐中积劳成疾，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政变，张隐藏于汉口太古码头地下室，未能及时就医逝世。

彭干臣(1899——1935)，英山县落令河人，1923年12月加入共产党，翌年入黄埔军校学生第二队，12月任教导一团党代表，1925年5月中共中央派其赴苏联学习，翌年奉召提前回国参加北伐，后任武昌卫戍司令部参谋长，1927年潜回英山发展中共组织，奉命赴南昌协助筹划并参加“八一”起义，任南昌公安局长，卫戍司令兼政委，9月任红十五军第一师师长，1928年为中央军委委员，1930年调任满州军委书记，11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敌特跟踪，遂潜返上海，1932年初到苏区任红十字团参谋处长、彭杨军校校长，翌年9月遭诬陷被囚禁，1934年11月方志敏干预重被起用，即协同方等率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

在赣东北怀玉山陷敌重围，战斗牺牲。

傅维钰(1901——1932)，英山县土门坛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生第一队，同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北伐、“八一”起义，在江西会昌大柏山与钱大钧部作战中任主攻立功，后被派赴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任上海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部长，翌年接替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1932年3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段重智，英山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生第四队，毕业后留校在经理科大队工作。

金仁宣，英山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中共党员，1930年1—5月曾任中共英山县委书记，英山县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党代表。

一期毕业还有英山郭德昭(学生第二队)、黄冈张开铨(学生第四队)2人情况不详。

第二期

萧人鹄(1897——1932)，黄冈县程德岗萧家垮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未及毕业，即被孙中山先生提为侍卫官，随孙上京，1925年5月任中共豫陕区党委委员，1926年任河南省首任农协委员长，翌年春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委，6月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二十四团团长，回家乡黄冈招募新兵300余人开赴九江，补充开赴南昌起义的部队，他调任二十四师参谋长率部留守九江，后任鄂中特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河南省军委书记，11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建立党支部，并任书记，1932年2月10日被秘密杀害于洛阳。

黄天玄(1896——1951)，蕲春县黄八通垮人，1924年入黄埔

军校，加入国民党，1926年随军北伐，1930年3—5月任广济县长，1937年随十三师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后参加台儿庄、武汉会战，1940年任七十五军少将主任、后任少将参议，1949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里率部起义，1951年12月1日以“反革命罪”被杀，1983年经成都军区军事法庭重审，予以平反，并恢复起义将领名誉。

吴道南(1897——1926)，即吴亮寅，黄梅县吴八元村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共产党，参加东征、西征，1926年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连长，在湖南醴陵泗汾之役激战中阵亡，团长叶挺亲书泗汾之役和吴牺牲经过的《战斗详报》。

程俊魁(1901——1928)，黄梅县程家畈人，1923年在武汉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回黄梅，和李子芬等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办平民学校，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秘书，随军北伐，后调任第二军教导团政治教导员，1927年回黄梅，任中共黄梅县委军事部长，后党组织派他到江西赣州工作，1928年牺牲于赣州。

王一飞(1904——1968)，原名国钧，黄梅县王新屋人，1923年秋在武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入黄埔军校，转为中共党员，后党组织派其入西北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任参谋长、第六军政治顾问，在该军发展中共党员，1927年5月调武汉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9月赴苏联学习，结业留苏工作20年，1947年5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俄文编译组长、东北局宣传部俄文编译局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兼北京俄专副校长、北京图书馆党组书记、副馆长等职，1968年1月在北京逝世。

田　齐(？——1985)，原属红安，后随区划属大悟，1924年入黄埔军校，曾任炮兵团长、北平警察局总局长。

王伯苍，又名泽润(1897——1927)，罗田深水河人，早年在外

地读书，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相识，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回国，经周恩来介绍参加黄埔军校辎重科学习，年底，他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萧人鹄等倡仪组织军校唯一的革命组织“火星社”，翌年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选，他同周逸群当选为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 年 9 月毕业，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某师党代表，在东江战役中颇具战功，北伐时曾任叶挺团经理部处长。1927 年在广东“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殉难。

张麟舒，罗田人，黄埔军校毕业，1948 年曾受少将军衔。

二期毕业还有罗田王孝同，英山陈济光、陈军锋、姜筱丹，武穴张锦堂，麻城严正，红安张崴等 7 人情况不详。

第三期

汪化霖(？——1937)，黄冈总路咀夕阳冲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任十八军六十七师四 0 一团副团长。1937 年 9 月在保卫上海的抗日战争中，他带一个排掩护全团构筑工事，反复冲杀，他同全排壮烈牺牲。

胡骏逸，浠水关口人，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在汉口以摆摊贩作掩护，担任党的地下联络工作，1933 年 10 月因汉口环境恶劣，辗转黄冈、洪湖，不久战斗牺牲。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石衡钟(1905——1931)，黄梅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 1927 年加入共产党，1929 年任红八军五纵队连长、营党代表，后任红八军四师团政委、四师政委。1931 年在兴国良村战役中负重伤，送医院途中牺牲。

张骥骞(1904——1928)，黄梅垅坪山人，1924 年在县城帅家新屋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任汉口硚口区

党委书记，1926 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营长，后任团长、师参谋长，1928 年在江西阵亡。

张获百（1901——1928），黄梅王家桥人，黄埔军校步兵队，在校加入共产党，后参加北伐，任四军、六军师政治部秘书、连长。1927 年秋回黄梅，1928 年 5 月任中共黄广区特委书记，同年 9 月 18 日在九江被捕牺牲。

刘志达，又名刘应先（1903——1929），黄梅刘岳人，黄埔军校步兵队，在校加入共产党，1926 年北伐任叶挺团连长，攻克武昌后任湖北教导团营长，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上井岗山，1929 年任红军团长，同年在莲花战斗中牺牲。

梅祖尧（？ ——1938），黄梅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抗日战争中任黄梅县自卫总队副大队长时，与日伪勾结，驻英山一七六师将其处决。

潘笑清（1899——1986），红安七里坪上潘家河塆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任排、连长，参加北伐，192 7 年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科长、少将团长、九十七军八十二师师长、九十七军副军长，1949 年由云南去台湾，任金门马祖前线司令官，1986 年 8 月 13 日在台北病逝。

杨啸伊，红安华河台南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届国大代表，1947 年授少将军衔。

陈光桥，红安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1931 年曾为国民会议代表。

方 暾（1904——1985），罗田黄丝铺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任第一军九团某连党代表，二十一师某连连长，参加北伐，1931 年升八十八师少将参谋长，1948 年任一二八军副军长，1949 年升中将军长，同年 12 月通电起义，所部改编为解放军一六七师，

方任师长，1954 年转业地方，任湖北省文史馆馆员，后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研究员，1961 年兼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处长，1964 年为省政协常委、顾问，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常委、顾问，1985 年 2 月在武昌病逝。

叶启贤，罗田人，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第四期步兵第二团四连排长。

汪　淼，罗田人，黄埔军校骑兵科毕业，1948 年曾任罗田县县长。

姜镜堂（1902——1931），英山杨家坊人，黄埔军校步兵队，1925 年加入共产党，北伐中先后任连长、营长，1927 年奉命赴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回英山，开办平民夜校，组织抗租抗粮，秘密发展共产党员，1928 年 10 月创建中共英山特委，自任书记，1929 年夏特委改为县委，仍任书记，11 月调皖西组织六（安）霍（山）武装暴动，任总指挥，开辟皖西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30 年任红十一军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旋为鄂豫皖边区特委委员。1931 年任中共皖西分区特别临时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任红一军第三师政委、红四军第十二师政委、皖西北特区军委分会主席，1931 年 10 月被张国焘错杀。

段朗如（1903——1939），英山土门坛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随军北伐，历任连、营、团、旅长，“四一二”政变后，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掩护共产党员。抗日中 1937 年 5 月升少将，在庐山战役中歼灭大批日军，立一等功，升中将师长，1939 年率部反攻南昌，重创日军。因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政见不合，顾以“通共”罪名报蒋介石批准，将其杀害。

段茂霖（1905——1975），英山瓦前寺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排、连、营、团长，抗日中 1938 年升少将处长，1939 年任七十九师师长，率部投入浙江仓头战役，痛歼日军，扭转战局。1941 年奉命

包围新四军。旋又奉命率部反攻浙江衢州，收复失地，升九十八军中将军长。抗战胜利后，调任整编五十七师中将师长，卷入内战，1949年去台湾，改任战略委员会委员，1975年8月在台北病逝。

熊受暄(1903——1931)，英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步兵队，翌年加入共产党，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后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前委秘书长，1931年5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错杀。

姜佐文，即章夷白(1905——1984)，英山马家堑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留校任第五期入伍生队七连排长，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北伐，在第三次进攻南昌时双腿重残，离任赴汉口市委做地下工作，后任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干事、中华全国总工会干事，1931年在上海被捕判刑。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赴延安，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先后任中央党校分总支书记、干部处长、秘书长和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副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工业交通财贸部党委书记、人事部局长、国务院人事局局长、内务部副部长兼民政干校校长，全国政协五、六届常委、党组成员，198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彭延祖(1905——1965)，英山彭畈乡人，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历任排、连长，参加北伐，1927年升营长，1928年收复济南时率部最先入城，后任九十三师五九三团上校团长，抗战时任饶浔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升少将副司令仍兼团长。抗战胜利后任胡宗南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去台湾，任"国防部"少将参议，1965年在台逝世。

郝照亭(1905——1982)，英山郝家山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排、连、营、团长，师政治部上校主任，军政治部少将主任，第十军特

党部书记长，安徽保安第一旅少将旅长兼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1949年任一二五军参谋长、第二十一兵团司令部高参，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少将参议，退役后任台湾保险公司顾问，1976年中风，1982年在台逝世。

段焱华(1903——1932)，英山县竹坳亭人，黄埔军校步兵队学生，中共党员，毕业后参加北伐，攻克武昌后，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1927年初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参谋长，后参加南昌“八一”起义，整编后调第十一军，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后赴江苏工作。1929年回武汉，以开药店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0年，奉命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12月在金寨作战中牺牲。

汪逢渠，英山县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留校经理科大队工作。

傅昆言，英山县人，黄埔军校步兵队毕业后，回英山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曾任英山县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傅锡章，英山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第四期步兵第二团四连排长。

三期步兵队毕业还有英山王会川、王鹗峰、王长庚、王吉树、方柱亭、石象乾、沈继西、沈正和、金达仁、金风远、张捷、张家荣、傅维霞、傅克铭、彭哲夫、蕊景福、叶道九、萧挹南、萧克明、柯正华、柯伯勖、郝翔翥，罗田金邦杰、孙树声、张鹏、张煦秋、黄磊、叶晋之，叶晋，周俊(骑兵科)，浠水王湘、王葆华、徐宗孺，蕲春查汉屏、甘树藩(骑兵科)，黄梅吴求剑、宛志学、梅国瑞、万世珍，红安吴苏民、雷瑞亭、潘汝翼，黄冈夏凌云等43人情况不详。

第四期

林　彪(1907——1971)，黄冈林家大湾人，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共产党，黄埔军校步兵二团三连毕业，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北伐、南昌“八一”起义，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红四军一纵队司令、红四军军长、四野司令员，指挥辽沈、平津战役，七大中央委员，七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5 年授元帅军衔，后经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1971 年 7 月 13 日乘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赵克念，黄冈人，黄埔军校步兵一团四连毕业，1927 年曾任中共黄冈县委军事委员。

吴志勋(1909——1983)，武穴市人，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第一队毕业，先后任排、连长和党代表，“七七”事变后，历任国民党宪兵补充团团长、宪兵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交警总局副局长，制宪国大代表，1949 年任八十五军中将军长，去台湾后任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宪兵学校校长、宪兵中将副司令、“国防部”动员局局长，台湾警备司令部警备研究警察委员会主任委员，1968 年退伍，1983 年 2 月在台北病逝。

伍昌续(1908——1970)，武穴市伍家楼塝人，黄埔军校经理科大队第一队毕业，1926 年加入国民党，随军北伐，历任汉阳县警察局长、武昌县税务所长、武昌保安团团附，抗日初调任十八军十一师营长，参加上海保卫战，1938 年撤江西，任九师二十五团团

长、少将副师长等。1949年3月武汉解放前夕，与中共中原局城工部联系，召在台任青年军二０五师二八三团团长之胞弟伍祖文回汉，协同迎接武汉解放。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劳动厅副厅长、第二、三届省政协委员，1970年11月29日在武昌病逝。

胡希华(1909——1937)，武穴市两路胡胜塆人，黄埔军校骑兵科毕业，后任陆军第一师少校营长，1937年在保卫上海战斗中，率部抗击日军，在昆山阵亡。

梅远志(1900——1962)，黄梅人，黄埔军校步兵二团五连毕业，参加北伐，抗日战争中任副师长，在河南、山西对日作战，后任鄂中师管区和上海师管区少将副司令，解放战争中起义，任民革上海市闸北区副主委，上海第一、二届政协委员。

吴涧溪(1907——1952)，黄梅人，黄埔军校步兵二团七连毕业，曾赴美学习，历任排、连、营、团长，少将师长、高级参谋等职。

周为邦(1895——1928)，黄梅燕窝凶人，黄埔军校经理科大队第一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同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2月回黄梅组织农民武装，任黄梅县人民自卫团长，后任中共黄蕲区特委委员、鄂东军委书记，以黄梅为中心，恢复党组织，成立鄂东游击队，任司令，开展“三杀”“四抗”斗争，1928年为中共鄂东区特委负责人，不久因叛徒告密被包围，于突围中牺牲。

熊煜南(1900——1928)，黄梅县城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大学即参加革命活动，又入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第二队毕业，在武汉做地下工作，1927年回黄梅，以吴致民为领导组织秋收暴动，1928年春节后在省委开会被捕，2月19日同邓雅声等同时被杀害。

李德芳(1904——1930)，黄梅独山街人，黄埔军校步兵一团二连毕业后，任广东汕头农民自卫军部长，1927年8月，奉命同周为

邦、张获百回黄梅组织秋收暴动，同年10月任黄梅县农民游击队负责人，1928年1月被捕，不久越狱逃往南京，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又被捕，翌年1月19日被杀害于秦淮河。

王绍之(1906——1935)，黄梅古角山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黄埔军校步兵一团五连毕业，随军北伐任营长，1928年2月奉命回黄梅恢复党组织，1929年任中共黄梅县委军事部长，1930年调鄂东南特委工作，不久又调红三军团八军任副官处长、团长、卫生部附属医院政委，1935年长征途中，奉命任川南彝民游击队政委，后因该队叛变而被俘，牺牲于冕宁。

韩楚珩，红安上新集人，黄埔军校经理科第一队毕业，曾任军管区政治部主任、三青团湖北团支部书记。

四期毕业还有黄冈许致和(步兵一团一连)、熊保华(步兵二团六连)、孙梅(经理科大队第二队)、吴东(同上)、张景惠(政治科大队第一队)、谌杰(政治科大队第二队)，红安陈彰环(经理科大队第二队)、程挟超(经理科大队第一队)、袁钺(政治科大队第三队)，麻城石磊(步兵一团三连)、夏泳寰(步兵二团二连)，浠水王崇仁(步兵一团九连)、王遵礼(步兵二团九连)、杜宏(经理科大队第一队)，蕲春华实(步兵一团五连)、方同书(步兵一团六连)、邓超(步兵二团七连)、邓锡祥(步兵二团八连)、陈式玉(工兵大队通信队)、李继武(经理科大队第一队)、叶士元(同上)、翁敬德(同上)、龚宝珊(政治科大队第一队)，武穴舒振世(步兵二团七连)、许楚材(经理科大队第一队)、郭英英(同上)、郭典威(政治科大队第一队)、何文俊(同上)，黄梅何士(步兵一团七连)、廖辅仁(步兵二团二连)、骆逸尘(步兵二团八连)、黄学易(步兵二团九连)、于树屏(经理科大队第一队)、陈庆芳(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刘志寰(政治科大队第三队)35人情况不详。

以上一至四期毕业138人，还有未及毕业一期的武穴刘赤忱，

在平息陈炯明叛乱的战斗中中弹牺牲；三期的蕲春陈晋，在“沙基惨案”中死难。

在总共投身黄埔军校 140 人中，英山最多，这是得力于该县辛亥元老傅慧初，黄埔军校成立，傅在上海秘密招生，英山青年投奔黄埔军校者多由傅介绍；还得力于该县在上海创办“联合通讯社”之李次山积极支持与出资相助。

笔者遍寻资料，写成较详和只知一二的共 51 人，加上未及毕业死难 2 人，还有 87 人一无所知，不无遗憾。敬请知情者补正，是为幸甚。

□贺全斋

鄂东走出的外交官

鄂东名人荟萃，代不乏人。小时就听到许多鄂东叱咤风云人物的传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这方面的资料更多。现从中选撷几位著名外交官的事迹作一简介，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郭泰祺——资深职业外交家

郭泰祺，1888年出生在广济县（今武穴市）郭家冲塝，1952年病逝于美国加州医院。他的一生，基本是在外交生涯中度过的。

郭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前清秀才，所以他从小就得到很好教育。16岁被清政府选送到美国留学，由中学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政治学。21岁获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并获奖学金进研究院深造。1912年3月学成回国，开始从教，旋即任湖北都督府外交股长，加入国民党。不久追随黎元洪，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兼外交部参事。黎被迫退位后，郭投奔孙中山，先后任大元帅府参事、非常大总统府参事、兼宣传局长，还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宁汉分裂时，他依附蒋介石，为其办理外事，受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明令通缉的处分。蒋汪合流后，通缉令自行消失。1930年，蒋、冯、阎新军阀对峙，郭加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盟，失败后去南方。后来加入汪精卫、唐绍仪等人组织的广州政府。1932年1月，郭在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

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就在这时，他给中国现代外交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打退了日寇的一次次疯狂进攻，粉碎了日寇妄图4小时之内占领上海的梦想。可是，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却命令十九路军退守待命，派代表同日本谈判，使淞沪抗战毁于一旦。当时，郭泰祺被指定为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他秉承蒋的意图，与日方代表重光葵拟定了《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使日本在上海许多地区获得长期驻兵的权利，而中国军队反不能留驻上海。消息传出，群情激愤。5月3日，上海各救国团体和学生代表赶赴郭泰祺住宅质问，痛斥其辱国行为，群众掷铜元数百枚将其头部打伤。郭泰祺不顾群众反对，还是于5月5日在医院里在该协定上签了字。

《协定》签字后，国民党政府也许是碍于社会舆论，欲缓和事端，便于当月派郭泰祺赴英国，任中国驻英全权公使，兼任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1935年5月，驻外使节升格，郭为第一任驻英全权大使。郭这次出使英国，渐渐察觉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不得民心，是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他决心站在民族立场，为抗战疾呼。在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后，他经常向国联提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奋力反对承认伪满洲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照会国联，要求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侵略；并努力争取外援，抗击侵略者。重申：“我国此次抗战乃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非至敌人放弃其侵略政策，绝无和平可言。”1939年8月，英政府将所拘涉嫌刺杀汉奸程庚锡的中国同胞移送日本侵略军，郭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日英政府又以中国领土作交易，签订了有关在日占区江岸海关税款交付的协定，郭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抗议，表明坚决维护中国主权的严正立场。

蒋介石对郭在国外疾呼抗日的行动极为不满。1941年4月，令郭回国，委以外交部部长。蒋为何对不满意的人却委以重任？据随郭任秘书多年的李铁铮讲，在郭就任外交部长之前，蒋先属意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充任，事为前侍从室掌人事的第二处处长陈果夫所闻，乃上一签呈，提出充任外交部长人选需具备三个条件：一、与国民党有悠久的历史；二、系职业外交家；三、与英美有渊源。此三条均对王世杰而发。王为对付cc系攻势，乃向蒋推荐其把兄弟郭泰祺以自代。而郭固合此三条件，乃坐收渔人之利。

蒋委郭以外交部长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即属意戴笠之流制造把柄，拉郭下台。不久，山城重庆到处传布郭泰祺的桃色新闻，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女作家韩素音在《无鸟的夏天》中谈到："民国三十年〈1941〉初冬，一场反对外交部长郭泰祺的政治阴谋逐渐形成，一时重庆的社交界，上层人物，不谈饥荒，不论救国，而专论一部长的桃色新闻，这是一场反对外交部长郭泰祺的政治阴谋。"蒋的阴谋很快得逞，在郭当外交部长不到8个月的时间，便将郭撤职，调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虚职。郭对此愤恨不已，乃离重庆赴美侨居。

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委任郭泰祺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席代表〈3—4月任安理会主席〉，同时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1947年12月调任巴西大使。1949年，郭离开巴西首都约热里卢，退隐于圣巴巴拉。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曾表示欢迎郭回国工作，他因病未能成行。

张彬希——侨民树过"德政碑"

侨民为外交官树碑立传的事，见于张彬希传略。也许是孤陋寡闻，我觉得在中国外交史上，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884年出生于黄梅县下新镇的张彬希，而立之年毕业于海参崴东方大学，成绩优秀，俄文极佳。毕业后在哈尔滨吉林铁路交涉总局当俄文翻译，之后又担任过中俄会审公堂会审员、驻库伦办事大员公署秘书。1919年，任驻俄国庙街领事。

庙街，位于黑龙江口北岸。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这里还是沙俄统治区，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也有很大势力。1920年春，俄国红军进攻庙街。沙俄为对抗红军进击，大肆征兵，强迫侨民服役，华侨惊恐不已。张彬希领事为保护侨民安全，再三与沙俄政府交涉，方使华侨免予服役。

在红军与日俄军激战中，日本领事馆被炸毁。不久，日军为了报复，驶来大队军舰进攻庙街。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开始。此时，庙街陆路交通断绝。张彬希为了救护侨民出城避难，购置了50余艘大帆船和大批粮食，率领所有华侨从水路逃出庙街。

一场激战后，庙街又成了沙俄、日军的势力范围。华侨也返回庙街定居。日军欲补偿战争的耗费，与沙俄密谋，要中国领事馆把华侨在庙街经商所得价值150余万元的黄金全部归日、俄所有。对此，张彬希严词驳斥，日、俄只好作罢。为安全起见，张同领事馆人员迅即护送华侨暂离庙街回国避难。后来庙街局势稳定，张彬希奉调离任回国，华侨依依不舍，乃派代表赴京，赠以万民衣、万民伞，送上“侨民保障”的匾额，并在山东烟台为张树起了一座“德政碑”，铭刻其事迹，以志不忘。

张彬希从事外交工作20余年，没有任过高职。庙街领事任满后，出任过茨克领事，代理西伯利亚总领事，也在南京政府外交部任过职，终因不愿与众官吏同流合污，于1935年被外交部免职。后来弃政从商、从教。从1948年至1965年，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任俄文教授。1977年于武昌病逝，享年93岁。

刘文岛——促成使节升格的功臣

从1934年10月以后，中国驻外使节渐次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飞跃。促成这一飞跃的外交官就是刘文岛。

刘文岛，1893年出生于广济县(今武穴市)武穴镇，1967年病逝于台湾。在他一生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除了在小学、中学和保定军校学习，以及在日本、法国留学外，有40多年的宦海生涯。先后担任过唐生智第八军党代表兼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包惠僧回忆录》中记载，刘被授过上将军衔——笔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等军职，还当过汉口特别市市长。当外交官不到7年时间。可他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就只当过外交官。

刘文岛确有一副外交官的派头。他人材出众，风度翩翩，善于交际，八面玲珑。1931年9月，出任驻德全权公使，11月又兼任奥地利全权公使。1933年9月，调任驻意大利全权公使。当时，中国驻各国使节均为公使级。刘到意后，积极为使节升格进行活动。经不断与意交涉，终于1934年11月，中意两国同意互换大使。刘被任为中国第一任驻意大利全权大使，也是中国驻外的第一位大使。自此以后，中国驻其他各国使节，均援例陆续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刘在意大利当了4年外交官，于1937年11月离任回国，在国民党同僚中，对他颇有微词，说他在国外生活作风放荡不羁，是“风流大使”。还传言，他经手在意购买的几百架飞机，运回国后，发觉全是废品，蒋介石盛怒之下，令其免职回国。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有人为此事辟谣，说买回的飞机是好的，只是飞行员没培训好，

飞机无人驾驶。刘的回国是由于意大利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反对，公然承认伪满洲国，刘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随即下旗回国。不过，刘回国后，不为蒋介石重用是事实。一段时间，只委他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闲职。刘在此期间，则于重庆从事著述。1948 年，国民党闹大选骗局，刘积极活动，才当选为立法委员。

1949 年解放前夕，刘文岛抛妾弃子赴台，长期赋闲，直至病逝。遗著有《政党政治论》、《行业组合论》、《行业组合与教育思潮》、《意大利史地》等，均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骆介子——学者型的外交官

外交官中不乏学者，骆介子就是这一类型的外交官。

骆介子，1902 年出生于蕲春县刘公河骆家塝。早年毕业于九江同文书院。“五四”运动以后，在本县参加革命活动。1927 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骆遭通缉，四处流离，后来逃到海外，先后在澳、英两国继续学习，获澳洲雪梨大学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哲学博士。从 1935 年起，开始外交生涯，历任中国驻英国特派员、驻澳大利亚领事、总领事，及澳洲《民报》(此报原是孙中山在澳洲悉尼创办的)社长兼总编辑。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期间，积极参与国外学术研究活动，留心考察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积累素材，认真研讨，勤于著述。他撰写的《澳洲建国史》，介绍了澳大利亚最初的发现，英国殖民澳洲之开始、澳洲各州政府的建立、澳洲联邦政府的形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澳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之状况。全书约 10 万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填补了澳史的空白。此外，他还著有《南太平洋岛国史》、《清末外交失败史》、《国际公法》等。这些名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早年发行海内外，有的被大专院校作教材。

抗日战争爆发后，骆离澳回国，在重庆任海外部宣传处长。抗战胜利后，辞去行政职务，专心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武昌中华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桂林广西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大学担任教授、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1949年8月，骆同黄绍竑、刘斐等44人在香港起义。是年年底回到北京，担任外语学院教授。随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始，担任国务院参事。1990年在北京病逝。

陈家康——许多重大国际事件参与者

当外交官的很多，外交官能参与几桩重大国际事件的不多，而陈家康是一位幸运者。

陈家康的幸运，首先还在于他有幸较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1913年出生于广济县(今武穴市)陈福禄垱，192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兼四科科长。“七七”事变后，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周恩来秘书。1940年后的三四年间，历任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委员、外事组副组长、党组成员，兼周恩来英文翻译。1944年调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及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第一科科长、《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负责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员会联络处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及中共代表团上海发言人。1949年随中央机关进北京，不久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1950年调外交部，先后担任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和部长助理。1956年出任中国驻埃及全权大使，兼任驻也门公使。1965年底奉调回国，任外

交部副部长。

陈家康从事外事工作期间，参与过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夜，由中、苏、美、英四国发起的《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参加国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幕，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两个月，于6月26日闭幕，董必武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会议期间，作为董必武秘书的陈家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同年10月24日，根据《联合国宪章》，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正式成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桩重大国际事件。

五十年代，为了发展我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陈家康，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出席了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万隆国际会议，还随同周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陈家康参加了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项倡议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家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70年7月含冤病逝于外交部“五七”干校。1980年5月，中共外交部党组为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余　湛——致力于外交工作40年

余湛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一生中，有大半生致力于发

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1921年出生于英山县石头咀镇的余湛，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奔赴延安，从事无线电机要技术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军区和中央军委负责无线电技术干部培训。1950年调到外交部，开始外交生涯。此后，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等秘书及政务参赞、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驻加拿大全权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余湛致力于外交工作近40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坚决贯彻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贡献。他对工作极端热忱，认真负责，哪怕是对反对者，也要设法做好工作，变阻力为动力。他在出使加拿大时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加拿大议会中有一位加籍捷人的议员，担任了所谓“加拿大台湾委员会”主席，与台湾当局往来频繁，勾结紧密，对新中国极不友好，是发展中加友好关系的一个绊脚石。余湛发现这一情况后，想办法亲自去做这个议员的工作，用我国无私援助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唤起他的良知，终于使他感到仅仅为了做生意赚钱而讨好台湾不是一个正直政治家的品质，甚感惭愧。不久，他主动辞去了“加拿大台湾委员会”主席职务，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后来，他出任了加拿大政府中的一个部长，在发展中加友好关系中起了积极作用。加外长赞扬余大使会做工作，把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

“既当大使，又当‘贸易部长’”。这是余湛的同事们对他既是开玩笑又是褒奖的话。一次，我国南方某市派员去加拿大买3架飞机。这位大员没有向中国驻加使馆了解情况，以每架飞机1200万美元的价格和加方签订协议后，直接回国。余湛得知这一情况，觉得这是个较大的贸易数目，应该慎重。经了解，当时加拿大这种型

号的飞机每架售价是760万美元，估计经过谈判，还可少于此数。为此，余湛迅即发电回国询问，了解到虽已签订协议，但未付定金。按惯例，若付了定金，协议就能生效。为了减少损失，经多方交涉，余湛出面和加方谈妥，将这种型号的飞机以每架600万美元卖给中国。这一下使国内南方某市减少了1800万美元的损失。

这就是余湛。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切为了祖国利益的外交官。

1992年，余湛同志在北京病逝。

□杨行义

1998年5月18日于黄州

鄂东清末留学生及其革命活动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宗教、鸦片和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值此清政府屈膝于帝国主义怀抱，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之际，湖北各地尤其是鄂东（今黄冈市），涌现出一批“头脑新法，志气不凡”（孙中山语），立志远涉重洋，向海外求索强国富民之真理的青年学子。

曾任湖北学政、湖广总督近20年的张之洞，针对当时政治积弱，吏治颓废，科举腐败的情势，为了达到振兴清皇朝之目的，极力提倡“新政”，办工厂，练新军，兴学堂，主张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留学，以培养一批急需的军事、警务、政治、教育和科技人才，于是留学之风应运而生。

一

由于湖北位于风云际会的要冲，加之张之洞对出洋留学鼓吹甚力，因此，湖北是清末出国留学生较多的省份之一。

清末鄂东各县派遣的留学生约160余人。其中黄冈、蕲春、广济（今武穴）、浠水4县居多。留学德国的有蕲春张九维、张明昌；留学美国的有黄梅石美玉（女）、广济郭泰祺、黄冈严绂苹、麻城郝映青（女）；留学比利时的有罗田潘宗瑞、红安刘荫拂；留学澳大利亚的有蕲春童德乾、夏恒升；留学俄国的有黄冈严式超、黄梅张彬希；

留学法国的有浠水汤芗铭(后又留学英国)、广济饶亦谷、向导;留学瑞士的有蕲春童德禧。以上约占鄂东清末留学生的10%,其余90%皆为留日学生。

黄梅大河的石美玉是留学生中最早的女性。她1892年秋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医学博士。1896年谢绝外国高薪聘请,毅然返梓。在九江、上海等地办医院、妇科专科、护士培训班、伤残诊疗所、孤儿院、教义学校等。还将西方若干重要医学名著译为中文,为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石美玉的动人事迹,当时的《申报》、《时务报》、《湘学报》、《留美学生季报》均大加赞许。她的胞妹石菲比,也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医学博士。1918年回国后,曾担任石美玉筹建的唐福斯骨科医院院长。

鄂东最早官费留学有广济的陈文哲和英山的傅慧初。陈文哲1900年入东京高等师范习理化。在日本出版《物理学》、《化学》、《矿物学》三部教科书,并以稿酬资助自费留日的湖北籍学生。1905年回国,在武昌创办省立优级师范理化专修学堂,任堂长。后任清学部员外郎兼北京图书馆行走、民国教育部图书编辑处主任、湖北省教育厅官书处主任等职。英山傅慧初1900年秋入日本警务学校,1902年进明治大学法科学习。

在广济太平山区的下彭塝,1905年曾涌现出一家三人赴日留学的事迹。该塝的彭汉一(仲卿)偕妻吕慧英随胞兄彭汉遗自费留学日本,汉一入东京经济学堂,慧英先入工艺专科学校,后毕业于东京成女师范学校,与秋瑾过从甚密。慧英精于刺绣,夫妇半工半读赖以完成学业,并参加同盟会。

鄂东兄弟二人竞相出国的有浠水汤化龙(武昌起义任军事部长,1913年任众议院院长,袁世凯执政时任教育总长)和汤芗铭(任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蕲春的田桐(后来任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和田桓(一直随侍孙中山,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

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等。

1901年浠水高秋浦得亲友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并加入同盟会。

1902年麻城周龙骧、浠水李鑫选派日本弘文师范科。黄冈程明超、杨金榜，浠水何炬新等赴日本习法政、警务。程明超先入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考入京都帝国法律学科。1908年毕业回国应殿试，获一甲第三名，赐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北洋政府时任教育部长，1910年为资政院钦选硕学通儒议员。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平政院评事、两湖巡阅使公署机要处长。杨金榜入弘文学院习警务；何炬新入明治大学习法政。

1903年至1904年，鄂东留学趋于高潮，共计有80余人。

黄冈县有17人，其中1903年留学的有10人：严式超(赴俄，入法政大学)、黄世芳、祝长庆、程耀楚(自费)(入日本同文书院)、沈仪容(自费入日本弘文师范科)、郭会雯(入日本成城学校)、徐映奎、余维涛(日本，预备入校)、姜明经、谢式炜(入日本振武学校)。1904年留学的7人：李四光(入日本弘文学院，1907年又入大阪高工，1913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程守箴(入日本士官学校步科)、郑以孝(自费)、沈增棋、吕嘉荣、赵俊华(入弘文师范科)、张仲文等。

浠水县这两年派出留学的有7人：孔庚(1903年入日本士官学校习陆军)、高声震(1903年入士官步科)、陈植青(1903年入振武学校习陆军)、苏钟正(1903年预备入校)、陈曾寿(1901年中举，1902年中进士，1904年被选送留日)、郭焕周(1904年入东京经纬学堂)、汤芗铭(1904年赴法，后赴英习海军)。

蕲春县有7人：张九维(1903年赴德习骑科)、陈乾(1903年入日本振武学校步科，后入户山帝国陆军大学)、蔡汇东(1903年入日本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习法律)、李觐光、夏铭鼎(1904年

入日本弘文学院)、汪应蟾(1904年入日本弘文学院,后入东京实科学校)和田桐。

罗田县有8人:匡一(1903年入东京法政大学)、潘宗瑞(1904年入比利时白耳义公学)、张振武(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李碧、许伟(1904年入日本弘文学院)、许光棣、黄云凤(1904年自费入弘文师范科)、姚葵常(1904年入日本成城学校)。

此外,广济有郭泰棋(190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解鸿顺(1903年自费入日本弘文师范科)、彭祖庚(1904年自费入日本同文书院);红安有刘荫拂(1904年入比利时白耳义公学)、刘钟秀(1904年入东京成城学校,后习海军)、刘芬、石阶、阮复;英山有傅笠渔(1904年入东京经纬学校师范科);麻城有程荫南(1903年自费入弘文师范科)、余诚(1904年自费入弘文师范科)、周维桢、余祖言(1904年入弘文学院)、夏建民(1904年入早稻田大学)、余仲勉(1904年留日)。

1905年鄂东出国留学生约30人。如广济居正(入日本弘文学院和法政大学)、饶汉祥、彭汉遗、吴道南(入日本法政大学)、刘质含(入日本仙台高工矿治)、彭汉一、吕慧英等;罗田叶佩薰(入日本士官步科)、王楚乔(入日本弘文学院)、涂宗仪(入日本弘文师范)、周复等;蕲春黄侃、袁之舆、陈锡恩(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张焕华(入日本明治大学)、詹延云、张步蟾、朱嘉蔚、张伯赅等;黄冈刘子通(入日本攻读心理学)、王绂伟(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吴昆、范镛、冯镇坤、易启瑞等;浠水何焜阁(入日本弘文书院)、毕惠康(入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理化科);红安刘彝、杨伯勋,英山查光佛,黄梅李叶乾等。

1906年鄂东出国留学的有:黄冈严拔苹(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倪启端(入日本西京法政大学),浠水汤化龙(入日本法政大学),麻城曾学鲁,红安刘鹗等。

1907年至辛亥革命，鄂东留学者均未间断。有黄梅张彬希(1907年官费留俄，1914年毕业于海参崴东方大学)；黄冈施泽炬(1907年)、祝兰亭(1907年)；蕲春张丙炎(1907年)、袁焕(1907年)、江继凡(1908年)、童德禧(1909年留学瑞士)、张明昌(1909年留学德国)、田小玉、田子玉(1909年)；广济李钟岳(1907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彭亚男(1909年)；红安杨源(1911年日本仙台高工)等。其间，以1911年居多，这一年仅蕲春派往日本入蚕科学校的有周展其、周爱堂、周先五、周述泉、周纯峰、周斗枢、张承元、张旭东等。

由于资料不详，还有一些留学生很难叙述其留学的准确年份，如英山郑象伊(日本明治大学经纬分校警务本科)、郑遐济(日本振武及士官学校兵科)、郑衡之(明治大学法科)、段瑞兰(明治大学法科并警监学校)、段兆龙(日本高等警备学堂)、王乐臣(东京经纬学校)、吕士志(日本高等警察科，法政大学自治科)、傅象求(日本铁道大学管理科)、施锦淙(日本经纬学堂普通科，日本大学专门法律科)、郑迪光(日本求实中学)、郑象坤(明治大学法律科)、叶庶光(东京铁路专门学校)；黄冈余光国(日本大阪高工)、殷盘(日本铁道工程学校)、丘鸿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夏占奎(日本士官学校)；浠水王国声、汤伟强、卢保衡、李悍载、郭仲生、袁之舆；广济张绍良(1909年毕业)、李渭宾(1911年返国)、胡宗铨、吴文升、李育宇、任秉初、张制新；黄梅徐安石(东京法政大学)、李明彻(1908年毕业)、高树藩(1908年毕业)、朱润时(1911年毕业于明治大学)；罗田罗洁、匡贻楷、许伯华、叶南陔(入日本弘文师范)；麻城屈佩兰；红安张文烺等。

二

清末鄂东留学生由于受“西学”、“新学”的熏染，涌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勇于求真理”的人物，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他们不顾清廷“退学”“惩办”的威胁，接受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思想，积极筹建“中国同盟会”，勇敢投身于辛亥革命，为反对列强，推翻满清帝制，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辛亥革命前，鄂东境内已纷纷建有“光黄学社讲习社”、“自新学社”、“黄冈军界讲习社”、“证人学会”、“孝义会”、“崇汉会”等社团，借以联络革命志士，聚结民族精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唤醒民众。

1903 年，黄冈程明超等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后改名《汉声》)，宣告要与清政府“喋血苦战”“以光复祖国而振大汉之天声”，是为留学生以本省名义创办革命刊物之先河。

这一年，浠水孔庚与云梦吴禄贞等在武昌花园山秘密成立革命组织。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参加“铁血丈夫团”、“革命本团”、“死友”等组织。当时，鄂东留学生还积极参与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的运动。

1904 年 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党，接着又在美洲改组致公党，1904 年底赴欧洲，1905 年春在欧洲建立同盟会。当时在德国留学的蕲春张九维赶往英国伦敦，欢迎孙中山去柏林宣传革命。在柏林，张九维及同学二三十人宣誓签名，加入欧洲同盟会，留学法国的汤芗铭也加入了欧洲同盟会。

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重返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7 月 3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预备会，有来自 17 省的 70 余位留学生代表入会。蕲春田桐、广济居正、罗田匡一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

议决定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为革命宗旨。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到1906年，湖北有33个县的留日学生计106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鄂东阵容最大，实力最强，约有40余人。黄冈有吴昆、刘子通、李四光、张仲文、吕嘉文、姜明经等；浠水有孔庚、汤伟强、毕惠康、何炬新、何焜阁、卢保衡、李悍载、郭焕周等；蕲春有田桐、陈乾、汪应蟾、詹廷方、朱嘉蔚、张焕华等；广济有居正、饶汉祥、彭汉遗、彭仲卿、吴道南、彭亚男等；英山有傅慧初、傅笠渔等；罗田有匡一、许伟、罗洁、涂中仪、周复等；麻城有余诚、周维桢、夏建民、曾学鲁等；红安有刘彝、刘鹞、刘芬、石阶等。

当时在日本东京同盟会被誉为鄂籍“四杰”者，是蕲春的田桐、广济的居正、黄冈的吴昆、天门的白逾桓。鄂东竟占了三杰。

田桐，蕲春田家河人。参与了1905年迎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的活动，是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任同盟会书记部总理书记，佐孙中山办理文书，是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执笔者。还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动员“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百余人加入同盟会，为该会的成立与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武昌起义时，任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协助黄兴守汉阳。后任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起兵讨袁，又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积极配合北伐军事行动。田桐为辛亥革命，肇建民国，立下殊功，被誉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中国近代的政治家”。

居正，广济居文胜人。1905年参与同盟会筹建工作，对立宪派变相保皇的阴谋作了坚决揭露。1907年夏，与孙武、张百祥发起“共进会”，又赴新加坡协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以“药石”笔名与保皇党《总汇报》笔战经年。又赴仰光，主持《光华日报》，在华侨中

鼓吹革命。1910年参与宋教仁、谭人凤召开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东京会议，回国后在长江中下游组织“中部同盟会”，被推举为湖北同盟会负责人。1911年9月24日，携款3000元赴上海购枪支，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来武汉共谋起义大计。武昌起义，任军政府顾问兼秘书，在汉口大智门阻击清军战斗中负伤。年底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后任国民党司法院长，并以元老身份与蒋介石竞选总统。

吴昆，黄冈鄢家水口人，参加了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选为评议员兼《民报》干事。次年夏，陪同法国武官欧几罗至武昌考察党务，后联络刘静庵、曹亚伯等革命志士加入“日知会”。同吴贡三、殷子衡在黄州设“日新学社”，在团风镇创办“坪江阅报馆”，宣传革命。又随宋教仁至东北创立辽东同盟会支部。武昌起义，任汉口军政分府秘书，后又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并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历尽艰辛。

1905年参加东京同盟会筹备会议的还有罗田匡一。他是1903年东渡日本的，被推荐为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同盟会成立时，被选为内务部总长。回国后，又随孙中山讨袁。后来历任北京政治大学校长、北洋大学教授、天津律师会会长等职。

1905年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中又一位重要人物是麻城的余诚。他是1904年变卖家产自费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加入同盟会主持湖北盟务。因抵制日政府颁布的《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而返回沪滨，襄助创设中国公学，收容留学归国学生。又回武汉与刘静庵合作，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基地，发展同盟会员，并合办留东预备学校，后任中国公学干事，清两江总督端方悬赏5000元缉捕。后被推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1910年病逝于故里。1919年，民国政府建余诚、屈子厚、周干亟三烈士祠。

周干亟，即麻城周维桢。1900年与吴禄贞参加“自立军”大通

起义，去日本后参加创办《湖北学生界》，撰文批驳保皇言论，鼓吹革命思想。回国后，在武汉与刘静庵组织革命机关，积极参与拒俄运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武昌起义，亲至山西作联合革命军人工作，不幸在石家庄被袁世凯秘密杀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念其功绩，公葬于石家庄。

除上述著名人物外，积极参与建立革命组织，在辛亥武昌起义中起组织带头和冲锋陷阵的还有张振武、陈翼龙、张九维、傅慧初、傅笠渔、查光佛、孔庚、黄侃、彭汉遗、姜明经、潘康时、汤芗铭、余祖言等。

罗田张振武，是武昌起义主要组织者之一，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三武”。张原在东京同盟会联络部任职，1909年加入共进会，助孙武建立鄂省总部，担任理财部长，武昌起义前夕，汉口宝善里机关和武昌小朝街指挥部相继被破坏，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出走，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被害，在危急关头，张主动联络各方，不失时机组织起义并一举攻克清督署，占领了武昌城。军政府成立，张以军务部负责人主持军务，抗击清军的反扑，坚守武昌，在战斗中负伤。1912年8月16日凌晨，被袁世凯秘密杀害于北京，全国为之震惊。

罗田陈翼龙，经宋教仁介绍赴日求学，与孙中山、黄兴会晤。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任总干事，又在北京筹办平民学校，后被袁世凯秘密杀害。他的学生邓颖超称赞：“陈先生确属革命忠诚之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应略有记之。”

蕲春张九维，留德6年，先习陆军后学法律。1910年返国，供职陆军部，奉派出席意大利万国竞骑会，荣获金质勋章，并趁机为黄兴组织武装起义募集经费。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为进攻两广总督府衙门先锋队员。武昌起义，张多方组织接应。后任总统府参军，协助组织临时参议院，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并竭力赞助孙中山讨袁，组织护法军政府，历任大元帅府和非常大总统参军、大本营高级参谋。

英山傅慧初，在日本由田桐介绍加入兴中会，转入同盟会。回国后，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活动。辛亥起义时，任安徽省都督府总参事及省临时议会议员。后参与讨袁，随孙中山赴广州，任大本营宣传特派员。又到上海为黄埔军校秘密招生至第五期，仅英山青年入黄埔前五期者就有50余人。北伐军占领武汉，任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前敌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曾三次函劝蒋介石坚持三大政策，蒋不听，傅愤而辞职。

英山傅笠渔，在日本受孙中山器重，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发动苏皖武装起义 。后任临时外交部参事，参与讨袁护国战争，与居正等组建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任外交部长兼总司令部参议。晚年任《新中华报》社长、《大公报》主笔。

英山查光佛，1905年赴日本，旋入同盟会，1907年与居正、孙武等组建共进会，任本部联络部长兼鄂支部助理，并受命为同盟会湖北支部特派员，召开同盟会湖北分会成立大会，积极谋划武昌起义，为孙中山起草第一号布告。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湖北革命总司令部秘书长、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机要秘书、总统府咨询、广州大本营秘书、江汉宣抚使署参议、《中央日报》社总编纂等职。

浠水孔庚，武昌起义时，往来于北京至孝感之间，为革命传递信息。后任晋军总司令，通电反袁。又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讨逆军中央直属鄂军军长、鄂讨贼军总司令。“四一二”事变后，还曾参与邓演达、宋庆龄、董必武等联合通电反对蒋介石。

蕲春黄侃(季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民报》连续撰写反清文章，被取消官费留学待遇。回国后，曾在蕲州高等小学堂两砸“虎头牌”，并深入鄂皖边境11县宣传革命，鼓吹推翻满清。又入武汉共进会、文学社，为《大江报》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使

江汉震动。武昌首义，为阻击清军反扑，返回蕲春，一呼而得“孝义会”义众3000人。民国建立，在上海主办《民声日报》，为新政权欢呼。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黄曾请夫人、上海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为代表提供住处和会场。“九一八”事变发生，黄拍案而起，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号召全国奋起御敌。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国学大师，对我国的训诂学、音韵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在学术上并称清末民初中国四大才子。

广济彭汉遗，1907年由日本归国，协同孙武组织鄂省共进会总部，任外交部长。武昌首义，在军政府任职，又前往黄州，与防营内党人联系反正，任鄂东军政支部副主任、鄂东军政司法部副部长，并被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后任孙中山专使随员，又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国民党护法议员。

黄冈姜明经，武昌首义时率炮兵八标二营响应，并多献战斗良策，旋任炮兵旅长，进攻汉口清军，获捷。黄兴到汉，调任汉阳战时炮兵团指挥官，兼管武昌沿江炮兵防务，后任北京政府高等顾问。

红安潘康时（怡如），返国后在北京、保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武昌首义，任黎元洪顾问，又为总司令蒋翊武襄助军务。激战时刻，组成200余人“奋勇军”，由青山渡江，插黄陂，扰清军后路。后一直协助董必武工作，系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12月26日病逝，董必武有《哭潘怡如》诗并亲撰《潘怡如先生墓表》，《新华日报》以《辛亥革命老前辈潘怡如先生病逝》为题，报道生平事迹。

浠水汤芗铭，赴法、英留学习海军，1908年回国，先后在长江舰队、海军舰队任职。武昌起义时，亲率“海容”、“海深”两舰阻击清军，后经黎元洪同意，率舰赴上海。南京政府成立，任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率舰北上烟台，助革命军光复登州等地。和

议告成，任海军中将。

麻城余祖言，留日时与田桐、居正一道积极筹建同盟会，组织留日学生反满总罢课。归国后，与刘子通等为“中国公学”筹款，又联合“文学社”和“共进会”共谋武昌起义，任武昌军政府秘书，组建“鄂东护法军”。晚年任湖北官书局局长、武昌中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鄂东留学生参加武昌首义者不胜枚举。又如广济饶汉祥，首义时任都督府秘书，后晋升秘书长、内务司长、民政长；广济吴道南任鄂军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司长；广济李渭滨参加武昌起义，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课长；黄冈夏寿康任政事部副部长，调任都督府顾问、平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麻城周龙骧任都督府秘书兼人事股长；蕲春蔡汇东任汉口军政分府参军兼军法官，参加保卫阳、夏的战斗；蕲春田桓，武昌首义时，与革命党人在蕲州发动起义，光复蕲州。参加首义的还有浠水何炬新等。

在留日辛亥革命老人中，后来有的成了共产党人。如黄冈刘子通就是代表。

刘子通1905年赴日，首批加入同盟会。归国后，曾因领导四川学生运动，为四川总督赵尔巽通令缉拿。武昌首义，奉命潜回黄州策反清军防营。后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交往日密，于1921年3月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加入共产党武汉支部。刘是我党著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近代史研究中曾有“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中刘(刘子通)”之说。

还有英山王孰闻，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曾任命他为西伯利亚调查专员去苏考察。后在家乡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辛亥首义影响下，鄂东还涌现一批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或从事教学科研。

如蕲春方觉慧，早年曾与詹大悲、宛思演等组织“证人学会”，

任《大江报》特约编撰，参与“文学社”活动。武昌首义任汉口军政分府顾问，又任武昌都督署参议、《中华民国公报》编辑、《民心报》总编辑、《震旦报》经理兼总编辑。赴日留学后，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会晤孙中山，旋奉派回国，任驻汉特派员，组建该党分部，又策动警察反袁。后随孙中山赴粤，任大本营宣传处新闻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参加北伐。

黄冈李西屏，在黄州府中学堂读书时，因秘密加入反清组织，带头鼓动学潮，被开除学籍，后赴武昌当兵，旋考入陆军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武昌起义当晚率众领取枪支，攻下督署。翌日被推选军政府叙赏长，奋勇还击清军的反扑。后参加讨袁和“二次革命”，事败赴美学探矿，回国任广州大本营技师，1946 年返武昌，筹办首义大学，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省“民革”副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蕲春陈冕亚，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兵光复汉口，任职汉口军政分府，为反击清军反扑，与黄侃等返蕲聚众数千人。后东渡日本研习法律。归国后历任行政院参事、内政部司长、参事室主任。1950 年春，经董必武推荐任南京新法研究会主任。同年 11 月在南京病逝，遗体葬于雨花台公墓。

广济居励今，武昌起义负责交际事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职内务部，后两度赴法留学习工业化学，回国后，任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湖北省立理化实验所所长并连任两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对他从事教育的诸多贡献颁发了嘉奖令。

综上所述，清末鄂东留学生在投身辛亥革命，反对列强，推翻封建帝制，讨伐袁世凯和北伐战争等活动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涌现了大批仁人志士和杰出人物。他们中一些人成了民国时期军政要人；一些人成为我国知名的科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和学者、教授；也有的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由于鄂东清末一大批留学生的积极努力并与民众的紧密结合，使湖北得以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的烈火得以燃遍鄂东大地，使鄂东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白战存

李贽讲学钓鱼台

出麻城市区东行，阎家河镇郊北 4 里许，即到麻城著名的风景胜地——钓鱼台。只见旧河床中突起一龟形红石，纵横 3 丈有余；河西岸赤壁崖间有一拱形石洞，深可容人；崖头一片开阔地，可见一层层瓦砾。据《麻城县志》记载，这里即是有名的龙潭湖，河中巨石为钓鱼台，崖间石洞为藏书洞，瓦砾地原为芝佛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晚年即在这里著书讲学。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人。青壮年时当了 20 多年的下层官吏，54 岁时因不满当时朝廷的腐败，辞去云南姚安知府官职，应红安耿氏兄弟之邀，于 1585 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来到龙潭湖畔的芝佛寺削发定居。

李贽在钓鱼台的主要活动有：

读书著书。在其《读书乐》中，李贽自云："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李贽爱龙湖，更爱读书。其读书，"不以目，使一人高诵旁听之"(《李卓吾墓志》)，至动情处往往"歌哭从之"(李贽：《读书乐》)，愈到晚年，李贽读书愈勤奋，"寸阴可惜，曷敢从容"(《读书乐》)！乃至于自称为"书奴"。读书而外，李贽写下了大量文章。其流传于世的重要著作《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大都是在钓鱼台撰写的(见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

招徒讲学。沈瓒《近事丛残》记载了李贽讲学时的盛况："一境

如狂”、“从之者几千万人”。前来求学的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不仅有当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的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号石公）亦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到钓鱼台问学于李贽，临别时，写了《别龙湖师八首》，李贽回赠《答袁石公八首》。李贽的女弟子梅淡然学成后致信李贽要出家，李以《却寄四首》作答，其中一首为：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官高即是仙。

然而，李贽的思想和言行却与朝廷倡导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如，他反对尊孔子为“圣人”，认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指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尊秦始皇为“掀翻一个世界”的“千古英雄”（《史纲评要·后秦记》）。所以，明朝官府视李贽为“异端之尤”，火焚其室，拆除书院，欲逐李贽出麻城。但李贽表示“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续焚书·与耿克念书》），仍坚贞不屈。终被人以“乱道”、“惑世”的罪名弹劾而逮捕下狱。其时，李贽年已76岁，不堪侮辱，持剃刀自割其喉而死。临死前，写下《系中八绝》以遗世：

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

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

□吴昌发

京剧创始人之一——余三胜

清代嘉庆壬戌年(1802),湖北省罗田县天堂寨七娘山的一户农家里,出生了一个男婴,喜讯传出,邻里齐来祝贺,客中一位有文化的长者,给婴儿起名叫起云,这名字其意有二:一是此户座落高山,门对高山,长年云缠雾绕;二是取"祥云瑞霭,紫气东来"之意,希冀此孩将来聪明发达,事业有成。尔后,族人又给他起一谱名为开龙,更有"龙在深山,腾云而出"的愿望。

起云自呀呀学语时起,就爱学唱儿歌。8岁入私塾读书,天资十分聪慧。数年休学后,仍喜欢学唱民歌小调,并自制渔鼓筒学唱渔鼓。当地甚产茯苓,经常有人运茯苓到汉口出售,进入青年时代的起云,也开始这一营生。在汉口逗留期间,常入戏园看戏,由此,唱戏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后便在汉口学唱汉戏,成为汉调演员。到北京后,在徽、汉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起着"三鼎甲"的作用,他就是后来成为京剧创始人之一的余三胜。

余三胜约在二十岁左右(即嘉庆末年或道光初年),同弟弟余四胜(字起才、谱名开贵)由汉口到天津,加入天津侯家后"群雅轩"票房。当时有张三元、孙大常、画儿、李保、奉儿、张子久、张喜子、王凤兰、常子和等票友,其弟四胜亦在该票房演净角(见《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道光初期(1822—1824),兄弟二人同进京都,加入北京"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不久,三胜即成为该班的台柱。

道光中期,余三胜在北京梨园界已享盛名。《旧剧丛谈》说:"三

胜为汉派须生，北来最早，所演所作，工衰派别，亦擅靠把。”他在演唱上，将汉调皮簧与徽调皮簧相结合，又吸收昆曲、梆子的演唱特点，创造一种抑扬婉转的皮簧唱腔，使原来比较简单的徽皮簧逐渐丰富起来。他兼长西皮、二簧，更善于“花腔”，还创制了二簧反调。如《碰碑》、《牧羊传》、《乌盆记》等剧中的反二簧调，都是从他进北京后才有并流行起来。在念白上，他将汉调的基本语音（即所谓湖广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既富于音乐性的语言声调，又使北京的观众能够听懂，以致能在京都扎根流传。以湖广音唱皮簧，对四声的区别十分清晰，这是汉调的特色，非昆曲、弋腔、梆子所能比拟的。北京人觉得非常悦耳动听，使京剧的形成，在观众中有了深厚的基础（参阅《戏曲研究》第 10 辑）。

余三胜“通文墨，善口才，演剧常创新腔、出新意”。他善于把青年的小腔巧妙溶于老生唱腔之中，使行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故对老生唱腔的创造尤为突出。《梨园旧话》中有专门记述他“善口才”的一段叙述，说余三胜对《三国演义》有较深的研究，对书中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掌握得较清楚又熟练，并能即兴串成较有文采的戏剧台词。有一次京都某科团拜堂会，“有钜公欲令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伶共演一剧”，管戏事的官员令其三人自行商议。三人商议后，定为演《取成都》，由程长庚饰刘璋，张二奎饰刘先主，余三胜饰马超。大家都以为演马超在此剧中没有什么可表现的。待马超一登场，刘璋便诘问他因何投降刘先主？“马超将刘璋如何暗弱，先主如何仁义，‘且为景帝裔孙，谱系班班可考，人心所附，天命归之，弃暗投明，实为如此’。浑浑数十语，顿挫有法，英气逼人，观众无不拍掌。盖程、张此剧之佳，在人意中，余之竞胜争奇，出人意外也，能者固不可测。”《旧剧丛谈》说：余三胜也将“讽刺讪笑寄之于戏，盖其性善诙谐，发于情不自禁，虽稍损老成宽厚之度，而口才敏捷亦自难能，常闻老友梁君幼兰云，三胜

之弟本习净行，性最嗜赌，常窃乃兄衣物，质以偿债，适昆仲演《捉放曹》，三胜嘲之曰：'观此人面貌上，定要赌博'，知者无不发笑。"

余三胜是戏曲创造革新的先驱。"他将净角戏《沙陀国》中的李克用改用本色脸演唱"(《戏曲研究》第10期)。《鞠潭余沛》对他的评论是："能于程、张以外，别创一格，以自成一家。每于词句鄙俚之处，腔调不良之点，均能刚正而改之。故其当时名声之显著，亦不在程、张之下也。"也就是说，他对旧剧目中的陈词滥调、污秽下流、诲淫诲盗等糟粕进行涤除，再创造新的健康的词语来代替。

"余三胜相貌清肃，举止典雅，且富于顿智。出演时，瞬息之间，即可造出警句。"他和著名青衣胡喜禄演出中，曾有一段惊人的故事。一次与胡喜禄合演《四郎探母》，不料喜禄因有要事误场，他已经出台在演唱，喜禄还没有到，他一边唱一边想办法"救场"。于是只好在台上加唱"我好比……"那段唱词，所加之词全是现编现唱，既要符合剧情的要求，又不能胡编庸俗俚语，一直唱到七十多句喜禄才到，待喜禄装扮出场，他仍然"照旧演唱，不稍加以词色。"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不责备喜禄？他笑着说："喜禄与我无怨，偶以要事迟到，实非故意误场，我如执此相责，不但不近人情，且徒伤多年之情感。"《鞠潭余沛》评介道："观乎此，亦可知其待人之一班矣。"

"咸(丰)同(治)年间，京师各班须生最著名为程氏长庚、余氏三胜、张氏三奎。程徽人，余鄂人，张浙人，分道扬镳，各有其独到处，绝不相蒙，时有'三杰'之称。以大名家之诗喻之：程如老杜之沉雄……；余如章孟之闲适，空山鼓琴，沉思独往，观者如游名园花木翳荟中，如闻幽鸟之一鸣，尘襟为之一涤；张如沈宋之应制……。盖常论之，程则卓然大家，余、张则名家之自标一帜者也。鼎足而三，各执牛耳于菊部，后有作者弗可及。"以上是《梨园旧话》对余三胜等三人的评价。当时北京最著名的三大戏班是三庆、春台、四喜，程长庚驻三庆，余三胜驻春台，张二奎驻四喜。此三班"皆著籍于内务

府，轮流大栅栏演剧。此外各班，悉以小班目之”。这些所谓小班只能在市内鲜鱼口及崇文门外等地演唱，“界限极严，不能陨越”。三大班鼎峙而立，生、旦、净、丑各角色，“皆工悉敌，不能优劣悬殊”。因此，道、咸年间称程、余、张为“三鼎甲”，又称“老生三杰”。“三人者名满海内，皆工黄腔之正生”(《怀芳记》语)。杨静亭著《都门杂咏》中有《黄腔一首》云：“时尚黄腔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当时有天津第一代泥人张明山，塑造余三胜饰《黄鹤楼》刘备的泥塑一座(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后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

京剧形成后，余三胜的唱腔为后辈众多的名演员(如谭鑫培等)所仿效。他的代表剧目有：《四郎探母》、《空城计》、《捉放曹》、《黄鹤楼》、《摔琴》、《碰碑》、《珠帘寨》、《战樊城》、《取成都》、《乌盆记》、《桑园寄子》等。先后与他同班的著名演员有：李六、米大麻子、产滚子、蟾桂、凤林、朱三喜、玉兰、胡喜禄、俞润仙、刘赶三等。

余三胜晚年家道小康，于同治丙寅年(1866)卒，享年64岁。葬于天津西门外小稍直口“梨园义地”(亦称安徽义地)。其子余紫云(著名青衣)、孙余叔岩(著名老生)定居北京后，将其坟墓迁入京都。

□毛志英　周　杰

章水泉与武穴竹器

章水泉，广济县(今武穴市)武穴镇人，祖籍江西临川。其曾祖父于清道光年间，因避水灾，徙居武穴，遂入籍。章水泉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因家境贫寒，未入学读书，自幼随父习制竹器。其父技艺平庸，仅以制方竹椅为生。章水泉虽未从名师学艺，惟能勤学苦练，善于钻研，在劳动中不断提高技艺。终于成长为一位著名之民间竹器艺人。

旧社会，章水泉家无恒产，仅于武穴程祖街租赁铺面一间，以“章泰和”为牌号，经营竹器小店，自产自销花竹椅等竹器制品。章水泉为人耿直，谦和守份，与同行业工匠和睦相处。惟对其技艺，则守口如瓶。以当时所处社会，如不专利，则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为保密计，通常于白昼备料，整理工具，制作附件，而于晚间则紧闭门户，潜于灯下从事工艺活路，制作主件。纵然如此，其劳动所得，仍难获温饱。其竹器工艺品典雅、大方。集我国明代传统竹器艺术之大成，并有所创新，用之于竹工，故别具风格，自成一绝。其竹器造型，凡百余种，无论日用之桌椅、茶几及陈列古玩之博古架，抑或特制之梳妆台、宁波床等，皆牢固而不显粗笨，精巧而不失单薄，富有装饰而不流于繁琐，无不具有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以竹桌椅言：其面料悉用小竹片拼成，密实无缝，光洁平滑，且不夹衣，不透水。其中竹椅有使用将近半个世纪，为汗水所渍，呈暗红色，依然牢实如故，不散架、不变形、不发裂，其技艺之高可见。尤善于利用竹器

本身之结构，用竹牙装饰成民间图案，造型新颖，可谓巧夺天工。为渲染色彩，选用紫竹支撑其椅，如此，竹椅上部呈黄色，下部呈紫色，紫黄二色，相映成趣。其竹器工艺不仅制作精细，而且物美价廉。如所作之小竹椅，于解放前每把售价仅银元六、七角，折合现在之人民币亦仅三、四元而已。民国四年(1915)，武穴商会将其制作之花竹椅邮寄当时国民政府农商部，转送巴拿马工艺品赛会展出，并获奖。未久，其竹器制品又为日本某商人购去，转送日本大阪工艺品赛会展出，荣获二等奖。此后，章水泉之竹器工艺品更是驰名中外。例如民国六年(1917)，镇江有一巨商慕名而来，除向章水泉订购一套竹器家具外，并要求按照红漆飞金古式大床样式，制作一张竹床。章水泉之父不肯接手。该巨商竟云："既于国外获奖，制此床有何难处？"章水泉不避烦难，竟一口应诺。他为制此床先往木器店观察，研究木制古式大床之结构，再按照竹子性能精心设计，当制床前槛帘时，掌握火候，将数根长竹弯成美观之图案。如此苦心研制，精雕细刻，历时四月。终于制成蔚然可观古色古香的红漆飞金古式竹床。镇江巨富大加赞赏，并增补十串钱工价以酬其劳。

尽管章水泉之竹器两次获奖，惟在旧社会，国际声誉不仅未使其摆脱贫困，反令彼增添麻烦与困难。斯时，章未获半文奖金，仅由农商部转发一纸奖状。武穴商会会长趁机索取竹椅数张，方将奖状付与。须臾，四人敲锣报喜，要办酒席，要索喜钱，章水泉临时借得四串钱，人送一串，嫌少，复各增二百文。四人甫去，一群乞丐接踵而来，鞭炮一放要讨喜钱。章水泉应接不暇，啼笑皆非，竟为此负债不少。嗣后，某些地方官吏，过路军官，自鸣风雅，纷向章水泉订制竹器，白拿硬讨，经常亏本。章水泉仅有一女，在旧社会为病痛折磨而死。章与老妻相依为命，且患肺气肿，无钱治疗，病情日益沉重。身怀绝技，竟遭此穷困，令人浩叹。

解放后，章水泉深感扬眉吐气，衷心热爱党，热爱新社会。1951

年劳动节，武穴镇各行业游行庆祝，竹篾行业所舞之长龙，即为章水泉用小竹串连结而成，龙珠系用竹子嵌上小镜，光彩夺目。同年国庆节举行游行时，章水泉又用竹篾制作一艘兵舰模型。兵舰模型滚动于下，飞机模型旋转于上，观者无不叹为绝技。此后，章水泉参加武穴镇竹器生产合作社，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并担任县政协委员。

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尝闻一位国际友人谈及武穴章水泉之竹制品当年曾在巴拿马赛会获奖一事，随后，周总理亲自向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指出："党和政府必须关怀和支持章水泉这位民间手工艺人。"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广济县各有关单位，采取许多相应措施：每月付给章水泉固定工资100元，并由政府拨款5000元，为他建造一所住房，还由武穴竹器社组织一批青工，在章水泉之传授、指导下，专门生产竹器工艺品。遂使章水泉濒于失传之传统竹器制品，在武穴发源地得以恢复和发展。

1956年，章水泉出席省政协会议，因患感冒引起肺气肿病复发，省政府又将他送进大医院，为他免费治病。出院后，在生活方面安置章水泉夫妇在汉口小夹街38号居住，并将其外甥女接去照料二老之生活。在工作方面，由武汉市手工业局组织一竹器工艺社，安排章担任社长，带领一批工人专门制作章水泉风格的竹器，乃使其竹器技艺后继有人，在省城武汉获得范围更大的发展。

章水泉在汉带徒十余名，传授绝技热情、无私。章水泉不满足于已获之成绩，于1958年，率艺徒攻关创新。在过去制作竹器四方桌的基础上，克服困难，制作多角八方桌，他将桌面分成若干个图案，用小竹牙在桌面四周拼成"万字格"、古铜钱和兰草、蝴蝶等图案，在桌面中心正方形里，用一块竹片刻成暗底亮花的方格几何图案。桌面压上玻璃后，因四周对称之花饰透空，中间图案为实底，虚

实相间，玲珑剔透。此件在北京工艺美术馆展览后，中外名家广为赞赏。此外章水泉还带领艺徒，制作一堂全套竹器家具，其中以竹架丝垫沙发和镶有腊梅桃花之竹架屏风等新产品，尤引人注目。当时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内。

章水泉为人民艺术家，其事迹曾先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大公报》以及苏联《真理报》等15种报刊杂志上，并曾拍摄于题为《巧夺天工》之电影纪录片中。章水泉曾任武汉市工艺美术专业联社理事会副主任，武汉市手工业联社理事会理事、中国建筑工程学会武汉分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湖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委员等13种社会职务。

在汉期间，章水泉仍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尝对武穴竹器社的竹器工艺品生产给予指导。广济县委、县政府也每年派人专程赴汉，看望问候章水泉老人。

1962年4月6日晨4时，章水泉因患肺癌医治无效，殁于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享年69岁。当时，广济县委、县政府特派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文志，赴汉主持追悼会，省、市各有关单位皆送挽联花圈。会后，破例由“江亚”轮将其灵柩运回广济，轮船抵港时，县党、政领导及机关干部、工人、居民数百人鸣鞭迎接灵柩，送葬至武穴北郊，崔家山之阳，并立石碑以志不朽。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

浠水县博物馆搜集古籍纪事

明太常官应震云:“浠邑山川甲于郡属,其南门对岸峒壁巉岩,临水依山。”苏东坡泛舟于此,鼓之声应,乃书“玉空明”三字镌之岩石。官应震在岩上建闲云楼,旦晚憩息,闲看潭心云起,须臾变灭,身世都忘,可谓寄意渊邈了。今天,楼不见了,主人当然也早已物故,但在这里却建起了一幢声动遐迩的藏书楼,楼下潭水碧流,云灭云生,可谁也没有官太常的情趣,被楼内层层书架上的古籍文物吸引住了。日本冈山日中友协会长六车清茂说的对:“现在去星球旅行也不难,难的是历史的旅行。”三层楼的书库,洋洋大观,如“琅环之府”、“群玉之山”,目不遐给。据原藏书以“精”、“博”为湖北各县之冠,经、史、子、集共 4 万 2 千余册,其中有不少明、清刻本。1979 年,经中国古籍善本书编辑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鉴定,善本书有 1099 册,还收藏了全国 17 省、市的府、县、州志和山志 132 种,1200 多册。馆藏稀珍文物 6000 余件,新石器时代、周朝、明朝及晚清印章 150 枚,有明朝篆刻家、书画家文彭的手刻,博物馆的正厅还藏有字画 1300 余幅,碑帖 900 余幅,其中有明朝太子太傅大书法家董其昌,清东阁大学士、书法家刘墉,内阁学士、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和黎元洪、汤化龙的手书对联。《明史·董其昌传》云:“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能及也”,“人疑之米芾、赵孟頫云。”并藏有清末状元陈沆殿试试卷和康熙皇帝玄烨的御书:“峰峦紫翠迭人寰,三两人家夕照间,路近陪

都观土物，心殷胡里问关山。”这些在玲珑满目文物中，若掌上明珠，镇楼至宝。

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书藏万卷小琅环”，不仅在它的美不胜收，古籍、拓片、字画、印章之珍贵，更重要的是收集的创始人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胆略，使人受到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当人们了解了馆藏收集的时代背景时，都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无限缅怀已故的中共浠水县委书记张若谷同志和对健在的当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石川、县长白水田同志的敬佩。1950 年，土地改革运动在浠水继省委试点之后相继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攻击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同时旁及农村的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荡涤农村的一切污泥浊水，把官宦世袭地主收藏的古籍、字画、碑贴、金石印章统统查抄出来，当做维护封建意识的东西，随意践踏，或付之一炬。当不得饭吃，农民实在也不需要它。当县委土改试点工作组把这个问题汇报给县委以后，引起县委的重视，张若谷、石川、白水田同志立即把它作为如何对待古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到县委会上进行研究；并着重指出，文化环境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选择传统，每个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哺育下成长的，都在这一传统中获得知识，我们保护历史文物，主要是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封建制度是要打倒的，其意识形态无疑也是反动的；但是，封建制度对奴隶制度来说，它又是进步的，奴隶制度对人类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恩格斯说：“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奴隶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虽然把问题说得这么清楚，可是，当时还是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收藏这些“古董玩儿”是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

应，是有害的。县委在允许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作了统一部署，白水田同志签发了浠水县人民民主政府收集古书古物的布告。1951年，土地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土改工作队作为一项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到家喻户晓，说服农民爱护文物、保护文物。浠水是鄂东文化比较发达的县份之一，明、清两代540多年举人、进士联翩不断，下巴河还有状元、阁老、兵部尚书等，民国时期也有不少学者，文化名人，像瞿瀛，光绪癸卯举人，曾任黎元洪总统府副秘书长，他就是一个私人藏书家。县委的决策传下去以后，浠水、蕲河、巴水三条水路用船篰运书，农会派农民肩挑背驮，从四面八方送书进城，一时间，几乎络绎不绝。

二

白水田同志情结书卷，爱书如命，他把收集来的书籍、字画、帖片放在他住的一座平房的厅屋里，下班后，他就在屋里翻阅，忙了，哪怕是那里徘徊、溜览一下，也似乎感到一种满足。不到半年，书籍堆积如山，他发现很多书籍断线、散页、残本，暑期他指示县政府文教科派了30多名教师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但是，不懂校雠学、目录学，清理了也不能上架，正如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自序中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有人推荐王祖佑，王檀长音韵学，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的学生，著有《浠水方言》。1952年建立文物保管室，决定由王祖佑专职管理。就在这年，经过他的校勘，选送一部分金石印章、碑贴、字画和善本古籍参加中南土改委员会展览，引起中南领导同志的关注，出5000万元(旧币)，要求买去。征求县委意见，县委解释说："这是浠水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品，古文化遗产，人民的精神

财富，不要说5000万，就是5亿我们也不敢卖。”婉言拒绝了。1954年，改为文物保管处，同时迁入孔庙，辟室珍藏，县政府并拨款维修孔庙。1955年，改名文物宫，并调一名教师作王祖佑的助手。

1954年，继若谷同志调走之后，白水田、石川同志也先后调离浠水，但馆藏文物，古籍的保管，一直受到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1956年，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文物的通知》，并于1958年正式成立县博物馆。经过校勘、分类，全部古籍基本上编出了目录，对纸装本的脱线、破损，进行了整理和技术处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和改革的展开，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而提到新的水平。浠水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湖北省政府、中央文化部和省文化厅先后以古建筑维修、文物保护等名义共拨款28万元，使原来的孔庙、博物馆正厅建设一新，并新建了现在耸立河畔的一幢三层恒温书库，大有“杰阁巍然瞰楚都”之势。

三

保管人员已经换了届，无论是王祖佑和李念国还是现任馆长叶向荣，为了保管这批古文物都呕心沥血作出了无私奉献。王祖佑同志已经作古，为保管工作鞠躬尽瘁。五十年代，县城还没有电灯，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夜以继日，细心清点，经常工作到深夜，为了防止文物受潮霉变，虫蛀鼠啮，每年要翻晒一、两次，都由自己翻检，挑出挑进，汗流如注。1966年，“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被当作“黑窝子”，王祖佑理所当然地成为批判对象，逼他交出库房钥匙，拳打脚踢，恣意凌辱，甚至后来将他投入牢房，严刑拷打，他宁死也不交出钥匙，幸亏国务院及时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救了他。

这场“文化大革命”，以文化的“革命”、“破四旧”开始，结果走向反面，成为文化的破坏和旧传统的复辟，而且复辟了旧传统最消极的方面，而浠水博物馆却成为尊重知识的标志保存了下来，浠水人民一直为之敬仰和怀念。现任馆长叶向荣同志是一位忠诚的文物卫士，勤勤恳恳带领全馆工作人员工作，不仅对原有收集的文物实行科学管理，连续实现安全年，又收藏了古籍3000多册，革命文物300多件，其他地质文物千余件，还利用馆藏开展科研活动，发表博物馆学、考古学方面的论文、文章数十篇，并有专著问世，成绩斐然，力争古书、古物为科研和教育发挥史料价值。湖北大学教授冯天瑜、湖北师范学院教授黄瑞云，也来馆查阅资料。本馆珍藏的黎元洪、汤化龙的亲笔书写的对联为湖北省辛亥革命纪念馆提供了复制品和照片；珍藏的明代东轩建筑晴川阁印鉴，为晴川阁文物管理所考究其沿革提供了证据；珍藏清代广元石刻黄鹤楼图样为修复古代黄鹤楼提供了素材依据。

浠水县博物馆建馆以来，一直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注，陈丕显、王任重、王恩茂和赵辛初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先后来馆参观、指导；书画专家如曹立庵、张昕若等也都来馆参观，为收藏工作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仅从1986年起，先后接待观众28万多人次。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开拓前进，要在二十一世纪里谱写中华五千年文明新的壮丽篇章，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句震古烁今的庄严誓词。我们相信，人们随着对固有的自我传统进行反思和再评价，大量采用馆藏古籍、文物的学术著作，将相继问世，展示我国文化遗产的价值。

□王学晋　程　谦

1998年4月写于黄州

东坡赤壁诗社与《东坡赤壁诗词》

“旗开赤壁岸，高唱大江东”，副题是：“东坡赤壁诗社影响及于海内外，《东坡赤壁诗词》入选亚运期间北京书展”，这是1990年8月20日《湖北日报》头版刊登的一则报道；黄冈电视台摄制“绽放在东坡遗风中的奇葩”专题片，多次播放介绍东坡赤壁诗社的业绩；《黄冈报》1990年9月25日以“雅韵传高谊，诗桥架五洲”，《东坡赤壁诗词》明年将向海外发行发表消息；“东坡赤壁诗社举行迎新春座谈会，刘友凡、李明波，鲁季平莅会祝贺”，这是1997年2月10日《黄冈日报》刊在头版的新闻；1997年6月20日《黄冈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东坡赤壁诗社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暨市诗词学会成立大会隆重召开，市领导李明波、鲁季平、宛宗祥到会祝贺的消息；《黄州晚报》当天也在头版头条刊登套红标题“东坡赤壁诗社双喜临门”。以上报纸、电视台报道摘录，说明了东坡赤壁诗社和《东坡赤壁诗词》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

诗社的缘起

东坡赤壁诗社的诞生，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期。首先是得力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这种拨乱反正，也使文学艺术领域冲出了禁区，从而造成了全国的思想解放、繁荣百业的宽松氛围；其次是1982年秋第二届全国苏轼研究会在黄州召

开。这年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九百周年。他在黄州四年零四个月的谪宦生涯中写了621篇诗词歌赋文章，尤以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念奴娇词而闻名中外。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内各大专院校研究苏轼的专家、教授120人。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黄州的诗人及广大诗词爱好者由叶钟华首唱“二赋悠悠九百年”辘轳体七律五首，和者近20人，并结集刊印作为向大会的献礼。另外还为大会写了几十首贺诗，一并发给到会代表，代表中一些诗词爱好者如河南的林从龙，北京的陈迩东、朱靖华，四川的杨明照，湖北的吴丈蜀、胡国瑞、童勉之等，纷纷提议，鼓励黄州参加会议的东道主方道南、宋自重、丁永淮、叶钟华、黄耀武、童怀章、舒徐、缪英等人筹建诗社；第三是受全国先期成立诗词组织和发行近体诗词书刊的影响。广东的《当代诗词》在书店已能买到，湖南的洞庭诗社，黄石市的西塞山诗社，广西的桂海诗社已经成立；第四是黄州这块诗词沃土，孕育了黄州历代诗人，当今尤为显著。黄州有个诗人群体(能写中华诗词约200人)。正因为有这些主客观因素，酝酿成立诗社的筹备工作开始了。1983年3月由叶钟华、童怀章、缪英等共同编辑的《黄州诗抄》问世了，在当时任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方道南的主持下，于5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到会有丁永淮、叶贤恩、叶钟华、田世儒、欧阳宏、舒徐、缪英、饶学刚、余彦文、雷于怀、黄耀武、徐文灿、汪洋、丁成、程幼怀和我。会议商定，由方道南牵头15名成员组成筹备组，会议还讨论了起草社章、诗社社名、筹集经费等事项。同年9月23日召开了第二次筹组会议。丁成、徐文灿、雷于怀三人因事请假。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由我起草的社章(草案)；二是确定社名为东坡赤壁诗社；三是拟定理事建议名单；四是拟定邀请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关名人、领导的名单；五是印制请柬(由叶钟华负责)；六是筹集经费(由我和叶钟华找乔平副专员解决)。最后一次筹备会于11月19日召

开，方道南主持，听取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汇报。会议经费乔平已批准由财政拨给 5000 元。会议确定成立大会定于 11 月 26 日在东坡赤壁栖霞楼举行。至此，诗社的组建工作，宣告结束。

东坡赤壁诗社的成立及其换届

1983 年 11 月 26 日，黄州地区近百名诗词爱好者聚集在东坡赤壁的栖霞楼，庆祝东坡赤壁诗社的诞生。与会人员首先通过了社章，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两为”、“双百”方针，继承发扬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弘扬诗教，讴歌时代主旋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 21 名，经理事选举方道南为社长，丁永淮、黄耀武、童怀章、叶钟华为副社长，秘书长由叶钟华兼任。省委顾问、书法家李尔重为诗社题写了社名。会议宣读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西、湖南及本省著名诗人、教授霍松林、吴丈蜀、黄亮、林从龙、汪民全、李曙初等人的贺诗贺信。在大会开始时，地委副书记周维新代表地委、行署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到会祝贺的还有原地委、行署的老领导郭实、白水田和著名作家、诗人梅白，以及地区部办委局的一些负责人。

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于 1985 年 11 月 26 日在黄冈地区工人文化宫召开。这次会议的议程：一是由社长报告两年来的工作；二是修改社章；三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到会代表 87 人，修改后的社章规定新设常务理事会和三年换届。会议选举理事 45 名，常务理事 17 名，社长仍为方道南，副社长除首届的 4 名外，增选了湛友恒和田世儒，舒徐为秘书长。会议通过聘魏文伯、李尔重、秦兆阳、李国平、胡国瑞、吴丈蜀、梅白、常树声为名誉社长，乔平、宋自重等 11 人为名誉理事。

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按期于1988年11月26日在黄州召开，到会代表101名，会议选出理事77名，常务理事23人，方道南连任社长，副社长除了上届6名外，新增选了叶贤恩、舒徐和缪英，舒徐兼任秘书长。我仍被推选为常务副社长，分管诗社日常工作，兼管财务；丁永淮分管《东坡赤壁诗词》编委会工作兼任主编；黄耀武、叶钟华、田世儒分管组织联络工作；舒徐处理诗社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湛友恒、田世儒因住江南，不具体分工。本届名誉社长只聘徐鹏航、傅庞如、吴丈蜀和李国平。比上届减少了4名，但增加了顾问一职，计有原世泽、周维新、乔平、肖良恺、唐仲仪、宋自重、田忠杰、黄海鹏等20名。诗社成立了四个委员会：一是《东坡赤壁诗词》编委会，主委丁永淮；二是基金委员会，主委童怀章；三是诗词研究委员会，主委丁永淮；四是组织联络委员会，主委黄耀武。

第四届代表会于1997年6月19日在黄冈市委小礼堂举行。这次换届时隔9年，未能如期召开的原因：一是经费拮据；二是换届人选迟迟未定下来。这次换届较之以前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区改市后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和安排换届的主要人选，经费亦由市长批示财政补贴。诗社向市委、市政府写的换届报告，是分管思想战线的书记刘光彩亲自批复的。开会前他和市委常委，副市长鲁季平分别听取了会议筹备工作的汇报；二是黄冈市诗词学会的成立与诗社换届同时进行。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社会合一的体制。这次到会代表120余人，时间一天，议程三项：听取并审议由方道南代表三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讨论修改后的社(会)章；选举第四届理事会(也是学会的首届理事会)。市委副书记李明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会致贺词，他首先肯定了诗社15年来的工作成绩，他要求诗社带领人们纵情讴歌伟大的时代，广泛开展诗词活动，提高黄冈的知名度。省人大副主任、省诗词学会会长徐晓春，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吴丈蜀，

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侯斌，市委常委、副市长鲁季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宛宗祥以及离退休的老领导乔平、宋自重等出席了大会。鄂州市的老领导龚冠军、湛友恒、叶贤恩、田世儒、曾轶前等应邀出席了大会。徐晓春、吴丈蜀、湛友恒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会议结束之前，新当选的社(会)长鲁季平向代表们说：我们要以这次会议为新起点，同心同德，继承开拓，实干兴社，使古典诗词这朵百花园中的奇葩在黄冈结出丰硕成果，他勉励大家，增强责任感，开创新局面，突出时代主旋律，壮大诗词队伍，解决经费难点，办好刊物，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中共黄冈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贾天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友凡，市委副书记李明波、刘光彩分别为大会题词祝贺。贾天增的题词是："研究东坡，开发赤壁，古为今用，造福大众"；刘友凡的题词是："文明双建，诗韵千秋"；李明波的贺诗："欣逢盛世颂升平，赤壁矶头瑞气腾。拍岸惊涛旋古韵，连天碧水谱新声。弘扬先辈图强志，激砺后生报国情。盛会诗坛歌一曲，大江南北举吟旌"；刘光彩的题词是："抒兴邦之志"。

这届选出理事115名，常务理事19名，社长鲁季平、副社长丁永淮、黄耀武、童怀章(常务)、叶钟华、舒徐、雷于怀、吴闻章。秘书长为王浩洪。特聘名誉社长徐鹏航、徐晓春、吴丈蜀、傅庞如、贾天增、刘友凡、蔡伦祥、李明波、刘光彩、周维新、方道南、宋自重等12名，顾问乔平等20名。理事会决定诗社原编辑部《东坡赤壁诗讯》改为《东坡赤壁诗社、黄冈市诗词学会通讯》。

诗社截止1998年4月，已拥有社员1491名，遍布全国30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诗社建立15年，换届4次，累计召开理事会5次，常务理事会15次，社长办公会28次，举办各类诗会、笔会、讲座和诗词研讨会共计16次，以诗社名义出席全国和全省市区各项专题会议近30次，其中全国当代诗词研讨会在岳阳、广东、洛阳、桂林、银川召开的会议均有我社代表参加。此外，衡岳、车城(十堰

市)、屈原(荆州)、海南、黄河(郑州)、潜山(咸宁)等地的诗会亦有代表参加。1987年诗人节,中华诗词学会首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社就有两名正式代表(叶钟华和童怀章)和一名列席代表(缪英)参加了成立大会,丁永淮当选为理事,我社也是成立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单位之一。1987年8月,湖北省诗词学会成立,黄州代表中被选为理事的11人,丁永淮被选为副会长,童怀章被选为常务理事。1994年省诗词学会二届代表会上,黄冈又增选了宋自重为常务理事。1993年全球汉诗四届研讨会在澳门举行,我作为诗社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15年来诗社接待了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湖南诗词学会、洞庭诗社、岳麓诗社、上海诗社、桑海(江西)诗社、黄河(河南)诗社、心潮(武汉)诗社等30多个诗词组织的来访。15年来,诗社编印《东坡赤壁诗讯》19期,社员通信录一本,以此作为联系社员的纽带。诗社历届还制订了很多规定和建立了很多制度。如财务收支办公费、旅差费、接待费等等。15年来,诗社曾四次迁移地址:1983—1985年在方志办;1985—1988年在体校;1988—1997年在东坡赤壁管理处;1997年至今在体育路市文联内(诗社自置的两室一厅的一个单元房间)。

东坡赤壁诗词

诗社的主要活动和投入的人、财、物,集中在《东坡赤壁诗词》这个刊物上。刊物以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振兴中华诗词为己任。自诗社成立以来,每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几乎离不开如何办好这个刊物,这个刊物是贯穿诗社工作的轴心。

《东坡赤壁诗词》创刊于1983年8月8日,这还在诗社成立前三个多月。在第一集出刊前还出了一本《黄州诗抄》,到1984年8、9两月又连续出了二、三集,第三集是为建国三十五周年出的专

集，一、二、三集封面题字分别为吴丈蜀、李宗海和李尔重。因为是内刊，在邮寄、销售方面很不方便，特别是档次、品位方面比较低。对一些名家的作品也不好屈载。经多方奔走，商定由地委宣传部于1985年1月18日向省委宣传部写了关于申请在国内公开发行《东坡赤壁诗词》季刊的请示报告，省委宣传部于当月24日作了批复："同意创办《东坡赤壁诗词》季刊，32开本，限国内发行，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所需开办的人、财、物自行解决。"1985年2月10日，由方道南主持召开社长办公会议。除正副社长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舒徐、欧阳宏、贺全斋、李儒科、曾轶前。丁永淮宣读了省委宣传部的批复。大家感到办好这个刊物任重道远。首先决定成立编委会，由丁永淮、田世儒、叶钟华、欧阳宏、童怀章、舒徐、缪英等7人组成。丁永淮任主编。叶钟华、缪英任副主编。同时建立编辑办公室，地点暂设在体校，由缪英、傅知群坐班工作。当时任体委主任的李儒科同意抽出一名年轻职工帮助编委会（含诗社）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二是决定自5月1日出公开发行《东坡赤壁诗词》创刊号，由缪英担任本期的责任编辑。三是决定2月11日召开全地区首次联络员会议（当天电话通知），主要商讨本刊的发行工作，到会的有新洲县姚海东、鄂州市胡念征、傅知群、广济县徐剑魂，英山县萧浪平，罗田县黄白丁，蕲春县冯唤民，黄冈县易亭、舒自能，黄梅县陶士心，麻城县江乐山，地直涂普生、余彦文、薛维桂。会议就五方面的问题取得了共识：一是做好公开发刊的宣传工作；二是组织高质量的稿件；三是在发行刊物过程中要讲求经济效益；四是发展社员；五是处理好近体诗词的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诗社正副社长、副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东坡赤壁诗词》从1985年5月创刊至今已公开发行54期，刊载诗词曲2500余首，文章310余篇，作者近万人，发行总量21万余册，全国省市内除西藏外均有订户。13年来累计来稿20万

件，回信在4万件以上。自1991年起，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向海外发行。对海外的联系日益增多，如“海峡情思”、“五洲联谊”专栏，经常刊载台湾林恭祖、林荆南、陈楚贤、丁润如、曹志冠、钟莲英、汪化龙、王希尧、操稚青、汪春鸣、叶蓁、汤觉非、卢鸣皋、葛行源、周旭、陈家添；香港叶玉超、朱志强、黄坤尧；澳门冯刚毅、施议对、冯倾城；美国潘力生、胡国材、黄宗晃、黄思超、林兰甫、翟凤阳；英国黎均全；法国薛理茂、刘锦权、陈湃；泰国王诚；新加坡张济川、刘情玉；加拿大姚懿庭、胡其礼；马来西亚孙德钦、黄惟宪；澳大利亚向明、杜若莲；日本松桥朋篁、山上次郎、竹生太朗等人的作品，保持经常联系。正是《东坡赤壁诗词》为海外同胞、侨胞、外籍华人提供了赋诗言志、表达思乡、思亲的园地，致使旅台40年浠水籍的王宗之在我们的刊物上看到其发妻刘谷香发表思夫、劝归之作，王读后感慨万千，即寄和诗要求本刊发表，老俩口诗来诗往，信念前情，终至王于1986年毅然由台湾几经周折返回浠水被安排在县财政局工作，旧梦重圆。市政协特邀委员田嵚在本刊发表两首诗词被在美国华裔诗人、画家周千秋（田和周是黄埔军校旧好）看到，周即寄诗画予以回赠；伺后，周得知黄冈遭受水灾，又寄名画10幅给黄冈政协，作为向灾民的赈济。

《东坡赤壁诗词》从栏目的设置到具体内容一直是健康向上，从不脱离时代轨迹。如“鄂东采风”栏，就先后介绍了武穴市、红安县和麻城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成就。从本市到全国的大事，本刊均辟专栏，紧扣时代脉膊。如黄冈建市，京九通车，我们都在专栏中予以赞颂，有效地宣传了黄冈，从某些方面提高了黄冈的知名度。还有“田园新曲”、“时代风华”、“城乡焕彩”、“雏凤新声”、“警钟长鸣”等栏目，特别是“学雷锋”、“学军嫂”、“学孔繁森”等深受读者欢迎。除经常设的专栏外，有时也设临时特别专栏，如“香港回归”、“世纪丰碑（欢庆十五大）”、“悼念小平”等。不少读者来信称赞本刊内容新

颖、版面清晰，编审严谨，质量上乘，美人伦、淳风俗、可读性强，美刺兼备。

《东坡赤壁诗词》及诗社多次被一些新闻媒体介绍和推崇，早在1985年，《书刊导报》就介绍本刊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情况；《中国报刊大全》、《中华诗词年鉴》、《全国报刊内容汇编》均用专栏向国内外介绍：《东坡赤壁诗词》内容健康、清新，时代精神强，政治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

《东坡赤壁诗词》从1995年开始，在版面、装帧、封面、栏目、印刷、版本等方面作了较大改进。首先是由32开本改为大32开本；再是由竖排改横排；三是作者原在目录中各一行改以栏目刊作者姓名；四是栏目之间不再串页；五是书眉上标明栏目；六是在作者姓名前加上省市区籍，对海外则标明地区和国籍；七是封面改为相对固定的分色图案。通过以上调整，每期由原来只刊350首左右诗词增加到现在的500首以上，容量比原来增加了40%，提高了来稿的利用率。

为了提高办刊质量，编辑部建立了作者、读者、编者三方联席会。刊物发出一个月后，由编辑部召开在黄州有关人员座谈，请他们提批评、建议、发扬优点，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编辑部内部建立了工作责任制，制订了守则，共7项，15条。

《东坡赤壁诗词》曾五次获得荣誉：一是1990年以优质期刊被选为亚运期间参加北京书展。在诗词期刊方面，只有我们一家；二是1991年获省文联系统报刊版面设计奖；三是1992年被评为湖北省地市州县文联系统先进单位；四是1995年获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栏目设计奖；五是1995年获黄冈地区群众文艺团体特别荣誉奖。

《东坡赤壁诗词》1989年前，一直标明由东坡赤壁诗社主办。后因省新闻出版局强调，必须是县级以上单位才能主办。经商定改

由地区文联主办，地委宣传部主管，至今仍保留这种体制。

《东坡赤壁诗词》编辑部同时也是诗社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副社长的分工则各有侧重。丁永淮去世前一直担任本刊主编。副主编先后有叶钟华、田世儒、缪英（曾担过两年的常务副主编），舒徐（曾担任过第一副主编）；从1995年1月起，我开始到编辑部坐班，担任执行主编。当前的副主编是叶钟华和舒徐。

诗社和编辑部财务一本帐；开支一支笔，印章分开用。所有经费，集中用于办刊，每年开支约7万元。来源有五个渠道：一是地方财政补贴（从1989年的5000元到现在的2万元）；二是社员交来的社费（交费社员约500人，凡交费者，诗社回赠全年期刊）；三是发行收入；四是少量广告收入；五是社会赞助（含单位、个人）。编辑部除一名专职外，主编、副主编均为离退休人员，月补劳务费120元，基本上是“义务兵”、“志愿军”。

回顾建社，办刊15年的历史，可以说道路曲折，创业艰苦，守业更难，迎难而上。

□童怀章

1998年5月

我所知道的黄梅戏

我生长在黄梅采茶戏即黄梅戏之乡的黄梅县，对黄梅戏作过一些研究。1983年10月，湖北省文化厅根据全国艺术科研领导小组在长沙召开的戏曲史志会议精神，确定编辑《黄梅采茶戏志》，将它作为湖北省艺术科研重点项目列入计划。省文化厅和县委宣传部协商，将我抽出来作这个志书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此，又对黄梅戏进行了深入的专业研究工作。先后到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南、河南等省的56个县市，累计行程12500余公里。走遍了黄梅县所有乡镇的部分村塘，走访了老艺人、老文化、老观众300余人，向他们请教、采访、录音。查阅了有关通志、府、县、乡土志、家谱210余匣，计2000多册；选读了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文人笔记、诗词、民间文学及建国前后的戏曲期刊2000余册。从中摘录了黄梅戏在黄梅形成和传播资料33条。研读了传奇杂剧、黄梅戏与花鼓诸腔的传统剧目700余册，选录了各地名老艺人唱腔磁带29盒。从而更加深入、全面学习了黄梅戏与花鼓诸腔的历史，八易其稿，完成了《黄梅采茶戏志》的编写、出版计划。

一

黄梅戏发源地黄梅县，位于湖北省的东部，地处吴头楚尾，是吴楚文化的结合部。黄梅戏，又名黄梅采茶戏，曾名花鼓戏、三角

戏。流行于湖北黄梅、江西九江、安徽怀宁为中心的长江两岸50余县。它是在黄梅县流行的民歌小调、山歌畈腔、采茶歌的基础上，在湖北清戏、江西湖口高腔及汉高、昆曲的影响、滋润下，与黄梅流行的说唱文学、民间舞蹈、岁时风俗、启蒙读物、民间体育等相结合，在黄梅北部山区逐步形成的民间地方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地方剧种之一，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黄梅县老艺人代代相传：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紫云、垅坪、多云等山区的田歌畈腔和采茶歌。纵观历史，黄梅县的歌风很盛。有山歌、畈腔、茶歌、渔歌、牧歌、船歌、门歌等。明人徐霖记述黄梅歌风是“老稚相与歌于野，商贾相与歌于途”。文曲艺人於少连演唱的《十二月采茶》，本是五句头高腔山歌，也可作畈腔演唱。如“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妹双双赶茶春……”《黄梅民歌》集上著录的李坤生唱的《上茶山》，其他如《十二月长工》等，都是五句头山歌体，也有小曲体《十二月采茶》。《姑嫂望郎》这出传统折子戏，就是以采茶歌为骨架发展起来的。如：“正月里，到采茶，牡丹花，梅花开，梅花开得锦绣花儿回”等唱词，仍保留了采茶歌的原始演出形式。《茶树青又青》、《姑嫂采茶》、《采茶扑蝶》等采茶歌，尚在民间流传。历代志书对黄梅民歌演唱规模也有记载。明泓治版《黄州府志》刊吴宗佑的黄梅渔歌、樵歌的题咏：《大港渔歌》：“红蓼村边月满船，白濑洲上水如烟。一声欸乃知何处？人倚蓬窗欲醉眼。”《多云樵唱》：“一曲呕哑万叠山，翠岚欲滴露华寒。攀危云磴归来晚，欲觉余声杳霭间。”光绪二年版《黄梅县志》载：“樵予放歌，响应山谷，有似属和之者。”清石朗的《多云樵唱》：“日溪曲磴绕高歌，知是樵人下薜罗。我亦夕阳归去晚，一肩担得白云多。”太白湖中“渔有千艇，朝暮歌声不绝”。有“倾倒太白听渔歌”之说。清人余世芳咏《太白渔歌》：“频叶芦花极望长，歌声缭绕水中央。夜来渔火还归棹，惊起沙州雁几行。”明清俗曲〔绣荷包〕、〔玉娥郎〕、〔闹五更〕、〔八段锦〕等80余

种，在黄梅广泛流行。乞者、盲人走村串乡卖唱，男女青年学唱，蔚然成风。同治《德化县志》刊清人高植的《从封廓州到小池口》的“七绝”，对黄梅县丰富多彩的民歌演唱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沿途耕获爱田家，黄麦青秧胜看花，听得元腔郊外曲，隔江空自怨琵琶。”此外，赛歌、对歌、传歌的风俗也很流行。放牧、薅草等农活中，漫山遍野，歌声不绝。长篇叙事的《梁祝山歌》，长达400余首，明代就在民间流行。甚至有人形容黄梅的石头也会唱歌。《皇华纪闻》载：“破额山麓有唱歌石，人卧其上便解歌，后被雷击不验。”《湖北通志》也有记述：“双峰山，其麓有唱歌石，后为雷击！”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说明黄梅歌风很盛。元初(1267—1350)江西吉安老塾师刘洗，仿黄梅民歌体裁写过五首《秧老歌》，其中有一首是：“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播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锄去，白头老妪驱犊奔……”其他省、县民歌中，也发现了冠以黄梅的记载。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南部歌谣简论》辑录高淳、史重满唱的“千年铁树开了花”，就标明是“黄梅调”。洪湖文化馆编《洪湖民间歌曲集》的《秧田歌》，辑录了流行在洪湖县龙口乡薅草山歌，就注明了是“黄梅号子”。名目众多的山歌小调，大大地被黄梅戏所吸收和溶化，成为该剧种的主调声腔和小调插曲。

二

自然灾害是促成黄梅戏由山区向平原、洲滩地区发展和对外流播的客观条件。黄梅县由于依江临湖，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更为突出。长江水位过高，则有决堤之险；春夏之间，境内雨水过多，湖水急剧上涨，沿湖地区就有溃涝之灾。古角、垅坪、小溪、考田四大山区，常有山洪暴发之患。明人石毗玉在《桂公堤碑记》中分析了黄梅水灾原因和江堤的重要性说：“黄梅背山面湖，民田尽在薮

泽中，江汉直注，彭蠡傍射，水患岁有。永乐中筑堤障之，江行屋上，民处泊中，以堤为命。”从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黄梅县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103次，其中大水灾65次，小水灾连年不断。清乾隆、道光年间，又最为突出。乾隆时期，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有12次，朝廷为水灾发了10次《圣谕》，反映了黄梅受灾惨状：“因江水冲溢，民田庐舍无不漫浸。”“江水暴涨，居民田庐，猝被水淹。”“黄梅等县据荆楚下游，内湖外江，易被淹没。”道光年间，特大水灾有8次。旧县志记载灾后人民群众是“经旬难望九餐火，斗米堪求八岁儿！”“米价腾贵，民多流亡。”“死者相枕籍。”“有缺粮断火，举家冻饿而自毙！及行路自殣于冰雪中。”“死葬江鱼腹，生无立足地……”加上“苛重赋繁，逃亡过半。”年复一年的水灾，迫使青年男女纷纷学唱黄梅戏，以适应灾年逃水荒，打连厢、唱道情行乞他乡，求生存的需要。这就大大地促进黄梅戏以山区向濯港以下的江湖平原、洲滩地区及丘陵地区发展。

黄梅戏的形成年代，大多数艺人认定：萌芽于明万历年间，正式形成于明末、清初。民国中期本县艺人梅重喜、都昌邱丙生、湖口梅新魁、鄱阳周牛子等都说黄梅采茶戏，形成于明代，而在明末、清初就传到了鄱阳湖周围各县。黄梅县民间传说，从明万历年间知县来山聘提倡用采茶戏酬祀本县黄龄洞福主菩萨宋飞仙(原名宋益)，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1948年。清光绪八年《黄州府志》，刊明崇祯年间进士、黄梅知县、江西乐安人曾维伦的《黄梅风教论》中有“十月为乡戏”的记载。清顺治十一年(1654)版《黄梅县志》载“八月扮香戏，祀福神于村畈，竟成恶俗，祈禳必共建醮会，又不时扮戏，俗云‘戏愿’”。乾隆二十一年(1756)版《黄梅县志》又记：“八月二十二日，宋昭德侯神会亦然，至西乡村俗，建坛设额，诵经演剧更为动众。俗云‘报功’，靡然繁费矣！”光绪版《黄梅县志》也记载.唱戏酬祀宋飞仙、宋昭德侯事。

黄梅县有史以来唯一的地方戏，是黄梅采茶戏。曾维伦所述的“乡戏”、历代县志记述的“香戏”、“扮戏”、“演剧”等，就是指黄梅采茶戏，酬的神都是宋飞仙、宋昭德侯，而且已成为“恶俗”。这充分说明万历后期黄梅戏已萌芽；到明末、清初也就形成了。道光九年(1829)别霁林著的《问花水榭诗集》黄梅竹枝词中“多云山上稻苏多，太白湖中鱼出波，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作者自注：“邑喜采本县近事，附会其词，演唱采茶歌。”这个自注，就说明了黄梅人喜欢采访本县近事，而编剧本，采茶歌就是酬神的采茶戏，社主即福神宋飞仙。这就证明了明末以来酬祀宋益等二人所唱的是黄梅戏。也证明来山聘提倡用采茶戏酬祀宋益的传说可信。

三

黄梅戏从萌芽到创新，经历了道情和独角戏、两小和三小戏、三打七唱、管弦伴奏四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也不是绝对固定和静止的，而是各个阶段有机的、相互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道情独角戏阶段，萌芽于明代中叶，但在黄梅、广济、瑞昌、都昌、大冶及鄂东南、赣东北其他各县，目前还有用道情这个曲艺形式来清唱采茶戏。再如管弦伴唱阶段，黄梅县及鄂东南、赣东北农村业余采茶剧团，建国后仍然用“三打七唱”形式演唱采茶戏，1956 年才结束“三打七唱”。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只能从早期的艺术特点来划分。不可能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就全部终止一个历史阶段的艺术实践活动和戏曲声腔的丰富发展及新剧目的诞生！

黄梅戏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中，有道情、“三小”、“三打七唱”三个阶段，是在黄梅县形成和发展的。“三打七唱”是黄梅县重要的历史阶段。唱腔、基本传统剧目、表演艺术在这阶段全面形成，班社大量出现，服饰也趋于完备，规章制度和分配原则也初步确立。从

两则清政府禁令和碑记，可以看出这个历史阶段，黄梅戏在黄梅的演出盛况和规模。清康熙年间，黄梅文人石乔年在《重修资福寺记》中骂道："借白莲之域(笔者注：指佛教禅宗四祖寺、五祖寺所在地。传说禅宗五代高僧弘忍在五祖寺顶峰上手值白莲花，故将黄梅称白莲之域。)以奏淫哇。……如村童之剧戏，亦示黄叶以止啼，譬优伶之登场，强效具脂而断指，魔风飘荡、妖雨淋漓，未有盛于此时者也。"清绍兴师爷传抄秘本《示愈集录》云："严禁演唱采茶：今本县访闻梅邑城乡村镇，自新正以来，演唱采茶者，迨无虚夜，灯火酒饭，靡费甚多……风化攸关，令亟示禁。为此示仰县属城乡村镇各土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即各务本业，勿得仍搭台敛费，演唱采茶……"

"三打七唱"阶段，黄梅戏随着黄梅灾民的脚印，打连厢、唱道情沿门乞讨，艺人落籍他乡教场传艺，班社到省外演出等途径，全面流播到赣东北、皖西南、鄂东南50余县。成为上述地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地方戏。据调查，长江中下游两岸7省29个花鼓、采茶、三角戏与黄梅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清咸丰辛亥(1851)任成副贡中试，江西省乐平县六都聚源村人何元炳，曾在黄梅戏流行区的石埭、东流、繁昌任过知县。他在《焦桐别墅诗稿》中，留有《下河调(黄梅腔)》"七绝"云："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何诗中的江南曲，就是赣剧饶河调。经两赴乐平，拜访采茶戏、饶河调名老艺人程其柱先生，他说："我们这地方土生土长的剧种是饶河调。〔下河调〕、黄梅腔，即黄梅采茶戏，自从明代，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由湖北黄梅传来的。传到都昌、浮梁、鄱阳、乐平以后，当地的饶河调，就开始衰落，代之就是黄梅采茶戏，而且比饶河调更兴旺，更受人欢迎了。"他不知道乐平历史上有个何元炳和何的这首诗，而他的口碑与何元炳诗的内容完全一致了。道光六年版安徽省《宿松县志》，记载"采茶"是"新声"群众演

出时，“长老摈斥”诬它“溺情惑志”，这种新声来自黄梅。民国九年版《宿松县志》作了记述：“邑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邑青年子弟，每逢场作戏时，亦会有习之者。”195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兆乾的《黄梅戏音乐》中有：“黄梅戏因来自湖北黄梅，故称之为黄梅调。”安徽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王少舫曾在1981年第一期的《黄梅戏艺术》中撰文写道：“1939年……为了糊口谋生大家合计京剧、黄梅调同台演出。”1960年9月，我同黄梅县采茶戏老艺人乐柯记拜访了安徽省著名老艺人丁永泉老先生，他说：“黄梅戏解放前在安庆地区叫黄梅调，因为他来自湖北黄梅县。大约在乾隆年间，黄梅逃水荒的人用道情、连厢等形成，把它带到了安徽。”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皖优谱》称：“今皖上（安庆之别称）各地乡村，江以南亦有之，有所谓草台上戏者，所唱皆黄梅调。”解放前上海有份剪报《秧歌的传播》中提到：“皖南宁国等地区还流行着一种叫黄梅调的小戏班……所谓黄梅调，该是发源于鄂东黄梅县的吧？”198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时白林的《黄梅戏音乐概论》中说：“黄梅戏诞生在湖北黄梅县，当地叫‘采茶’。成长在安徽省安庆地区，因为过去所用的唱腔，多为黄梅的采茶，故称为‘黄梅戏’或‘黄梅调’。……就以该剧兴起而论，有认为发生在湖北黄梅县的；也有认为发生在安徽省安庆地区的；有认为发生在江西；也有认为发生在鄂赣三省交界处的。从这一地区地理方位及其所形成的民歌和地方戏曲的色彩区看，诸家之说，也各有道理。但从艺人师从的记载，保留剧目以及积累的唱腔（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诸方面综合分析，全面衡量，还是以发生在湖北省的黄梅县，成长在安徽省安庆地区之说，比较合理。”安徽省文化厅在五十年代，将安庆地区流行的黄梅调，正式定名为黄梅戏。

黄梅戏由鄂赣皖毗邻地区发展成为全国、全世界的知名剧种，是在“管弦伴奏”阶段，由安徽省安庆地区完成的。到建国后全面实

施“管弦伴奏”。特别是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将传统戏《天仙配》、《双救举》(易名《女驸马》)改编后，搬上舞台、银幕、荧屏，编剧、导演、音乐、演出、舞台美术等方面全面创新，促使了黄梅戏的大发展、大普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地方戏。安徽省的同志，为发展、振兴黄梅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黄梅戏传统剧目积累，是非常丰富的。鄂赣皖黄梅戏、采茶戏、花鼓戏、三角戏艺人习称“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50年来经过向名老艺人请教，用自费搜集、记录、挖掘了历代艺人演出脚本230余本、出。其中正本戏103本，小戏、折子戏、串戏127出。上述剧目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其主要渊源是：源于明清坊间刊本、民间手抄本的弹词、宝卷；来自民间长、短篇叙事民歌；根据黄梅、广济等县清代所发生的真人真事及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的生活片断创作的；从明清俗曲、汉剧、高腔中移植的少数剧本。传统剧目主要题材是：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斗争；②反映封建社会黑暗官场冤案如山，赞颂清官为民请命，平反冤狱；③反映忠良与奸党及社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④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残酷，赞颂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⑤歌颂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封建门阀制度的坚决斗争；⑥鞭挞为富不仁，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赞颂人穷志大，不卑不亢的有志之士和努力向上者；⑦揭露腐朽的社会风气以及妻妾制度的残酷，争夺封建家庭的财产继承权，残害善良者；⑧歌颂青年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的勤劳俭朴，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⑨揭露劳动人民内部的欺诈、懒堕、好酒贪杯的坏风气；⑩反映僧道们和皇帝的生活。这批剧目中有一些真人真事为主要内容的特有

剧目。其中串戏有《蓝衫记》13折,《毛子才》4折,《闹公堂》2折,《告坝费》8折,《私情记》10折,《杨二女起解》1折。本戏有《告经承》3本,《打粮房》2本。

黄梅戏的音乐,丰富多采,表现力强,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传统唱腔,分为两大类,主调和小调,主调有〔七板〕、〔火攻〕、〔高腔〕、〔还魂腔〕等板腔体的曲牌。〔七板〕,皖西南黄梅戏叫〔平词〕,九江、鄂东南、武宁采茶戏叫〔平板〕,乐平、万年采茶戏名〔湖广调〕、〔下河调〕,景德镇采茶戏叫〔池调〕,赣东北采茶戏、睦剧、闽北三角戏叫〔湖广本调〕等,这是黄梅戏最有特点的曲牌。它节奏变化多样,板式比较完整,适应力强,既能抒情,也可叙事,可以表现男女老少,忠奸正反,官宦黎庶各种人物。它源于山歌畈腔。黄梅目前流行的五句头高腔山歌,虽有〔七板〕的影子,但与现行的〔七板〕比较,确有差距。经反复在黄梅北部山区寻找古老的畈腔,却没有人能唱。老者们说:"失传已久。"1984年10月上旬,在黄梅、广济(今武穴市)交界的横岗山区,寻到了这个产生〔七板〕的畈腔。它是在农村插秧、薅草时专用的。演唱形式,是一人领唱,众人"背攻",即众人哦嗬。唱词不是五句头山歌,而是七言体或十言体上下句为一段。我们录了横岗乡荷叶塘村老农民胡云山《七仙女下凡》的唱段。其板式、结构、节拍、衬字等,都与〔七板〕相符。清道光年间宿松县解元赵世暹在《养性轩诗草》中有"田歌竞唱采茶腔"之诗句。这说明田歌畈腔形成戏曲声腔之后,农民的田歌,都竞唱"采茶腔"了。〔二行〕用于回忆往事和故事发展过程,唱起来使人感情激动。〔火攻〕用于表现急躁、气愤、惊恐、盛怒的感情。〔高腔〕用于表现幽默、清闲、欢乐的思想感情和宗教人物的唱段。〔回魂腔〕表现忧郁、低沉、哀怨人物的情感,多用于鬼魂唱段。小调,基本上是一戏一调,有的以戏名调。如《夫妻观灯》有〔观灯调〕,《蓝桥汲水》有〔汲水调〕,《补背褡》有〔补背褡调〕等,还有正本戏中用了一些明清小曲

作为插曲，小调共有 150 余种。

黄梅戏的形成与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皖西南、赣东北、鄂东南历代戏曲舞台，造就了不少知名艺人，他们为继承和发展黄梅戏作出了巨大贡献。黄梅戏发源地的名艺人，据五十、六十年代 80 岁以上的老艺人回忆，可追溯到清乾隆中期，乾隆以前就没有人知道。乾隆中期的著名艺人，因记录资料在浩劫中散失，现在只能上溯到嘉庆、道光年间的邢秀娘、何仙姐两名坤旦。《黄梅采茶戏志》著录了嘉庆、道光年间至 1968 年 53 位名艺人小传。附录了铺堂搭班后，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比立传艺人稍差一点的艺人简介有 28 人。《中国戏曲志·湖北卷》的《传记》篇中，选录了黄梅的蒋酉泉（传奇剧作家）、罗运保、帅师信、帅毛丛、梁松贵、江六 、柯火英、余海先等 8 人。《黄梅戏史料专辑》选编了邢秀娘、龚三齐、罗运保等17 人传记。应《人民政协报》文史版编辑之约，1998 年 3 月 25 日发表了《清代著名黄梅戏坤旦——邢秀娘》。

□桂遇秋

黄州现代民间绘画发展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文艺春天。根植乡间俚闾的黄州民间绘画，经过发掘、培育、创作之后，登上了艺术大雅之堂，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中的一枝奇葩。

1983 年 9 月，为迎接“湖北省首届农民画展览”，黄冈地区群艺馆与黄冈县文化馆联合举办了首次农民画创作班，黄冈县 6 名作者参加了创作组。创作班结束后，湖北省文化厅、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分会、湖北省农牧业厅、湖北省农会，在武汉举办了“湖北省首届农民画展览”，黄冈地区 10 件作品参展。黄冈县华贻和的《山村车赛》，方子殊的《中秋月圆游子归》参展，受到专家及观众的好评。

同年 10 月 16 日至 31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全国农民画展”，参展作品 292 件，出自全国 29 省市自治区的 301 名农民作者之手，华贻和的《山村车赛》成为黄冈县进入国家级展览的第一幅农民画。11 月，湖北省群艺馆在“参加全国农民画展观摩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评述说：“……《木梓丰收》（长阳县土家族农民作者郭永富创作）、《山村车赛》同属山区新貌，前者深沉而厚实，后者富丽而轻松，鄂西、鄂东情调各有特色。”

1985 年 1 月，湖北省文化厅以鄂文〔85〕第 24 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搜集、整理和征集民间美术品的通知，要求各地、县群艺馆、

文化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开发、挖掘、抢救民间艺术宝库。3月22日，黄冈县委宣传部、县农会、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文化局联合发出《关于收集整理民间美术作品及举办黄冈县民间美术作品展览的通知》，文化馆旋即组织专班，由副馆长戴楚东同志(已故)率美术辅导干部何元庭、杨明分赴全县9区4镇，会同区镇文化站开展收集、征集工作。历时两个月，共收、征集民间美术品500余件，其中印花12件，绣花15件，挑花198件，雕刻36件，皮影24件，编织14件，字画21件，及部分艺术性较强的陶瓷工艺品。

5月25日，在黄冈县文化馆举办了《首届黄冈县民间美术展览》，共展出作品192件，25件获奖。展览结束，编印了《黄冈县民间美术资料》一集(油印本)。

这次民间美术品的搜集、展览整理工作，对后来创建黄冈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取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大量民间美术品，馆中的文艺工作者均在为之神往和感慨，同时也进行了认真思索：深藏于民间的文化遗产，蕴量丰富，急待抢救、利用和开发，这既是文化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光荣使命。

经过认真的思索和酝酿，美术辅导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农民画作为美术工作的重点来突破，力争经过几年努力，创造出有特色的工作业绩。他们的设想，得到了时任文化馆馆长谈祖应同志的大力支持，并迅速制订了“一年组队、两年培训、三年出成果”的实施计划。全馆总动员，花本钱，花力气，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倾斜，重点投入，全年拨款近万元资金做农民画的发展经费。

目标确定后，组建作者队伍成为首要工作任务。当时，尚未提出“现代民间绘画”的画种概念，仅以作者的户籍为农业户口，即农民画的画称之为农民画。因而，原美术作者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作者便被拒于农民画之外。为了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作者队伍，美术辅

导组的全体人员，又进行新一轮的调查。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人，是对画画有兴趣爱好，且有一定技能的人。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全县进行梳理式的调查，历时又是两个月，走遍全县18个乡镇的77个自然村，座谈访问200多人，发现了新作者52人，组建了基本队伍。

1985年8月，文化馆召集这批作者中的10余人，举办了黄冈县第二期农民画创作班。创作班的主要任务是让作者认识和了解什么是农民画。采用一听、二看、三交流的办法进行辅导培训。听省地两级专家讲解农民画的基本知识，讲解楚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态；看湖北省首届农民画展，观摩上海金山、陕西户县农民画优秀作品的幻灯片；结合自己原从事的工艺，如油漆工艺、绣花、编织等实践交流对农民画的认识、感受和体会。经过几天的学习，作者们对农民画有了初步的认识，创作的热情调动起来了。有几位作者边看边听边构思，交流时拿出自己画的小草图，辅导干部看后觉得很有新意，反映出当代农民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中蕴含着民间传统的审美情趣，又展现出当代农民的理想追求。通过这[illegible]创作班，美术辅导干部在辅导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即充分发掘[illegible]者在生活中所积累的感悟到的民间传统文化所熏陶出的艺术感受和审美意识，启发作者根据自身的体验，表现各自的艺术个性，画自己所思、所见、所为、所愿，放手让作者想怎样表现就怎样表现，不受绘画的一般方法、技能、表现形式等诸多框框的束缚，画“我”的画。创作班结束时，每位作者都画出了一、二幅作品，虽然不算太成功(这是后来的认识)，总算跨越了从不认识到认识的一大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6年3月，文化馆又趁热打铁，举办了第三期全县农民画创作班，吸收新作者参加，使作者扩大到20余人。为了使作者安心创作，文化馆从领导到员工，人人出力献策，美术辅导干部们办起

了临时食堂，亲手为作者烧饭炒菜，安排日常生活，使作者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创造出成果来。经过20多天的共同努力，创作出15幅作品，吴春娥的《鸟窝》、陈继光的《渔鹰捕鱼》、喻友坤的《牧归》、龙旭光的《糖菩萨》、华贻和的《晒红柿》成为这批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不仅呈现出各处的艺术风格，也奠定黄冈县农民画创作的基石，且展示出发展的前景。

为了使农民画画出黄冈的特色，1986年秋，文化馆在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派出副馆长戴楚东、美术干部何元庭北上陕西户县，东赴上海金山，走出去取经。在上海金山专程拜访了金山农民画乡的开创者吴彤章老师，听取了他辅导农民画创作的经验介绍。返回黄州后，9日，又举办了第四期创作班，作者13人，历时15天，创作作品20件。

为了使黄冈县农民画稳步发展，形成能表现楚文化深刻内涵的独特风格。1986年10月，成立了《黄冈县现代民间绘画研究会》，并组织撰写一批理论文章，编印了《黄冈县民间绘画文集》(第二集)。

1987年，黄冈县文化馆获知文化部将于金秋时节在首都北京举办首届《中国艺术节》，艺术节将举办代表国家级水准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展览》的消息。全馆文艺工作者得此消息后，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展览本身足以说明民间绘画已从民间自生自繁、自我发展的状态进入了以一种美术派别、画种的身份登上了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中国民间美术馆馆长曹振峰指出的那样：现代民间绘画的前身虽然是农民画，但它并不只限于农民所画的画。它是一种以反映民间现实生活、展示民情、民风、民俗，以人民群众喜爱的表现形式，表现出属于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的一种新型画种。担忧的是起步较晚的黄冈县现代民间绘画能不能在这次机会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得到社会的

共识，心中无底。按当初预定方案，1987 年也该是出成果的年度。在这次大展中如不能占一席之地，不仅说明工作没有做好，更会挫伤作者们的积极性，难以面对各级领导的重视。为不失去这个展示成果的机遇，1987 年 3 月间，第五期创作班在文化馆开班，12 名作者参加。对每一题材，作者、文化馆业务干部都参与讨论，小稿一改再改，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15 件作品把深刻的民间文化内涵表现了出来。

1987 年 4 月，美术干部何元庭、杨明带着三年来创作的农民画彩色照片，去省群艺馆专家面前求教。恰逢曹振峰馆长来汉，曹看到这些照片后，很高兴，连说："好，这填补了表现楚文化的民间绘画的空白。"当即决定让黄冈县挑选 30 幅作品进京候选。何、杨二人听了曹振峰馆长的评价和决定后，欣喜若狂，迅速回馆，着手准备作品赴京参展。

1987 年 5 月，黄冈县第六期农民画创作班开办了，10 名作者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北京参展作品的深加工之中，历时 20 天，除加工部分作品外，又创作 13 幅新作。

7 月，挑选出 30 件作品送省群艺馆，省馆专家们从 30 幅中筛选 25 件，代表湖北省民间绘画成就赴京参展。

9 月 6 日，《首届中国艺术节·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佳作 200 幅，黄冈县 8 幅作品参展，参展件数与另三个地方并列第 5 名，超过久负盛名的陕西户县(7 件)。这 8 幅作品是：《收芦苇》(吴世民)、《渔鹰捕鱼》(陈继光)、《糖菩萨》(龙旭光)、《牧归》(喻友坤)、《鸟窝》(吴春娥)、《貂鼠戏葡萄》(吴春娥)、《晒红柿》(华贻和)、《皮影戏》(倪汉林)。

喜讯传来，黄冈县县委书记童水清即率县"四大家"领导前往文化馆贺喜、座谈，并当场决定：组织参展作品的作者进京观摩。中旬，7 名作者在戴楚东副馆长、辅导老师何元庭、杨明的带领下，观

看了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展。在展览厅，文化部长王蒙在《晒红柿》的画前与作者华贻和亲切握手、交谈，在《收芦苇》前，连声称赞："有品位，高档次。"美国友人曾用高价收购《收芦苇》，因其列入民间美术馆馆藏珍品，才未成交。

7位作者返回黄州时，县政府在文化馆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除颁发了奖金、奖证外，副县长余雪明还为7名作者及戴禁东、何元庭、杨明披红戴花。次日，《黄冈报》、《黄冈电视台》辟专栏予以宣传，报道。

1988年1月，文化部社文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现代民间绘画选萃》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具体落实了《中国现代民间绘画选萃》的入选作品，黄冈县入选5件。它们是：《鸟窝》、《收芦苇》、《夜明珠》、《晒红柿》、《牧归》。

3月16日，文化部社文局以社字〔88〕第026号文件形式，正式命名黄冈县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尔后颁发了命名证书：

兹命名黄冈县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社文局

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

黄冈县成为湖北省唯一被文化部命名的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4月，文化馆举办了第七期农民画创作班，作者13人，创作作品15幅。

5月，文化部社文局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民间美术工作会议》，45个画乡的辅导干部被授予"优秀辅导员"称号，文化馆何元庭、杨明获此殊荣。

7月，第八期创作班开班，12位作者创作出18幅作品。

8月，为迎接文化部、农业部、《中国农村经营报》、中国美协、书协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民书画大赛》，文化馆举办了赴京参赛作品攻关班，7名作者历时20天，创作作品13件。

9月,《全国农民书画大赛》在北京举行。25日,获奖作品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我县陈继光创作的《迷魂阵》获三等奖。为表彰陈继光在民间绘画事业中所取得的成绩,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源卿同志亲自将奖杯、奖证送到作者家中,向作者贺喜。陈继光所在的堵城镇镇委、镇政府也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陈继光被称为堵城的光荣和骄傲。

12月1日至20日,湖北省文化厅、农牧厅、水产局、乡镇企业管理局、美协湖北分会、书协湖北分会在省美术学院美术馆联合举办了《湖北省农民书画展览》及《黄冈县农民绘画展览》。共展出作品151件,其中县展占48件。经专家评选,我县7件获优秀奖。它们是:《蛙池卫士》(苗冬花)、《挖红苕》(王体辉)、《牛》(王体辉)、《池塘养蚌》(吴世民)、《干鱼塘》(龙旭光)、《祝》(龙旭光)、《渔家乐》(陈继光)。尔后,《蛙池卫士》、《池塘养蚌》、《祝》、《渔家乐》四幅随"湖北省民间美术展览"赴香港展出。

为了使画乡建设跃上新的台阶,真正普及到农村去,从1989年起,文化馆与各乡镇文化站一起,"走出去",把培训班、创作班办在乡镇文化站,办到骨干作者的家中。陈继光、龙旭光、吴春娥、华贻和4人在家开门收徒,无偿为培训农民画的新作者们作出贡献。至1990年初,全县有民间绘画作者近300人,其中重点作者156人,骨干作者50人。

3月,为适应画乡建设的新形势,分别在路口镇、堵城镇、回龙山镇、总路咀镇、马曹庙镇、团风镇、但店镇成立了7个民间绘画研究会分会,建立起培训基地,形成普及网络。由研究会总会与分会签订了包括三年发展规划、队伍建设、创作目标、理论研究等内容的责任书。

分会成立后,研究会精选了部分原作及全部作品的彩色照片,制成14块展板,从5月10日起,在7个分会举办《黄冈县民间绘

画巡回展》，历时 10 天，观众逾万人，使全县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群众认识现代民间绘画，看到他们的理想、追求、愿望被自己身边的熟人、朋友及子女们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之惊喜。一时间，在所展出的地区，民间绘画成为热门话题。

6 月 5 日至 25 日，为迎接由文化部群文司、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群艺馆联合举办的《全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作品邀请展》，文化馆举办了第 10 期民间绘画创作班，作者 14 人，创作作品 26 件，经湖北省群艺馆有关专家评选，选送 6 件参赛。

8 月，《全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邀请展》在吉林省群艺馆开幕，龙旭光的《归》获二等奖；吴春娥的《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获三等奖；陈继光的《瑞雪满巷红》、冷华的《冬眠》、《池塘里的脚鱼》获入选奖。

1991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应武汉东湖风景区磨山管理处之邀，“黄冈县民间绘画展”（此时黄冈县已改称黄州市）作为“武汉市东湖第二届金秋园林节”十大展览之一，展出的 60 件作品，以浓厚的乡土情调，大开江城人民眼目。后经磨山管理处之请，在磨山“楚城”设专门展销厅，常年展出，直到 1996 年黄州市区县分设，因划分作品才终止展销活动。

1991 年 12 月，应北京音乐厅画廊之邀，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参加北京音乐厅《圣诞节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作品展销展览》，8 幅作品被外国朋友收购，实现我市民间绘画外销空白的突破。

是年，《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继 1989 年 10 月 7 日《农民日报·周末版》以《闯进迷魂阵——记农民画家陈继光》为题的宣传报道后，进行了传播报道，湖北电视台录制了《乡土丹青》专题记录片。尔后中央电视台《老区行》录制组把黄州市民间绘画作为鄂东之行的重头戏予以报道。

1992年10月20日至23日,“湖北省部分县(市)农民画工作座谈会”在黄州召开,黄州市市委副书记张焕卿到会介绍了我市画乡建设的经验与成就。

1993年,文化馆在“民间绘画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黄州市民间绘画画院”,聘请骨干作者冷华任专职画师,从事创作、复制工作。7月,在旅日侨民增木惠子(张春香)的促成下,黄州市民间绘画作品30件在台北市展出,展期销售17幅。

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堵城镇农民画家陈继光在黄冈地区群众美术馆举办了个人民间绘画作品展,并举行了座谈会。这次展出的是以该作者积年所绘的近百幅作品中挑选出的40件。湖北美术出版社、省群艺馆、黄冈师专美术系的专家们对展览和陈继光的创作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4年初,获知日本鸟取县境港市中国文化研究会将组团来访黄州,重点观摩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3月14日至21日,文化馆举办了1994年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创作班,14位作者共创作21幅作品。

4月9日,日本鸟取县境港市中国文化研究会在中央新报社境港支局长冈田昭博为团长,境港市长秘书增木惠子为副团长的访问团一行11人对黄州进行了友好访问,参观了“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展”,举行了以绘画为主题的座谈会。访问团离黄时,选购了8幅作品。同时以画院的名义向境港市市长黑见哲夫及正,副团长各赠农民画一幅。访问团归国后,于4月25、26、27连续三日在《鸟取日报》发表了冈田昭博撰写的《国际交流——境港中国文化研究会访中记》,文中介绍说:200人以上的农民画家队伍,文化馆的辅导、创作、展览、培训基地及遍布全市十一个分会的经常性培训创作活动是黄州民间绘画画乡的三大特点。

7月28日,冈田昭博先生致信谈祖应馆长,转达境港市市长

黑见哲夫先生邀请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赴日展销。

8月,《中国日报(海外版)》等15家涉外新闻单位专程来黄采访黄州市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建设。9月13日,《中国日报》(增版)以7国文字刊发了介绍黄州民间绘画与农民画家的专访文章,刊登了吴春娥及其代表作《鸟窝》的照片。

11月27日,文化部文外函〔1994〕2213号《关于同意黄州市文化馆赴日本举办民间绘画展的批复》下达,允许在日销售15幅作品。

12月,《中国黄州民间绘画作品展》在境港市市民会馆展出30件作品,展出7天,15件作品被日本朋友购买。

1995—1996年4月止,除各分会举办分会培训创作班外,研究会因转入民间绘画的开发工作,而未办全市性的创作班。在此期间先后有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及挪威朋友和画商专程来黄购买现代民间绘画,共计售出80余件。

至1996年5月区县分设时止,黄州市民间绘画,共创作作品780余件,其中在省级及国家级展览和刊物上发表660件次,400余件次获奖。

区县分设后,黄州区文化馆面对作者队伍一分为二,部分骨干作者流失,决定重组队伍,实施新一轮画乡创建工作,1997年度,路口、堵城两分会已先后举办了培训班,重新培训了一批新作者,但毕竟是新手,尚未创作出较高的作品来。

在作者队伍中,经过数年的创作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几种不同风格的流派,并以其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较全面地反映出黄州现代民间绘画的整体风格。

以吴春娥为代表,以《鸟窝》为代表作的传统俗派。他们多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寓言、神话,构图饱满,线条萦绕宛转,借用民间绣花图案入画,设色艳丽,大胆动用对比色,堆红砌绿,立意多表现

吉祥如意，祈福祈寿的愿望。吴春娥，因中年丧夫，老年时其大儿病逝。家境贫寒，命运坎坷，尤其是长子的病逝，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很大。于是她在《鸟窝》中用大鸟将小鸟呵护在窝中的表现形式来抒发她的母爱。

陈继光是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曾当过两年代课教师，多年来从事油漆工艺。由于他生活在长江边，对滨江农民农闲时的渔业生产非常了解，且自己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多表现出滨江农民农闲时的生活情趣。因而其作品内涵较丰富，于不刻意中表现出楚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明显特色来。师从于他的徒弟亦深受影响。其代表作为《迷魂阵》。徒弟吴世民，高中毕业，从师学艺三年，受陈继光影响甚深，其代表作为《收芦苇》。师徒二人形成继承传统文化又面对实现的一个派别。

以华贻和为首的文人画派。华贻和，从事美术工作多年，工于年画、国画、水粉、水彩等诸多画种，接受系统绘画知识及理论的教育，因而其作品立意深邃、含蓄、表现力强，注意构图的空灵感，注意色彩的搭配，讲究一定的透视立体效果。其代表作为《山村车赛》、《晒红柿》。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龙旭光、喻友坤。龙旭光，其代表作《归》；喻友坤，代表作《牧归》。

冷华，堵城镇人，高中毕业生，接受现代文化教育较多，对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了解甚少，因而在其作品中以现代的审美观念来审视他们要表现的事物，作品中的主观意念表现强烈，成为黄州民间绘画中的现代派别，其代表作《冬眠》、《旋》。

□熊民生

珍贵的货币

黄冈市博物馆收藏着两张珍贵的货币——“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它是黄冈县农民协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剥削阶级操纵垄断金融的历史。是黄冈农民试图掌握金融命运的伟大创举，在中国金融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确认为一级革命文物。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是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斗争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同时也随着国共合作破裂而被迫停止发行和流通。

黄冈县(1952年分为黄冈、新洲两县，1996年黄冈县又分为团风县和黄州区)农民协会是湖北省最大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其时，中共黄冈县委、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由农村迁往鄂东政治中心黄州，公开领导全县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民协会，遍及穷乡僻壤。1927年5月，全县拥有16个区农协、300个乡农协，会员24万余人。他们在广大农村惩办贪官污吏，审判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开展清算斗争，大张旗鼓地掀起黄冈农村大革命高潮，造成了“赤色满县、生气勃勃”的局面。

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切齿痛恨，千方百计

伺机反扑。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对当时还打着革命招牌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经济封锁。黄冈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闻风而动，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相配合，乘机封锁黄冈金融。有的卷款潜逃，有的就地窖藏，有的指使银号钱庄闭借闭贷，有的勾结流氓地痞扰乱金融。土豪劣绅蓄意制造金融恐慌，造成农村金融枯竭，货币流通不畅，阻碍商品交换，广大农民农副产品卖不出去，消费用品买不进来。当时正是青黄不接、春耕农忙之季，农民修理农具、购买肥料种籽迫在眉睫，而粮荒钱荒遍及城乡，贫苦农民纵出高利，也无钱可借，农村经济面临严重危机。黄冈的奸商在此金融梗塞之时，一面降低农副产品价格，抬高消费用品价格，贱买贵卖，操纵市价，剥削农民；一面以纸币为生财之道，任意滥发市票，借以扩充资本，从中获利，他们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物资作准备，到期无钱可兑，市票失效，农民遭殃。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希望农民协会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黄冈县农协为维护农民利益，解除农民的经济困乏，活跃农村经济，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建设。根据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县农协有计划、有步骤地创办了各种合作社，着重疏通商品流通渠道，调剂乡村金融，扩大农村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与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展开经济斗争。1927 年 4 月，黄冈县各区乡农协创办了消费合作社，县农协在黄冈的经贸中心团风镇设立消费合作总社和贩卖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农副产品与消费用品相交换的场所，解决农民农副产品滞销和消费用品买不进来的困难。5 月，县农协“将各区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之财产，尽数集中，举办全县农民信用合作社，使用银元、铜元两种纸票，以资流通”。黄冈县农协率先在湖北农村兴办各种合作社，成为农民摆脱经济困境的典范。省政府、省农协“闻黄冈各种合作社甚为发达”，特派省农协合作社人才训练班主任郭述

申、建设部干事李道衡陪同中央农政部苏联顾问那佐莫夫到黄冈考察，把黄冈县农协兴办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和发行流通券的经验作为省农村合作社人才训练班的学习材料。

信用合作社是县农协建设部领导的金融机构，主要职能是管理现金，监督使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发行货币，调剂金融。据《汉口民国日报》载：黄冈县农协信用社“在黄州设立总社，以便县农协就近指挥、监督，团风、新洲、仓埠、阳逻、但店、上巴河等处设立分社”，人口稠密的乡村设借贷处，以便农民支取。信用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一个地方，两块招牌，各自经营。在管理上，“依照银行办法，聘请专门人才主持一切”。

黄冈县农协信用合作社的首要任务是调剂金融，发行货币。县农协将没收土豪劣绅的钱财（包括清算的公产）集中到信用合作总社，“依照现金集中制，存入储金库，作为合作社基金”，在试办期间，印刷发行铜元五十万串、银元五十万元的流通券。铜元券在乡村流通，银元券在城镇使用。黄冈市博物馆在堵城征集到在乡村流通的铜元券两张，面值为“壹串”，彩色，长 150 毫米，宽 75 毫米，汉口大夹街道新印书馆印。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投放市场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由各区乡农协信用分社和借贷处向贫苦农民贷款。县农协在“纸票印成后，即行发贷，以济贫苦农民之急需”。信用社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借贷对象，贫苦市民和个体工商业者也可借贷。农民借款，须由个人申请，区乡农协审批，借款数额“每次至多不得超过铜元三十串或银元十元”，“所收利息至高不得过五厘”，特别贫困者可免付利息。上次借款未还，不得再借。当时许多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贫苦农民都在当地信用分社借过款，所得的货币都是信用社发行的流通券，既方便，又及时，不仅解救了农友的困难，活跃了乡村金融，而且使广大贫苦农民避免了高利贷的盘

剥，成为全县农民资金活动的枢纽，被当时《汉口民国日报》誉为“黄冈农民经济之福音”。

其二，通过农民协会兴办的消费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投放市场。黄冈县各级农民协会兴办的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共有“数十处”，既收购农村剩余的农副产品，又出售农民需要的消费、生产资料。消费合作社收购农副产品，必须付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样，“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就在消费合作社的商品交换中进入流通领域。据文献记载，团风消费合作社在商品交换中就发行流通券五万串。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通过借贷和收购农副产品投放市场，以出售农民需要的消费、生产资料回笼货币，不是象私商那样通过发行纸票从中牟利，而是充当农副产品和消费用品相交换的媒介。它以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合作社物资作担保，发行量是根据市场需要控制在一定限度，农民拿着流通券既可以到消费合作社购买日常用品，也可以到县内其它商店购买生活生产资料，凡持有流通券而产生怀疑者，即可随时兑换。因此，深得全县农民的拥护和县商会的支持。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在全县范围内流通使用过程中，发行单位都作了发行宣传。县农协为防止不明真相的农民挤兑，将发行基金、发行宗旨、发行数量、发行种类、信贷方式、管理措施、发行审批备案手续等事项在《汉口民国日报》作了详细说明，团风消费合作社在发行中张贴发行《通告》，《汉口民国日报》予以转载。《通告》中写道：“发行流通券五万串，意在各地金钱往来，便于携带，实与藉用市票取利者不同，凡我全县农友，务各认请此旨，并要知道农民消费合作社，系你们自己的商店，你们都是本社的主人。你们信用本社的流通券，即是俯仰你们自己，如其故意阻止，故意挤兑，那即是你们自杀，望特别注意。恐未周知，特此通告。”由于

发行单位及时做了发行宣传和流通券自身的信用，全县没有发生农民挤兑和不信用之举，使农民协会的流通券在全县畅通无阻，因此，省农协代表在向省党部的报告中，赞扬“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在群众中“信用很好”。

1927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与南京蒋介石合流反共，大肆屠杀工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被迫解散，流通券被迫停止发行和流通，使刚刚诞生不久的新生事物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扼杀。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及其发行的流通券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黄冈农民在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合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金融货币体系，对于扩大商品货币流通，活跃黄冈城乡的经济，打破土豪劣绅的金融封锁起过重要作用，是黄冈农民与土豪劣绅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它改写了历来由剥削阶级操纵垄断金融的历史，第一次由农民充当金融货币的主人，是黄冈农民掌握自己金融命运的伟大尝试，在中国金融货币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詹道喜

鄂东革命历史第一镇——七里坪

七里坪，原是一个名叫三家店的山间小村。清雍正年间形成集市，迄今已有250余年。同治初年，为抵御太平军进驻，开始修筑城墙，始成城镇。七里坪 镇位于红安县北部，大别山南麓，北与河南省接壤，东与麻城县为邻，西有倒水河缓缓流过。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条不大的河流便成了难得的交通要道。七里坪枕山挽水，风光秀丽，交通便利，自有集市以来，一直是鄂东山区北通河南、东达安徽的重镇。

在革命战争时期，这里的人民用鲜血乃至生命，书写了一部漫长而又厚重的革命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发源地，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初区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镇内遗存着大批重要的革命遗址遗迹，是七里坪人民始终不渝矢志革命的历史见证。

红安革命运动，发端于董必武和他创办的武汉中学。1920年3月，董必武为了在广大民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在武昌创办了武汉中学，通过多种途径吸收了许多家乡子弟入学读书，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并派他们利用假期回乡宣传，传播革命火种。1923年冬，董必武把武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中的家乡党团员学生，组成了中共黄安工作组，派回家乡正式发动和领导红安革命运动。他们回县后，一手抓过全县教育大权，一手大办农民协会和工会等革命组织。1926年冬，全县第一个工会在城区成立，接着成立

了七里区工会。七里区工会设在七里坪长胜街北端的潘氏祠堂。

潘氏祠是七里坪第一个革命遗址。这是一幢座东朝西的砖木建筑，两进四间，青砖青瓦，占地 210 平方米，当地人俗称为北庙。工会成立后，组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成立工人纠察队，维护社会秩序。还架起红炉打制刀枪，和农民协会一起，展开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

横行中国农村达数千年的豪绅地主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组织起反动武装红枪会，勾结兵匪，向农民运动疯狂反扑，残害农协干部。事件传到武汉，董必武立即召集会议，主持制订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训令各县迅速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和革命法庭，保护农民运动推向高潮。1927 年 4 月下旬，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县城成立。接着，七里坪革命法庭组成，第一任庭长张南一，首先开庭审判了他的地主舅父，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七里坪革命法庭设在镇南一座庙内，俗称南庙。一个南庙，一个北庙，就是土豪劣绅的冤家对头。这是七里坪在大革命时期开展活动的两个重要据点。

镇子东南角还有一座庙宇，名“文昌宫”，座东朝西，砖木结构，琉璃瓦面。始建明朝末年，经数次增修，成为三殿两院占地 561 平方米的建筑群。封建时代，这里办起了儒学。废除科举制，儒学改办新式学堂，1921 年成为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中共黄安工作组回到家乡后，把这里办成平民学校，从此成为党在七里坪的一个主要活动点。著名的黄麻起义就是在这里开始策划的。党在这里先后召开三次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分析本地斗争形势，决定和制定起义计划，成立行动指挥部等一系列工作程序都在这里形成，才使得鄂东大地响起一声炸雷，首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在 1928 年春攻占七里坪后，一把大火将文昌宫烧毁。

但是人民忘不了它！1974年，在原址上竖立起纪念碑，上书“黄麻秋收起义会议遗址”。

从这里笔直向北，也有一座高耸如剑的纪念碑，与文昌宫南北相望。国民党军在烧毁文昌宫的同时，还残酷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其中有一个英雄叫秦绍勤。他是中共七里区委和农协的领导人之一，敌人满以为抓到他就可以大捞一把，便把他押到北门外河滩上，施以酷刑。先用铁钉将他的四肢钉在木板上逼他招供，他宁死不屈。残忍的敌人把他剖腹挖心，残酷杀害。直到今天，七里坪人民还记得这位年仅21岁的英雄，作歌唱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黄麻起义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各路大军入境，大肆烧杀抢掠。农民武装在与国民党正规军游斗中，深感力量不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安定的立足点，才能有效地进行斗争。1928年5月，中共黄麻起义指挥部在七里坪北部与河南交界的柴山堡开辟出鄂豫边第一块根据地。然后，以此为依托，迅速向东、向南猛烈拓展，至1930年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2月，全县第一个区级苏维埃——七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将七里坪命名为列宁市，将河街命名为彭湃街，将长胜街命名为杨殷街，并成立了中共市委和市苏维埃政府党政机关，对全市进行市政管理。

杨殷街，是以革命烈士、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的名字命名的。街长497米，街面是一色的青石条铺砌。两边的房屋是一式的青砖瓦屋，木板铺面，屋檐高敞，兽头形的檐角高挑，是一条典型的具有大别山区建筑风格的街道，至今保存完好，尚属少见。当年，一些机关和单位都设在这里，现存的遗址有：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黄安县苏维埃政府经济公社、列宁市苏维埃政府饭堂合作社、红军中西药局。当时，街道两边几乎全是由各区乡经济公社和各家经营的店面，活跃着苏区的经济生活。杨殷街是列宁市的主要

街道。

彭湃街则是一条僻静小街，是列宁市的住宅区。列宁市苏维埃政府、列宁市经济公社织袜厂、列宁小学，都在这条街上。列宁小学是一幢面阔五间进深两重的砖木建筑，座西向东，占地256平方米。该建筑原是私人开的一个饭店，1927年七里区农民协会成立就设在这里，1928年文昌宫烧毁后，平民学校迁到这里，列宁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学校改名为列宁小学。入校学生，主要是贫雇农、红军及地方干部子弟。苏区领导人经常到校讲课，组织学生一边上课，一边上街宣传、站岗放哨等活动。这里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红军。今天，七里坪在原址建起了新学校，徐向前元帅题名为列宁小学，在遗址开办了“七里坪革命历史陈列室”。

在列宁市四周村庄，驻扎着中共七里区委、中共红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等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列宁市成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29年即来此工作了三年多的徐向前称七里坪为“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

1929年底到1931年初，鄂豫皖军民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和两次“围剿”，使根据地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革命热情，掀起了拥军参军的高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甚至全家当兵的感人场面，红军队伍得到了空前壮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西门外的河滩上宣告诞生，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现在，这里已经耸立起一块高大的纪念碑，永远纪念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在杨殷街中部，建有一幢二进两重，高大且漂亮的房子，用于县苏维埃政府办公，后交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机关办公。1930年冬，驻城外农村的县政府打算迁到镇内，群众闻讯十分高兴，纷

纷献料捐工，自愿修建起一幢当时全镇最漂亮的房子。房子座东向西，面阔七间，进深两重，屋高两层，外是铺板门面，内是雕花隔扇，中有天井，四周回廊，廊庑相连，精巧严谨，极富民间特色。房屋落成，恰逢四方面军成立，便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总指挥徐向前在这里研究制定了发动黄安战役、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计划。仅仅47天后，他们第二次拿下了敌人重兵驻守的黄安城。红军没有辜负七里坪人民的真情厚意。

还是这一年，中央派“左”倾分子张国焘来到七里坪。他先是以残酷的“肃反”扩大化来巩固自己在苏区的领导地位，继而令红军以不停顿的进攻阻止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仅仅16个月，他就把鄂豫皖根据地全盘断送，红四方面军被迫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一个月后，根据地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斗争。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二十五军也在1934年11月离开苏区而长征。但是，苏区的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地方党组织起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支持下，顽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的枪声，惊破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梦幻，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举抗日大旗。奉中共中央指示，活动在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和各便衣队，于1937年8月开始向七里坪聚集。10月，中央代表郑位三和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与国民党代表在七里坪举行谈判，解决了双方在合作初期的一些磨擦以及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从此，鄂豫皖边区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谈判遗址，是县署管理的七里坪“丰豫仓”。该仓是县北地区丰年贮藏、灾年赈济渡荒的官仓。里面的粮食全是农民的血汗，而管理权都在豪绅地主手里，真正的灾民想从中得到一粒粮食，则是相当困难。农民革命后，将粮仓收归农民协会，才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赈灾济贫的丰豫仓。该粮仓遭战火毁坏，现已复修。

在红军改编期间，为解决干部战士对于合作抗日的思想认识

问题，红二十八军和湖北省委在七里坪举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和青年训练班。董必武、叶剑英、郑位三、方毅等先后来这里视察和讲课，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军事干部。七里坪训练班，和应城汤池训练班、确山竹沟教导大队一起，并称为我们党在华中培养抗日干部的三大摇篮。干部训练班遗址在七里坪镇外秦基伟将军的家乡，青年训练班在镇西南角的高坡上。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3月8日，四支队在七里坪河滩上举行誓师大会，随后东进皖西抗日。倒水河是条不大的河流，却有着宽阔的河滩，如同七里坪人民博大的胸怀，孕育出一支又一支红军队伍。新四军四支队离开河滩前，四周革命群众赶来相送。那感人的场面，永远激励着战士们英勇杀敌。

自从董必武派学生回乡掀起声势浩大的大革命高潮时起，七里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奋斗不息。现存于镇上的23处革命遗址和四周的许多遗迹，就是一部用文物写成的七里坪革命斗争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1988年，七里坪革命旧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里坪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鄂东革命历史名镇。

□黄树生

禅宗古刹五祖寺

号称天下禅关的五祖寺，位于大别山尾间、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县，与江西的锦绣匡庐并头卓出，隔江遥峙，是举世闻名的禅宗古刹，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

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好天气，我有幸拜谒了这座千年宝刹。

出黄梅县城，北行十余公里，便到了五祖寺山下的一天门。这里有两条路通向山寺：一条是古老的青石板道，象天梯悬挂山崖；一条是盘山公路，如白云缭绕山间。

我们沿着青石板道拾级而上，直攀上半山腰上的飞虹桥，举目望去，山光水色，一片斑斓。远处，匡庐脚下，滚滚大江宛若游龙，身腰舒展；近处，层层山峦，状似奔马，拔地腾空。再沿石板栈道前行，五祖寺便出现在眼前。这里的景物依山傍岩，自然、清新、朴素、恬静。尤其是寺门前那两株阅尽人间沧桑的千年油朴古树，如同两把撑天大伞，把寺门前的场地遮蔽得严严实实，撒下一片绿荫。山风响处，枝叶轻摇，其声细碎，如絮语，似低吟，另有一番情趣。

来到五祖寺门前，只见大门上竖着一块匾额，上书“敕建真慧禅寺”，传为宋代真宗皇帝御书。现有当代佛界首领赵朴初加书“五祖寺”三个大字。

据《黄梅县志》及《五祖仙山盛境全图》记载，唐高宗武德年间，此寺香火最盛时有各种殿堂500余间，僧徒千人以上。每年国内远从云南、台湾，国外远从日本、印度等地前来进香拜佛和游览胜境

的人，数以万计，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五祖寺是因五祖禅师弘忍卓锡于此而得名。

拨开千尽古藤，穿过幽林仄径，沿着仰头落帽的“通天路”，爬上200余级的陡峭台阶，我瞻仰了矗立在“讲经台”前灌木丛中的五祖禅师塔。这是一座用色质优良的整块麻骨石雕凿而成的石塔，其形状如同一位高僧，披着麻布袈裟，端坐在蒲团之上。据说，这是禅宗弟子们为纪念五祖大满禅师开山的功绩所建造。

五祖禅师，俗姓周，名弘忍，湖北黄梅濯港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逝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关于他削发受戒，事师得法的传说，众口纷云，史亦不祥。一说他出身书香门弟，祖父辈皆谋官不得而赍于丘园。幼时便送他求佛；一说他寡母无依，少小向佛，7岁时为四祖禅师司马道信偶遇，惊其貌异，赐名弘忍，收其为徒。传说弘忍步入四祖寺山门时，寺内的钟磬竞不敲自鸣，很有点传奇色彩。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23年)，他承受四祖衣钵，具有很高的禅学造诣。他提出的“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的思想，充分发挥了历代禅学大师为之宣扬的空无说，被称为《最上乘论》。尤其是晚年时期，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预见才能，发现和培养了寺内的舂米役工慧能，并一反佛教惯例，以竞偈语选法嗣的独创之举，震惊中外佛界。这里有一桩有趣的佛门公案：

一天，五祖弘忍召集寺内僧徒，宣布要以考偈语的方法，竞选法嗣，命大家就习经的心得各书一偈。他的上座弟子神秀很是自负，信笔挥一偈于壁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见偈，虽是高兴，但觉得此偈仍有点以“指”为“月”，得“筌”忘“鱼”的味道，评之曰：“只到门前，还未入门。”时有舂米役工

慧能也评其偈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并大胆地口念一偈,请人亦题于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一见,甚是惊异。认为慧能的偈,确实把握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机要,显示出他已登堂入室,达到了一代宗师所具有的悟境。于是破例选慧能承嗣,授予衣钵,禀为六祖。

五祖弘忍不拘一格地选贤任能,为慧能和尚后来创立新的中国禅宗铺设了一条金光璀璨的道路。

站在五祖禅师塔前,追忆这个美丽神奇的故事,不禁使人无限遐思。舂米的役工刻苦自学,终成佛祖,五祖禅师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这些美德不是至今还被海内外炎黄子孙传颂吗?

离五祖禅师塔不远处,有一条石砌的石台,名曰“讲经台”。它前呈古寺,后依巉岩,高达数丈,陡峭如削。这便是当年五祖弘忍向寺内僧徒教授经义之处。台下是一片能容纳千余听众的草坪。置身其间,千年余音,似犹在耳。“讲经台”在左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崖,崖下有一天然石洞,传说是五祖弘忍当年传授衣钵给六祖慧能之处,人称“授法洞”。洞边,就是高达 200 多米的“舍身崖”了。崖上镌刻着“福得”二字。不知道多少善男信女在这儿舍身而去,是否因此而“福得”呢?只好让历史去述说了。“讲经台”右边,有一股山泉从白莲峰蜿蜒流下,淙淙作响,落入深涧。听泉观涧,顿觉古寺凭添一股清幽。那涧石上镌刻的“流响”二字,是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游览至此,触景生情,信手而书。回眸殿堂,曲径重门,花阴竹影,重重叠叠,连成一片,隐于苍松翠竹之中,浑然一体,呈现出一种神奇美妙的意境。

五祖寺的山石美,五祖寺的风物更美。

从“讲经台”再攀岩而上,约莫 2 里多路,便到达白莲峰顶。这

儿有一天然石池，就是有名的白莲池。不知哪里来的一泓清泉萦回池中，长流不断。相传，五祖弘忍漫步池边，触景动念，想在高山石池栽种莲藕，美化仙山，于是，他从山下移来一株藕种，亲手栽在池中。不料，日月辉映，山泉滋润，这株藕种竟在高山峰顶成活了。翌年夏天，池中绿叶如盖，浓香四溢，朵朵白莲争芳斗艳。这事惊动了乡侣邻里，前来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一些文人墨客也慕名来游，接踵而至。一时，高山如市，热闹非凡。于是“白莲诗社”、“东山诗社”应运而生。一位诗翁在《雪后步白莲峰》的诗里写道：“为访天台洞口香，青鞋踏近玉池旁。白莲幻作半溪雪，红叶斜通一径霜。鹤梦久随花影散，鸿泥谁寄客情长，老僧喜共三生话，不觉西风已夕阳。”足见，人们为访白莲真迹，不辞辛苦，面对幻作溪雪的白莲，耳听老僧侃侃而谈，真的连夕阳西下也不觉得了。据传，一些朝山拜佛的老翁妇孺，常取白莲的一叶一籽，带回去煎煮服用。有的声称头晕目眩、气弱血虚等疾一扫而去，有的甚至一些久治不愈的痼疾，也是药到病除。俱把白莲奉为灵丹妙药，传得神乎其神。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白莲也确有其独特的药用价值，不仅其籽具有正心、润气、滋脾、健肾的功能，就是其花、茎、叶、根，亦有舒筋活胳、去湿防风的作用。五祖弘忍栽种白莲之功，自当为人传颂。

眼前，婷婷玉立的白莲，婀娜多姿。可听人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五祖白莲曾经消声匿迹，空余一个杂草丛生的白莲地。1976年，此地建立电视差转台，人们在挖掘池中淤泥时，偶然发现了池里还有7颗如铜包铁裹的莲籽，捶开1颗查看，莲衣尚存，莲肉仍很新鲜。于是，人们把6颗莲籽小心种下，结果，第二年莲籽吐芽生叶，长出一株株挺秀的白莲来。从五祖弘忍植莲至7棵莲籽复得，时越千年，真是“生来有种情难断”了。

当今五祖寺监院见忍法师告诉我，在昌明长老的主持下，经过近几年的大力重建，原来几度惨遭兵燹而毁的大雄宝殿，又在原址

上耸立起来，一些年久失修的真身殿、祖师堂、毗卢殿、天王殿、观音堂、圣母殿及客堂、寮房也逐渐修葺一新，还新建了气势恢宏的山门，寺院已具丛林规模，重现了当年的盛况。同时，寺院还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至今仍保存了唐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柳宗元、张佑、裴度、欧阳修等吟物咏景的诗章和碑文真迹，保存了宋代真宗皇帝敕赐的“五祖宗印”和六祖慧能委身碓房、刻苦求禅的“坠腰石”……，殿阁亭台，交错有致；山石风物，相映成趣。一个历史悠久、闻名遐尔的五祖禅关，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上界弗知何处去，西天移向此间来。”

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裴度赞叹禅宗五祖古刹的诗句。身临其境，确有“此间”、“西天”之感。

□吴洪激

稀世国宝——蔡山晋梅

1983年3月31日，中国新闻社向国内外发布了一则题为“中国发现1600多年前的梅花“寿星”的消息。电文称：

武汉园林科学研究所工程师王其超，在湖北黄梅县蔡山发现一株距今1650年的“晋梅”。

本月初，“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协作组，对去年10月发现的这株“晋梅”进行了初步鉴定，一致认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寿的梅花。

已知的中国古梅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隋梅”、云南昆明市温泉唐溪寺的“元梅”等。这次发现的“晋梅”，较国清寺的“隋梅”还年长300多岁，实为稀世国宝。……

此新闻发布后，引起了国内外新闻单位、专家学者的关注。《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文摘报》、《科学与人》、《旅游》、《旅游天地》、《花卉》、《中国新闻》、《春秋》、泰国《中华日报》等10余种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或作相应报道。

黄梅蔡山，孤峰突起，位于县城西南部，挺拔在扬子江北岸冲击平原上的京九铁路线边。山上有座江心古寺（又名蔡山寺），晋唐时期，因蔡山屹立于古长江中心，江流从南北方向绕山东流，江心寺因此而得名。当年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游历庐山途中，曾泊舟于此，游览江心寺后，登上摘星楼，题下了脍炙人口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夜宿江心寺》五言绝句，

而使江心古寺驰名古今。在古寺东厢的坡坎上，有一株皮褐纹绉、苔藓密布、古朴苍老的梅树。它就是被称为稀世国宝的梅花“寿星”——蔡山晋梅。

蔡山晋梅，饱经风霜，安然依在。其树高近 8 米，扁圆形树冠，冠幅 7 米有余，全株朝北卧倾，枝条微垂。主干离地面 1.1 米处分二杈，分杈处围径 1.1 米。根部基本木质已蛀空透光，伤面约占心材的三分之一，但树皮基本完好，这是古梅赖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尽管古梅的主干在漫长的岁月中已部分被蛀蚀，分杈向南的大侧枝，仅存 80 多厘米长的残留断枝（当地群众说是被雷电所击）。但分杈向北是 70 度角倾斜的另一大侧枝，已成为这株古梅的主干。虽然下部皮破木腐，背面绿苔密布，显得干枯枝老。可是，在其顶端又长出 4 个斜上侧枝，组成了古梅的树冠。别看这大侧枝上瘦枝纵横，可它年年傲雪凌霜，每到“大寒”至“雨水”期间，便白花吐蕊，幽香四溢，铁骨洁面，素质冰心。颇有“知己一生惟有雪，香清冷艳自相亲”的神姿。

关于这株古梅的历史，民间有一个神话传说，是王母娘娘插在此地的一根拨火棍，生根发芽而成的。这当然不足为信。但先人留有不少文字资料可考证。据清光绪二年（1876 年）版《黄梅县志》载：“蔡山寺，在邑西南江畔，古名江心寺。山石镌李白《夜宿江心寺》诗句（笔者注：刻碑尚存）。今江南徙，寺名犹仍……有支遁手植梅一株，尚存，亦邑之名胜也。”清代杨自发的《江心寺》题壁诗，亦写了支遁植梅之事：“孤峰一角水之涯，灵鹫飞来立浅沙。浪打山唇潮欲上，天低楼角月初斜。谪仙（李白）泼墨还留石，支遁栽梅尚著花。却忆曹成谈往事，纪宫碑字绾尤蛇。”清代胡驾生在《蔡山寺》五律中，还说支遁卒于江心寺：“旧识江心寺，曹王驻此山。山朝匡岳北，寺隐竹林间。太白诗碑古，支公骨塔残。故来寻旧址，不畏朔风寒。”方志和文人诗词都记载了晋梅乃支遁所植。

据《高僧传·支遁传》载:支遁生于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闰四月四日。本姓吴,陈留人(今河南开封市南)。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出家为僧,先在吴(今江苏省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在剡山(今浙江省嵊县)沃州小岭寺主持讲学,门徒将近100余人。晚年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还在建业(今南京)讲过《道行般若经》。他在28年佛门生活中,勤于佛教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著作甚多。支遁酷爱山水,养马饲鹤。他主持的主要寺庙,都在江南。地处长江、鄱阳湖之间的庐山,林壑优美,泉瀑壮观,崖石奇特,花鸟珍异,云雾多姿,寺庙林立,引起了支遁的兴趣。蔡山与庐山只一江之隔,舟楫方便。在庐山看蔡山,如一颗宝珠嵌在江心,立蔡山望庐山,如一幅锦屏悬挂南天。支遁在游历庐山之后,行脚到此。

1982年10月和1983年2月,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工程师王其超、潘宜平,两次来蔡山对古梅进行了实地考察、鉴定。结果为:古梅在每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开花、结实;多单朵著生,花蕾扁圆形,乳白色,有深肉红晕,有或无中孔,顶圆或平截;着重瓣白花,外瓣浅红,花经2.4～2.8厘米;花态呈蝶形至浅碗形,不整齐内轮飞舞;花瓣3～4轮,25片(23～27),有时有一雄蕊变瓣;萼片5～6片,有时多1～3膜萼,绛紫色,紧贴花瓣,花梗短,雄蕊短于花瓣,雌蕊发达多3心皮(1～4);具有甜香味。1983年3月2日,王其超先生将考察结果和采摘的花枝标本,送北京林学院梅花专家陈俊愉教授鉴定,古梅属宫粉树的一个品种,并定名为"蔡山宫粉";随后,"中国梅花品种图志"协作组,对古梅进行了初步鉴定:一致认为古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寿的梅花。

蔡山晋梅历尽沧桑,枝繁叶茂,健康长寿,有它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和客观因素。蔡山孤峰屹立于长江冲击平原之上,红沙壤土质,多石砾、片岩。植于山麓坡地的晋梅,排水佳良,立地条件优越,

符合梅花生物学特征。外加晋梅为高僧支遁所值，且在江心古寺之中，佛的精神枷锁、寺庙的森严、梅树的神化等，人们不能、也不敢轻易动它，使晋梅受到保护，千百年来，傲立在万花丛中，沐浴着清风山月，展示了生命顽强。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蔡山晋梅是黄梅县报经省政府批准的 71 处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中的唯一古植物。县政府先后拨款，在晋梅的根基周围，砌起了高 50 米、内空 3.25 米的八方形砖台，在外围筑起了 2 米高的围墙，责成蔡山林场负责管理、保护。1964 年以来，蔡山林场的几位老职工破除迷信，先后对晋梅采取种子育苗、剪枝分插的办法，成功地繁育出晋梅的“子孙”。已在五祖林场、五祖寺、县博物馆等多处生根、开花。

自 1983 年 3 月黄梅县政协首届一次会议以来，县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提案，“要求加强保护、抢救晋梅”；省内外专家、学者也呼吁有关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重点保护晋梅。县人民政府在加强保护工作的同时，已把蔡山晋梅列入黄梅县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规划；1998 年年初，中共黄梅县委、黄梅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动员全社会力量，兴建“蔡山晋梅馆”，正在着手实施。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蔡山晋梅定会焕发青春，重放异彩，将会以新的英姿，笑迎八方来客。

□雷　靖

乌云朱迹　三楚奇观

从英山县城出发，向北沿公路行约十余里，向右望去，有一座突兀屹立的山峰，那就是乌云山。山上昔有“弥勒堂”遗址。明嘉靖乙酉年(1525 年)，道人元成、元俊结庐于其上，后改建为“乌云寺”。沿寺右山梁西南行 1 里许，有一小山，山之南面，石壁如削，石壁上有白色石纹，宛如妇人手抱婴儿倒挂状，俗称“倒挂仙人”，又名“倒挂仙人崖”。妇人臀部有红痕，亦如血迹。当地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有“梅圃”者题诗，以朱字楷书于腰部。

诗曰：“壁间仙影倒悬奇，手抱婴儿几度悲。

云鬓摧残添野棘，霞裳剥落积封泥。

血斑溅石千年恨，性烈惊猿五夜啼。

试问两人当日事，拚生岩下为阿谁？”

乾隆年间纂修的《英山县志》，将此处定为英山八景之一，名之曰“乌云朱迹”，又名“乌云朱字”。

它的奇特在于：历经雨雪风霜的侵蚀，白色的妇人手抱婴儿倒挂状不变；诗只用朱色书写，并未镌刻，而今初看并无字迹，用湿毛巾抹之，朱字乃显。有游览者，喟然叹曰：“真乃三楚奇观也！”自昔至今，文人墨客，游览此地，无不称奇，即兴赋诗者众。

笔者于 1976 年春，陪同中央文化部外事办主任等人游览“乌云朱迹”。他们都觉得此处风景宜人，景物奇特。当时，笔者即兴赋七律一首。

我陪诸友访名山，探奥寻奇着意看。
怪石嶙峋疑兽伏，春花烂漫有峰翻。
岩间银影千尤白，壁上朱文湿更丹。
“梅圃”诗章细吟咏，不知遗迹几多年？

从此，笔者留心查访，想弄清“乌云朱迹”产生的年代和诗人的真实姓名，多年未获结果。

1994 年春天，红山镇文化站马刚同志听说《郝氏宗谱》有载，我便托他代为借阅。在查阅《郝氏宗谱》(民国三十年纂修)第七卷中发现：朱字楷书诗作者，是“邑庠生(俗称秀才)郝秉之(名均，别号梅圃)，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三月，与诸名士及昆仲子侄十余人，延访胜景，至乌云山倒挂岩，见石壁间，倒挂仙影，若妇抱婴，石有红痕，亦如血迹。遂各赋七律一章，以朱书于壁。不数月，其他诗字迹俱毁，唯秉之(梅圃)诗迹尚存。不为霜雪所蠹，朱色如昨。”英邑传为佳话，视此为“仙迹”。

又据《郝氏宗谱》载：“秉之公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四月十九日”，“殁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四月十六日。”梅圃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写诗时，已是四十三岁了。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距今，已有 242 年，“乌云朱字”，仍能显见，真可谓“三楚奇观”了。

□陈凯文

1998 年 5 月

长江流域第一龙

1993年盛夏，黄梅县传出了轰动中外的考古发现重大新闻：大京九的合九支线建设工地黄梅县焦墩出土了6000年前的文化遗存——长江流域第一龙。

（一）

焦墩位于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北距黄梅县城14公里，向南11公里是京九、合九两线合轨的孔垅镇。墩西有105国道黄梅县城至小池路段，北面1公里处是渐趋低平的芭茅山尾丘，四周现有遗弃的古河道，是一块方圆800米的台地。1983年全国文物普查中，地县普查队依据群众介绍，在这里采集到丰富的西周鬲足鼎足之类古陶残片，定名为焦墩遗址，载入本县古文化遗址档案中。

1992年，焦墩划入合九路基红线上，省地又派专业人员两次来此作考古复查，又有新的发现。遂呈报县政府和铁路建设指挥部，被列为施工保护重点区。1993年6月，两线境内桥涵洞工程上马，民工先后进入各施工点，县博物馆业务副馆长聂习国闻讯火速赶到焦墩，非常适时地制止了民工开挖作业。县政府责成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出了对焦墩遗址桥涵工程《暂停施工通知书》，铁路建设指挥部立即下令该地施工队转场。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迅速制定了可行的抢救发掘方案，组建了有省地县三级考古专业人员参加

的联合考古发掘队伍，于6月16日进入焦墩。

联合考古队成员共14人。省考古所抽4人，随州市考古工作站3人，黄陂县盘龙城考古站2人，黄冈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詹道喜、业务干部洪刚，黄梅县博物馆副馆长聂习国、业务干部石琳、何建芬等。由省考古所富有考古发掘经验的中年女学者胡雅丽同志担任领队。黄梅县乡村各级组织对考古队给予全方位的支持配合。经过4天的准备和实地勘察，考古队选择了发掘点，第一期布置开挖55米的探方22个，补充探方4个，3×10米探沟一条。6月21日，考古队员按分工进入了各自负责的探方。焦墩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焦墩地质条件较好，大面积湖相沉积地层没有受到深度的破坏和扰乱，文化层(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杂质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根据所含遗物和压迭关系。可以确定遗址各层的文化内涵和相对年代)厚1.8米，地层堆积清晰。地表耕作层为第一层，在30厘米以下就开始有许多西周时期的鬲、瓮、甗、器盖的残片出现。一批有研究价值的文物得到了抢救。其中弥足珍贵的是西周时期的青瓷豆，其体积小而造型精致，被专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誉称“荆楚第一碗”。

月末，揭开了无人类活动痕迹的间歇期层，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层位。远一层位中又为依迭压关系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厚约5—20厘米，有红烧土建筑面，出土有罐、豆、鼎等陶片，属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龙山文化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古器时代晚期一类的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7月2日，发掘作业揭开到中层以下的黄土层间歇期，相当于大溪文化期(发现于四川巫山县大溪遗址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6000年左右)，此间遗物很少，且已溶成粉质。在第1257号探方里，省所宋有志在大溪文化层的下面发现了密集的鹅卵石

群。他当即绘制了图纸并作了汇报，但尚未视作大发现的线索。第二天，在另外3个探方的相同层位也发现了类似的卵石群，引起了胡雅丽领队的警觉，因为这些卵石群都摆在红烧土堆积的平面上，这是人类活动的痕迹。胡雅丽立即召集队员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的前兆。她指挥队员从卵石最密集的第1256号探方西部清场，小心翼翼向四周铲揭土层，渐次裸露的卵石群呈带状延展公布，待到四周再卵石出现的时候，一条用卵石拼摆而成的龙形图象呈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它头角尾足俱全，侧卧在红烧土台上。尾部下方还有一条卵石摆成的鱼。考古队当即向县、乡政府紧急汇报，对现场设置围栏由民兵严加守护；这一天是7月7日。

焦墩卵石摆塑巨龙全长7米，是在预先修整画好图形的红烧土台面上，用色彩各异、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摆拼而成。它侧面全身，头东尾西，鹿头、鱼尾、蛇身、兽爪。龙首高昂，颈到头顶高2.26米；躯干横陈，颈至尾根长4.46米。它扬角张口，腹下有足，背部有鳍。尾端上卷，鳞片层层。龙身有粗有细，卵石有密有稀，呈波浪游动状。宛如穿游于云水之中，似隐若现。其形态成熟，造型生动，气势宏大，动感极强。昂首振鳞，状若腾飞。在龙背上方，还有三堆卵石摆就的图案，与龙角斜成直线，东西方向排列，学者分析可能是模拟天空星座。对于龙头的形态和动势，学者各见仁智。亦有认为是凤头龙身，回首西望，顾盼星空。

此间，在四个补充探方和探沟里也发掘出土铜花、铜钩、原始瓷件及古陶残片等多种西周时期的遗存。

焦墩卵石摆型龙的资料迅速送到省城。7月10日，省考古所王红星所长带领省博物馆馆长、国家考古学家谭维四教授、王劲教授和省文化厅文物处考古专家孙启康处长一行兴致勃勃赶到焦墩论证监定。经过对现场周密的科学考察，确认这条巨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焦墩先民拼摆无误，并科学命名为“焦墩卵石摆

塑龙”，由于是长江流域上的首次发现，又称“长江流域第一龙”。谭维四教授激动地说：我们找了一生的龙，终于在焦墩找到了最满意的一条。”

7月19日，湖北省考古研究所、黄梅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谭维四教授正式宣布在黄梅焦墩出土了6000年前的卵石摆塑龙，它与辽河的玉雕龙、河南省的蚌砌龙同属于一个时代，但比较那两条龙形体更硕大，动感更强，气势更宏大，形象更成熟。还指出焦墩巨龙在考古科学研究上的深远重大的意义。7月20日，《湖北日报》在头版位置上首家报道了这一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世纪行》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据初步统计，期间国内外有200余家新闻传媒先后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报道或述评。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9月中旬，联合考古队重返焦墩，继续第二期的考古发掘。在新辟的探方内又继续于同一文化层次出土了卵石摆塑的龟、蛇等多种水生动物的物象群体。它们一个个造型生动、好似戏游于龙腹下面的水中；再向前，又见一条宽为1米多的长长的卵石铺成的横路。都是与卵石摆塑龙同时摆就的物象。这一些还只见于已发掘的路基将压的地带，学者推测附近相联地区下还会有其他摆塑物象遗存。隐藏着一个尚未揭开的华夏文明初创时的历史之秘。本期发掘工作由于秋雨连绵而停止，工期也有一个多月。10月中旬，为便于科学研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队将摆塑龙和其他摆塑物象标本揭离现场，运住省考古研究所收藏。

（二）

焦墩龙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成形最早的龙形个体造像。在

国内迄今也是最为远古的规模最大的龙形文化遗存。出土于内蒙古三星特拉的辽河玉雕龙，体长仅 24 厘米；河南濮阳西北坡的蚌壳摆砌龙，也只 1.5 米上下。焦墩的长江龙以其 7 米之长居于两龙之上。堪称“华夏第一龙”。

目击焦墩巨龙的古朴英姿，乍看不过是一列极为平凡的泥土和卵石经过人工劳动的粗犷的堆积。然而它对 6000 年后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仍然产生着影响。它为诸多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传递了许多信息。这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

卵石摆型龙昂首向东，方向准确，方位吉祥，又有模拟的星座，是焦墩先民了不起的成就，为研究原始天文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对方向、概念和方位内涵的认识和应用，是远古人类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世界考古发现可知，只有拉美的玛雅以及埃及、希腊等少数古代文明发达地区才有此成就。

焦墩以龙为主体形象的摆塑群体，体型硕大、比例协调、陈致有序、方位准确、布局宏大，是有目的、有统筹的集体劳动所成。推测这是一处原始聚落的宗教祭祀场地。“龙”的形成，龙图腾崇拜的产生，是与农业生产的出现密切相联。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不完全依赖采集和渔猎经济。原始农业、种养业和畜牧业等生产经济已是促使人类生存和定居的主要生活来源。从长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岭、薛家岗、良诸、马农浜诸多同期的新石器遗址出土有农作物遗存和本县塞墩遗址墓葬中猪下颚骨联系，黄梅地域也有发达的原始农耕、种养业，因此，天灾成为最大的恐怖和威胁。先民们认为“龙”是天灾的主宰，于是，就摹拟制造想象的龙形，祭祀膜拜，以求感应“真龙”息怒收灾，保佑人畜平安和农业丰收。这种对龙图腾崇拜，是原始宗教产生的因素之一。焦墩龙的产生自然也离不开这种信仰基础。为研究原始宗教的产生发展留下了可信证物。由此，还可以推测当时的焦墩处的地带，已经具有原始文明发达的基本因

素：有发达的原始农牧经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产生得很早；对龙的形态构想摹拟，实践已久且达到超前完备；有几位智慧很高的首领人物；生活着一支人口密集、规模可观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氏族公社大聚落。

焦墩龙成熟的复合和极富动感的外形，体现了焦墩先民对物象的观察想象和艺术表现手段已达到相应高超的水平。而用鹅卵石作为造形材料表现物象，是中国美术史与世界美术史上的首例发现。

焦墩龙的再现，又一次使中华民族和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成为毋庸置疑的科学结论。以往在长江流域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经科学鉴定断代与黄河仰韶文化同期乃至早于此限。而今焦墩巨龙又用绘画雕塑这又一种考古语言，记述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并存且已具有相当发达的高度的事实。在黄梅，古文化遗址有 64 处之多，反映了当时原始居住聚落广布的盛况。旧石器时代，可见到一万多年的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尤为丰富，仅相近器物对比可知，相邻流域同期各文化的诸类型，既受四邻文化的影响，又有本地区的特点。具有文化交汇地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长江中下游结合部位的原始文化代表地区，足以说明焦墩巨龙的产生决非偶然。因此，焦墩——黄梅——鄂东——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的发端处所，长江和黄河共同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托起了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东方巨人。

此外，焦墩龙出土于地表深处，深厚清晰的文化层堆积，记录了它潜隐的漫长历史过程，也向后人陈述黄梅地貌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大的自然变迁，为研究黄梅和周围地域原始地形、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提供了佐证。这是焦墩龙出土对黄梅本土历史回顾的贡献。

焦墩卵石摆塑龙内涵丰广、古秘尤深。谭维四教授的一段精辟

的谈话概括了焦墩巨龙出土的最伟大的意义:“焦墩巨龙工作定性,将向世界开放,而且一批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考古论述和研究成果,将把华夏文明向前推进一千年。”

□洪 志

(注:部分资料由聂习国、石璈、何建芬等同志提供)

田家镇的两次保卫战

田家镇，位于湖北省东部武穴市（原广济县）西侧的长江北岸，这里江面狭窄，地形险要，它同南岸的半壁山隔江雄峙，以山锁江，成为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塞。同时，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是上游武汉三镇的门户，又是下游安庆、南京等城市的天然屏障。在战争频仍、局势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田家镇先后发生了两次重大的保卫战：一次是1854年太平军抵御清军的保卫战，另一次是1938年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保卫战。两次保卫战，前一次是太平军为保卫九江、安庆，抗击从长江上游方向的来犯之敌；后一次是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抗击从长江下游西进的日军。两次保卫战的作战方向不同，但都围绕争夺田家镇要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两次保卫战均以失利告终，但中国人民为反抗内部压迫和外来侵略而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却在史册上永放光辉。

1850年1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后，即从广西出发经湖南开始了胜利进军。太平军经过大小几百次战斗，于1853年1月攻占武昌，然后从武昌顺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于是年3月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在此建都。为了巩固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扩大战果，太平军开展了北伐和西征。当时的西征是为了攻打两湖，西袭巴蜀，并夺取安徽、江西两省的广大腹地。西征军开始一路顺利，1853年6月10日占领安庆，9月29日占领九江，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汉阳、汉口，1854年5月18日攻克宜昌，湖

北军事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就在这时，清政府命曾国藩率湘军进入湖北剿“贼”。经过反复较量，由于指挥失误等原因，太平军在几次战斗中失利，10 月 14 日，湘军攻陷武汉，太平军东退。为了保卫长江中游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江、安庆等城市，太平军决定在田家镇设防，阻止湘军东进。

湘军攻陷武汉后，分三路东下，进攻田家镇。长江南岸，由塔齐布率湘军陆军进攻大冶、兴国等处；北岸由湖广总督杨霈率湖北兵进攻蕲州、广济等处，曾国藩则亲率湘军水师顺江东下。太平军方面，陈玉成会同前来支援的殿左叁拾壹检点曾凤传驻守蕲州，燕王秦日纲率主力驻守田家镇。

田家镇的保卫战是在东王杨秀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指示秦日纲：“筑起坚固营盘，并筑起木簰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今本军师在朝造有上水木簰一座，特差本府承宣涂镇兴押解前来。俟木簰到日，仰弟等安足军装炮焼，踏看河道何处可以挽泊，赶紧挽好，并仰弟会同本府承宣依式正造多座，安好炮位，以诛妖魔。”太平军还“于田家镇江面横安铁锁二道，相距约数十丈，铁锁之下，排列小划数十只，以枪炮掩护之。”据曾国藩记载：“(太平军)安置铁锁之法，与吴人成法不同。吴人于两岸凿石穿铁，江中无物承之，故一处熔断，全锁皆沉。(太平军)则节节小船承之，中用木簰三架承之。船与簰之头尾，皆用大锚钩于江底。铁钩四道横于船簰之上，以铁码钤之，故虽南岸砍断一节，而其余数十节，仍牢系如故。”

此外，长江北岸筑土城，多安炮位，南岸之半壁山、富池口均有重兵驻守。

田家镇防设严密，太平军充分发挥了革命智慧。然而杨秀清指导这场战斗的战略思想却是消极防御，这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

11 月 23 日，秦日纲与湘军罗泽南、李续宾大战于半壁山，初

胜终败。适韦俊、石镇仑、韦以德自天京驰援田家镇，24日自田家镇三路渡江进攻，大战竟日，俱败，石镇仑、韦以德阵亡，半壁山失陷。12月2日，湘军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以“烘炉大斧，且熔且椎”，砍断半壁山拦江铁锁，敌船突破防线，冲至下游武穴地方，乘东南风纵火烧毁太平军战船，太平军水师遭受重大损失。湘军陆师塔齐布，罗泽南在南岸助攻，追至富池口。12月3日，秦日纲、韦俊被迫自焚田家镇营盘东退，湘军进犯九江。

田家镇的防御战失败了，但是太平军却给敌人以极其沉重的杀伤。湘军的一个头目朱洪章回忆当时战斗情况说：“曾军伤亡亦不少，水师尤多。国藩谓行军以来，丧师亦无如此之惨者，言毕放声大哭。”（朱洪章：《从戎记略》）

湘军虽然攻陷了田家镇，但在进犯九江时，并没有得到便宜。太平军在石达开、陈玉成的指挥下，改变策略，开展反击，打了一系列胜仗。尤其是湖口一战，太平军乘月黑迷漫，大军攒入敌船队之中，“火弹喷筒百枚齐发”。曾国藩的座船被围，管驾官、监印官都被击毙。敌军辎重尽失，不复成军，曾国藩“仅以身免”，乘小船偷偷地逃到塔齐布的陆师营盘。湘军水师仅余百余破船，败退到武汉修补，九江江面敌水师被肃清，太平军乘胜西进，1855年4月3日第三次克复武昌。

从田家镇第一次保卫战之后，历史经过了80多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从华北和华东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失陷，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日军原计划沿陇海路西进夺取郑州进攻武汉的战略计划，由于黄河花园口大堤被炸溃而受到洪水的阻

滞，日军统帅部遂调整作战计划，采取沿长江航道及其两岸和从大别山北麓分数路围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保卫武汉，6月中旬成立第九战区，负责防守长江沿岸要塞和鄱阳湖以西长江南岸附近战略要地。从6月12日至7月5日，日军先后攻占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沿江要塞；7月底，日军占领九江，8月初，宿松、黄梅又相继失守。在上列沿江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全部失陷后，田家镇就成了武汉东部长江沿岸唯一可守的门户。于是，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在田家镇设防，抗击从长江下游西进的日本侵略军。中国近现代史上田家镇的第二次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担负田家镇要塞守备任务的是第二军第九师和第五十七师，和原在田家镇要塞的炮兵部队，以及驻守在田家镇西北面的第六十七军第一六一师，但该师在要塞保卫战开始后不久就被调走了。担任田家镇要塞守备任务的总指挥官是第十一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他原是第二军军长，上列部队归他直接指挥。此外，防守九江的李玉堂第八军和防守富池口南岸的霍揆彰第五十四军，名义上也归李延年指挥。1938年8月底，李玉堂部弃守九江，日军在九江附近集结约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附一个炮兵联队的兵力，作进攻田家镇要塞的准备。9月6日，田家镇要塞北面的广济县城梅川失陷。9月中旬，日军在完成攻击准备后，由于李玉堂、霍揆彰两部未起到牵制敌人、策应田家镇作战的作用，致使日军倾全力溯江而上，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驻守田家镇的第九师和第五十七师阵地正面发动猛烈进攻。与此同时，敌军主力则绕至北面，对要塞守备部队实行奇袭。中国军队抱着与要塞共存亡的决心，英勇顽强地同日军展开激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阵地上终日硝烟弥漫，天空中刺耳的飞机啸叫声，同地面上的枪炮声和战士们与日军搏斗的撕杀声连成一片，真是惊天地，动鬼神。中国军队凭借既设阵地，在炮兵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阵地多次

失而复得。中国官兵奋不顾身，与敌血战，许多负轻伤后的官兵，裹伤后继续坚持战斗。在战斗中，击落敌机一架。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大量杀伤敌人，沉重地挫伤了日军妄图速战速决的凶焰。

要塞守备部队在激战十几天后，外围阵地陆续被日军攻占。日军以一部绕道蕲州，企图迂回包围田家镇要塞。李延年军团长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全军覆没的危险，遂主动撤出田家镇。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日军沿长江两岸急速向西推进，到10月中旬，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形成了对武汉的包围，武汉已无险可守，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

田家镇本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普通城镇，由于这两次保卫战，使它得以载入中国近代史册。1949年5月，鄂东全境解放。田家镇一洗近百年内忧外患的屈辱，从战争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田家镇面貌已大为改观，镇上兴建了鄂东最大的水泥厂，成为鄂东地区重要的建材工业基地。今天，在长江沿岸经济带的开发热潮中，田家镇正以新的姿态向前迈进。

□程　仪

蕲黄四十八寨丛谈

明清之季，蕲黄（原蕲州、黄州地）山寨林立。大小山寨凡三百余座。其中最有名者四十八。主要分布罗田、黄冈、麻城、黄梅四县。

罗田有天堂寨、石柱山寨、鹤皋寨、乌云寨、黄狮寨、仙女岩寨、周家山寨、韭菜岩寨、扬旗寨、古羊寨、薄金寨、富主寨（亦名“富猪寨”）、大垴寨、云峰寨、大龙寨、白马寨、尖峰寨、李蟒岩寨、观音山寨、独龙井寨；

黄冈有金盆寨、响水潭寨、白云山寨、何家山寨、天马山寨、淋山河寨、桃花洞寨、寨云垴寨、大崎山寨、小崎山寨、马家潭寨；

麻城有东山寨、石子寨（亦名什子寨）、云雾山寨、塔子山寨、东义洲寨、朱山寨；

黄梅有鼓角寨、挪步园寨、卓壁寨、红花寨；

其他有黄安天台山寨、大胜堡寨，蕲水三角山寨、斗方山寨、石门山寨，蕲州有大桴山寨，广济有四望山寨（英山三角尖寨、望江山寨不在其列）。

以上不少山寨寨址、寨城、寨门尚存，多半风光秀丽，既有历史陈迹，又旅游佳绝，颇具开发价值。

一、山寨的前奏

山寨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民风状况、历史条件（即天时、地

利、人和“三才”并立)下形成的。

大别山南山势崇隆,蜿蜒伸展;山形奥折,起伏无端;层峦腹涧,秀谷相迭;林木蓊翳,物产丰阜。此为地利。

宋元明季,这里每为政治风云旋转之区及民族、阶级、社会矛盾纠角之地。郡民久经战争风暴的考验,养成沉毅果决,勇敢顽强的精魄,富有奋力抗争的传统,危难之时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是故,罗田著名方志学家有言:“蕲黄一战地,而六朝南北宋迁移尤甚。以故,其民质沐战斗之余风,富于虓悍之魄力与战争毅力。每大乱出,辄倡联合,策与进取,策以乘时。会元季进取,其争锋南逮于江介,明季进取,其争锋北直于淮壖。皆因地因时收召其英俊。由今观之范势于江介者,利用羽党初成其气势,几乎宰割东南之大半,何其雄也。①”此为天时、人和。

蕲黄民众凭藉地利天险,结寨召民,抗暴自保之义举,起于南宋度宗咸淳之初(1266年)。时,罗田三吴乡人(今属英山县)段朝立结寨于英山尖,召集乡民,抗击进犯蕲黄的蒙古阿术军。宋度宗嘉之。次年,段朝立请割罗田直河乡、三吴乡以建英山县,并为首任知事。十二年后建城,划属六安州。

至元十四年(1277年),蕲州人张德兴、罗田人傅高不满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分别以蕲州、太湖联界的司空山,罗田的天堂寨为据地,联合淮西六寨义兵大举反元。宋端宗右丞相文天祥对张、傅极为重视,及遣程纶、程炅来蕲州助之。旋即宋端宗授德兴为淮西安抚使,并授傅高、刘源为招抚使。蕲州、黄州、兴国(今阳新)、寿昌(今鄂州)民众起兵响应。连克蕲州、黄州、寿昌、阳逻。转战数月,及是年秋,元朝湖广宣慰使遣兵来攻。张德兴战死于司空山寨,傅败于天堂寨。蕲、黄、英、霍、六安、太湖义士家属万人受拘。民不畏死,何其壮烈!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罗田多云乡人徐寿辉、麻城西乡(今

属红安)邹普胜联合袁州(今江西宜春)彭莹玉在天堂寨以红巾为号,起义反元。同年十月攻占蕲水并黄州路。旋在蕲水清泉寺拥徐寿辉为帝,并以彭莹玉为军师,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大将军,国号"天完",建莲台省,设六部。翌年分兵攻占鄂、川、湘、江、浙、皖等省,一时拥众百万,战将百员,沉重打击了元朝,撼动元廷统治。后因起义军内部接连发生火并,徐寿辉被陈友谅谋杀。朱元璋又战败陈友谅,天完国告终。此为本区唯一建立政权的山寨义举,影响最大,也最深远。

明朝末年,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朝廷内部矛盾纠角最为尖锐复杂的时期。蕲黄各种势力都借乱世登台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起义军攻入黄陂、黄安、麻城,后下蕲水、黄州、广济。次年罗汝才率义军,攻下英山、罗田。接着,张献忠率部于黄安、麻城。旋与明朝副总兵马人龙战于麻城阴山畈,明军大败。明朝退任官吏、甘肃巡抚梅之焕召众结寨自保。此为明季蕲黄结寨之始。

尔后10年间,张献忠"革、左五营"三出蕲黄,攻占蕲、黄各县。崇祯十六年(1643年),麻城"里仁会"首汤志举起义旗,率军数万迎投张献忠。张改麻城为长顺州,命麻城人周文江领州事,汤志为游击。并占蕲黄二州及武昌,置巡抚、知州、总督等官守之。张在北称西五。其时,明朝退任宰相、蕲水人姚明恭在巴河结水寨与义军抗争。皆各凭险阻,"垒石砌城,按户籍而任版筑役,集避地氓庶丁壮而守之……蕲州固荆王藩封地,有故王朱蕴僸者为武昌楚王之裔。不知何时领寨王职。大抵始事之豪士假以号令群寨之故。②"

为此目的所建的山寨得到明廷及其遗老的支持。崇祯十年(1637年),朝廷"擢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湖、池州四府及河南光山、固始,湖广、蕲州、罗田、广济、黄梅、江西德

化、湖口诸县，捉督军务。③"史可法联络诸寨抵御义军。同时，湖北巡抚宋一鹤曾躬莅蕲州、罗田，资山寨以火炮、军械，委任各地缙绅儒流为寨主。至清军南下，南明小朝廷发生内乱之时，蕲黄山寨闹得更为火热。

二、山寨的鼎盛

顺治二年(1645年)，清英王阿济格追李自成农民军至九江，乘势占领蕲、黄，先在黄州黄冈、蕲州蕲水、广济、黄梅设官建制。尔后再将黄州黄安、麻城、罗田、安徽英山纳入版图。

初建的清朝八旗贵族趾高气扬，政治上抬满压汉，强迫汉崇满人，汉从满俗，汉改旗服，并行"留发不留头"的铁血政策，曾颁行诏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必治重罪。"时，广济农民胡俊因在病中未曾剃发，被察觉，"立正典型"。所在地保及邻里皆受鞭笞。广济县令以"失察"罪受罚。如此严重伤害汉民，激起众怒，不久遂群起结寨连营，训练义壮，据险抗争。

顺治二年冬，黄冈白云寨兵不肯剃头，公然藐视新制。寨长易道三号召小崎山寨长王光淑等联合英尖寨众"阻逋粮饷，抗违剃令"，勇举义旗，对抗清廷。

清廷派黄州总兵徐勇统军镇压。十一月十五日猛攻白云寨。小崎山寨王光淑"召各寨义兵数万"解白云寨之围。因各路援兵未能如期赶到，虽激战经日，终致不敌。易道三为保护寨中老弱出降。王光淑迎击两路清兵被俘。白云寨遂破。未几，黄冈泉华山寨陈於藻杀死差官李宗成等人。与此同时，樊山王朱常炎起兵蕲水斗方山寨，旋居太湖司空山。随之斗方山寨长周从助举兵反清，明英山知县刘时叙及副将陈福率兵四百人支援斗方山。周从助联络麻城东山等约于十二月十二日先取蕲州、蕲水、再取黄州。由于清军收买

陈福，计划被泄。敌里应外合，攻破斗方山。周从助、刘时叙被俘。

翌年五月，麻城周文江与黄安耿应衢相与联络，传檄约兵，号召反清。各地寨兵纷纷响应。五月十五日围攻黄安，六月四月攻麻城。黄州总兵徐勇派副将唐国臣坚守黄州城，自率兵往麻城塔子山围剿义军，周文江被俘，耿应衢得逃。然在此时，黄冈陈於藻率寨兵攻黄州。清军千总田龙见、把总邓克刚起义反正。

耿应衢逃至黄安天台山寨准备再战。清之把总祖可法会同徐勇率兵七千余人开赴黄安，一剿一抚，于是黄安邹墩、大佛等众寨剃发归顺。而姚公等寨坚持斗争，临死不屈。至秋月，义军弹尽粮绝，突围与清兵血战致败。清军降服诸寨后合兵围攻天台山寨。耿应衢再往光山，屯扎红石岩又坚持一段时间。

顺治三年(1646 年)十二月，明永历小政权在广东肇庆建立。蕲黄山寨复振。何腾蛟等抗清武装在洞庭、鄱阳大举反攻，节节胜利。江西金声桓在南昌倒戈反清，黄安王晋功聚众十万响应，麻城周承谟联合英霍之众与清兵决战。

同年，南明弘光小朝廷官宦专权，大吏拥兵自重。大军阀左良玉以诛马士英、阮大铖为名，统军数十万自武昌顺江东下。沿途烧杀奸虏，屠毒生员。300 余里黄广大堤被铁骑踏成坑堑，城镇村庄尽成赤土。黄梅下乡百姓避入太白湖中，上乡民众奋起结寨堡以图生存。一时山寨三百余座并起。

这时建起的名寨有：

黄冈白云山寨王光淑、杨继善，小崎山寨易道三、易名甫，响水潭寨马士英，大崎山寨王之经，马鞍山寨戴瑾，桃花洞寨樊维章；麻城云雾山寨鲁元孙，梅侯山寨周楪，塔子山寨周文江，拜郊堡寨胡公围；黄安大胜堡寨程继善，磨盘山寨吴载瑜，大峰寨江中清，风水山寨吴国宇，天台山寨耿应衢；蕲水斗方山寨周从助，三角山寨秦自辉，石门山寨何彬然；蕲州策山寨张相，飞旗塞朱统琦，大桴山寨

张旦熙，黑石寨梁重其；广济四望山寨张光环，燕子岩寨胡笃生，万宏寨陆嗣先，羊头岔寨胡之罴，武山寨吴士荣、吴凯；黄梅垅头寨阮思槐，舒城山寨黄景松、胡君孚，峨峰寨胡之郁，独山寨李大来；罗田李蟒岩寨雷正显，云峰山寨胡海若，大罗山寨叶常学，仙女岩寨萧熹高，独龙井寨江万琮，高明山寨郭良甲等等。

以上寨城完整坚固，储粮亦丰，寨兵逾千，有的家小亦在其中。各寨互通音息，相与照应。并推举文武双全之士为其统领。

恰于此时，罗田举人河南洧川知县王燫解组还乡，发奋精治山寨，奋力抗清。他与原罗田知县白乃忠，聚集乡兵，联合本县的山寨二十余座共举进取。王燫父子自治的天堂寨初为罗田诸寨之首，后联蕲黄三百余寨，乃被诸寨推拥为四十八名寨总寨主。

亦于此时，麻城进士周挹、曹胤昌（曾为明朝御史）结寨县西之朱山。拥精兵千人，马数十匹，战斗力颇强。同邑李有实结东山寨与之相应。周挹、曹胤昌被推为四十八寨总寨副。

四十八寨阵容甚壮，各有山兵成千上万。南明赖以抵御清军南进，帮助它恢复江淮失地。特于顺治六年（1649年）令石城王朱统琦委派英山尖寨长张福寰联络四十八寨。寨中文职王燫、周挹、曹胤昌，武职李有实、陈於藻会各路寨主胡玉良、常近楼、刘奉宇、陈元、萧新宇等往谒石城王。石城王表奏明帝，授王燫为兵部尚书，总督凤阳义军，以图谋皖。同进周挹为兵部尚书，曹胤昌、沈会霖为佥都御史，督白云等义旅以图谋鄂。其他皆授官职。

周挹率领新部义兵与宁国陈胡子、桐城范大、范二之鸟枪队突击江淮间。

王燫统率万余人“破庐州，不守，转战蕲黄、英霍间，屡有战获”。他会同霍山寨主侯应龙攻取霍县城，未果。转取英山县城。杀死英山知县史良植。后分兵两路，侯应龙的皖兵退出霍山，进取潜山、舒城。王燫挥兵江南、江西。周挹之从子周羽仪之参将沈某率

六千义兵攻商城。这是蕲黄四十八寨义兵离开本寨向外进击的大好时期。

但是，清廷调集豫、鄂、皖、赣人马，采取各个击破战略对蕲黄及周边山寨进行围剿。许多山寨被踏平，有的山寨虽固守多时终因兵、粮不济而遭屠毒。然农民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则万古流传。罗田平湖鼓羊寨兵在被围之日，将羊悬系寨城之上。羊头上方置草料，脚下置鼓。当羊饥饿之时引颈食草，四蹄踏鼓，昼夜发出咚咚之声，使敌迟迟不敢近。后人以此名寨。同样，罗田七道河的富主寨本名“富猪寨”。是寨受困日久，粮食将绝，寨中厨子得糯米一斗蒸熟尽喂肥猪。然后将猪逐出寨城外，故意让敌人获得。敌得猪屠宰见其腹内皆为糯米，疑寨上粮食充足，知难而退。如此事例不少。

兵寨与强大的清军对抗经年，农事荒废，生计艰难，王燝为解此困境，领兵向外突击。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他安置次子光干于英山，自率旧旅连战潜山、太湖间。兵败被俘至江陵(今南京)，不屈遭难。自是蕲黄三百余寨相继瓦解，四十八寨皆败。斗争波澜暂时平息。

三、山寨的余兴

然则蕲黄山寨的火种并未熄灭，一遇风吹立即复燃。顺治十年(1653年)，黄冈李有实领寨兵攻黄州府，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起兵进攻苏、皖。蕲黄、汉沔诸寨云合响应。旋因郑、张皆败，山寨未能形成气候。

康熙十三年(1674年)，蕲黄山寨再起波澜。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云南吴三桂反清自立，河南人(亦说大冶人)黄金龙潜入黄州鼓动山寨呼应。三藩事件后，黄金龙与麻城刘启祯、刘青藜联络河南谭以从、周铁爪，江西杨寡妇及黄冈、黄安、大冶、英山、六安、

商城的义士，自立将军、元帅，拥众数万，约于七月举起义旗。后提前到五月在麻城东山曹家河啸起。清军聚其精锐前往镇压，几次被义军击退。清廷大为震恐，湖广巡抚张朝珍急调武昌知府于成龙领兵进剿。于成龙一面收买寨兵的变节者刘启祯作为内应，一面微服探寨，竟然控制了山寨指挥中心。黄金龙被迫逃往罗田纸棚河继续坚持斗争。七月，黄冈李集奴仆起义，其领袖方公孝率众至歧亭寨坚守。他会三路寨兵同清军展开激战，不敌，遇害。歧亭寨长邹君开星夜退至罗田项家庙与黄金龙合。八月，黄金龙等在转移时落入清军圈套全都遇害。

十月，江西反清义兵进攻湖口与兴国，蕲黄四十八寨复起响应，陈鼎业在黄冈阳逻、何士荣在黄冈永宁乡，周铁爪、鲍世荣在蕲州白水畈起义。他们相约合攻黄州，并取武昌、汉阳。冬月，何士荣攻占黄土坳。十二月，于成龙遣将并召乡勇反扑。义军退守保山、牧马寨。旬日，何士荣率数万人自牧马寨分为两路御敌，击退清将吴之兰。不意义兵的帅旗被清兵射倒，义军慌乱。何士荣右臂砍断，陷入泥滩，被俘。寨兵大挫，其势遂衰。

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即清朝的鼎盛时期，蕲黄四十八寨的旗座——天堂寨又发生马朝柱领导下的农民义举。

马朝柱为蕲州张塘人，全家租得罗田白庙河江家畈江氏在天堂寨的一片土地。他以垦荒烧炭为掩护，酝酿起义。天堂白云庵和尚正修假托马朝柱为“天命神授”，“二十岁即得天书宝剑”，并传“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又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统兵三万七千为辅。朝柱改名太朝，系其军师”⑤。据此，正修商于朝柱，以烧炭为掩护，广招四方义士，即制书札，散发告示。正修写出讨清檄文和《囤粮》、《敬神》元文，拟定“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的起义由头。

朝柱命其兄长、友人朝仕、朝贵与刘廷佐等在罗田僧塔寺、英

山大坳沟、茅草畈、石头嘴、过路滩、五显庙等地开店招人，皆以“辫外圈蓄披发”为记。经过数年准备，联络甚众。湖广、安徽太湖、桐城、亳州、河南开封、四川峨眉西洋寨等地皆有党人。他们还“倡布谶应，煽取资金，群相结约，编名策籍，储备军火以待。”⑥

乾隆十七年正月，马朝柱分派铁匠王廷赐、徐文略赶造兵械，孙舜购买硝磺，不意走漏消息。三月二十四日，蕲州知州李泌赶赴张塝王廷赐家查得刀片、白布等物，起义计划暴露。

马朝柱仓促中刻制“太朝军令”散发四方，于四月三日先率数百人在天堂寨顶宣布起义。

清廷对此大为震惊，诏令湖广总督永常率军赶驻罗田跨马墩，两江总督尹继善率部驻扎英山金家铺，堵塞起义军的退路。两面夹攻，先将马朝柱之母亲、妻子及僧正修、罗田知县胡济修等一百余人逮捕，就地处死。马朝柱逃匿，起义告终。

延续百年的蕲黄四十八寨义举至此沉寂。唯农民的反抗精神永存。

□余彦文

注：①②④⑥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 ③《明史史可法传》
⑤清《高宗实录》

“雷池在黄梅龙感湖”的考证

小时在乡村经馆读《纲鉴》，至东晋温峤任江州刺史，驻兵寻阳，闻历阳太守苏峻反，欲起兵下卫京师，宰相庾亮不同意，回报温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毋过雷池一步也。”从此，弄通了“不越雷池一步”这个成语典故的来源。后来查阅《辞源》《辞海》注释：“大雷水流经安徽望江，积而为池，故曰雷池。”这一辞条引据于北宋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对雷池的解释，此后一些权威性的辞书，都引此为据，广为流传。书上有根有据，历来都相信而不疑。

1980 年，我有机会参加编辑《黄梅县志》，后来又主编《黄梅县地名志》一书，工作的需要，有关涉及黄梅的历史地理上的事件和典故来源，都将引起我们注意追索和考证，因为只有充分进行考证，才能解决历史地理上存在的争议，才能澄清存在的谬误问题。

我们曾把重点放在黄梅历史地理沿革的考证上。《禹贡》分中国为九州，黄梅境地属扬州之域。春秋初期属楚。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攻破楚国，黄梅境地遂为吴之西境。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灭吴，占有吴地。战国时，公元前 306 年，越为楚所灭，仍属楚地，故黄梅县境在春秋战国时，为《禹贡》荆、扬两州交界处。后称“吴头楚尾”，即本此。汉初，黄梅境地属淮南国，西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以郡、国、县建制，开始在黄梅置寻阳县，此为黄梅建县之始。当时属扬州刺史部庐江郡。考《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属扬州，县十二。”寻阳为十二县之一。又载：“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

大江。”《辞海》注:“这是说,九江在汉寻阳境内,即今湖北广济黄梅一带。”《湖北通志》“汉置寻阳县,即今黄梅,属庐江郡。”《辞源》《辞海》注:“寻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黄梅县西南。”即今黄梅蔡山一带。到东晋初,由于五胡乱晋,中原乱离,逼得东晋王室在洛阳站不住脚,晋元帝司马睿不得不迁京师于江南。那时候,藩王争权,多谋逆乱。《晋书》载:“时历阳太守苏峻,藏逆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将军陶侃,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夏为虞,故使温峤为上流形援。”按当时东晋南迁后的军事部署,宰相庾亮受命诏辅幼主,坐镇京师(驻建业即今南京),征西将军陶侃,镇守武昌,以防西夏,平南将军温峤驻兵寻阳,既可策卫京师,又可声援陶侃。当时,寻阳在江北,地理形势是控扼荆扬军事咽喉之地。所以庾亮十分重视温峤的军事行动而要他“不越雷池一步”。

明乎这段历史,却给我们提出地理上一个大疑问:雷池究竟在哪里?如果按《太平寰宇记》说雷池在望江,望江距寻阳一百余里,从军事行动和地理常识讲,这显然是不通的。以当时“博学高名”的宰相庾亮不会不知道,而他却写进《报温峤书》一道十万火急的军事命令里。很显然,说雷池在望江,是不符合东晋当时历史事实的,因而可以断言雷池在望江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错误的。

对于这一历史地理上的疑问,已是我们搞黄梅地名工作的人非澄清不可的问题。这里,要感谢我的两位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一个是黄石远,他为我搜集历届县志的有关资料;一个是黄鹤年,他当时在武汉大学参加编纂《中华大字典》,他为此在武大图书馆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图书上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的考证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佐证。如:

《水经》载:“雷水从东陵西南注之。”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过九江至东陵,西南流水积为湖、湖西有青林山。故谓之青林湖。湖水西流,谓之青林水。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过大

雷。一水西流，注入江。”

《弘治黄州府志》“广济有青林山、青林湖。”

《黄梅县志》载：“盖东通大雷之水，经梅壤之太白湖，汇为巨浸，弥漫涝洚。因其所也。”

这就是说，大雷池的水源，经（广济）青林湖，过寻阳，东流注入大雷，汇为巨浸、成为“弥漫涝洚”的雷池大湖，这个大湖，就是后来的黄梅太白湖、感湖、源湖和宿松的大龙湖、泊湖等。它西接太白湖，东止华阳河，纵贯一百余里的水域，恰恰是紧靠古寻阳的东面，这就是古大雷池。庾亮要温峤不越雷池一步，是非常准确地使用地理上的雷池位置，要温峤“不越一步”，形象地下达这一“驻守原防”的命令，成为千古限制行动的成语，广为流传。

我们这个结论，不久从中国地图学社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找到可靠的依据。该地图集明确标明：大雷池，亦名大雷水。在古代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江南的鄱阳湖和江北的大雷水，原是连通一片汪洋大泽，统名“彭蠡泽”大湖。西晋以后彭蠡泽南移、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的大湖叫彭蠡泽（今鄱阳湖），长江以北的大湖叫大雷池。唐宋以后，大雷池的总称，逐渐为各地区域具体湖名所代替，以后便不再叫雷池了。即在黄梅区域的大湖叫太白湖、感湖、源湖、涉湖等，在宿松区域的大湖叫大龙湖、官湖、泊湖等。1954年中央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规划华阳河流域蓄洪垦殖，于1955年正式将宿松的龙湖和黄梅的感湖，合并定名为龙感湖。从此，龙感湖农场在龙感湖南滨狭长地带（长24公里），开垦耕地，使龙感湖水域面积大为缩小。至此我们的结论：古大雷池即今之龙感湖，不仅符合江湖变迁史，更符合庾亮不越雷池的历史事实。

1983年，我把以上见解，从历史事实和地理变迁史来考证，雷池不在望江而在今之龙感湖，写成一篇《雷池考正》一文，首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天佑，我请他从历

史的角度评判此文的得失，他不久回信说已把这篇文章转给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魏嵩山教授，他在这方面是权威。很快，魏嵩山教授来信给我肯定："文中结论古雷池，即今之龙感湖，完全正确，从历史事实作论据，充分有力。"谢天佑教授还建议我将此文转寄《辞源》《辞海》编辑部，以便该书再版时作更正参考。以后我写的《雷池在哪里？》一文，陆续发表于湖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湖北方志通讯》和北京中国地名委员会所编《地名工作通讯》，后来湖北、黄冈等报，也作了专论发表。1986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由魏嵩山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对"雷池"辞条的解释，已正式结论：雷池不在望江而在长江北岸黄梅、宿松共有的龙感湖。结论传开，龙感湖农场到处出现雷池商店、雷池旅社。雷池诗社主编的《雷池诗词》陆续出版，总场所拍摄的纪录片，也以《雷池人的脚步》命名。至此，一千多年来，雷池在望江的错误说法，长期被歪曲、谬种流传，已开始还历史本来面目，得到正名。

□李华白

蕲春达城毛家嘴西周古遗址掘考

江河系人类摇篮。早在1万年前至4千年前，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蕲地先民，活跃在长江之滨和蕲河及其支流两岸，留下了不少可资考证的磨制石器文化、夹沙红陶文化和青铜器文化的遗址、遗迹。位于今湖北省蕲春县城西北30公里的著名风景区三角山和达城乡（宋代为达城镇）西向1公里处的达城河畔之间的毛家嘴，就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代表之一，史称“毛家嘴文化”。它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对于研究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古文化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1958年9月，蕲春县人民政府将其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稍后，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其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这一古遗址发掘和考证的始末，我于1991年11月至1992年4月在这个乡搞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教育工作时，住在毛家嘴（现为达城乡条铺村4组）与钵儿山后的叶家塝（条铺村1组），这期间，经常与当时发现这一古遗址和参与发掘的几位老者座谈，得悉各种情况。1996年5月，毛家嘴遗址又出土了一批新文物，被文物界视为“奇观”。我再次亲临现场采访。现将这一遗址的发现、发掘、考证情况综述如后，以飨读者。

发现古遗址前后

1957年底，当时正进入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达城、柏条铺、叶嘴等都溶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柏条铺村内钵儿山周围一带的社员都到山东南边的碓臼塘挑塘泥，预备第二年春耕生产作底肥用。当塘底的淤泥挖到两尺深的时候，发现有大木桩十几根，社员们怀着好奇心，进一步向下挖，发现这些木桩排列整齐，两排很有次序，每两根之间还有厚木板立于其中。合作社领导将这一情况报告县里，县领导及时通知县文化馆人员去查看。他们看到木桩后，又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认为是一处古遗址，但到底是什么遗址就无法搞清楚。马上要求社员们停挖塘泥，并立即向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省文物管理部门当即派人前来勘查，并提出了“灌水封塘”的办法将其保护下来。他们把这一发现汇报给省文博领导，并转报国家文物局，经研究确定选择适当时间发掘。

次年，即1958年6——7月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用了1个月时间，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试掘。

发掘与考证

发掘队由省文博系统3人、县文化馆3人、保卫人员2名以及有关领导共十来人组成。他们请当地社员将塘水车干后，依地层进行发掘。经勘测，文化层方圆约三、四华里，中心点即钵儿山下碓臼塘。正塘底分立木楹柱13根，前后两排排列，前排5根，后排8根，每根木柱直径为20厘米。第二排正中有木屏风，下端嵌入土内。为了弄清这一木构群面积，发掘队向周边扩展，同时发现同等木柱109根，纵成行，横成列，墙板和席垫同样排列整齐。在木构群左侧

有一分层垂直垒起的彩色土坛，首层青色，次层红色（当时掘至第二层停工），经探测，以下还有三层，土色依次为黄、白、黑色。

在发掘稍深层后，出土了一大批地下文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大量堆积物品：有牛骨、马骨、羊骨、鹿骨、鹿角和其它野兽骨，还有稻谷、大麦、高粱及竹席等物。这里将出土的主要文物逐件分类介绍一下，以便了解其详细情况。石器类：①石锥1件，青石质，残长3.9厘米，属新石器时期器物。骨器类：②卜骨、卜甲数十片，呈枣核形，现存湖北省博物馆。陶器类：③陶鬲11件，有弧壁袋足式、浅腹足式、弦颈弧式、直壁袋足式和直壁实足式5种。多为尖沙泥质，有黑褐、黄褐、灰褐三种颜色，其中黑陶器皿多为轮制，饰纹以细绳纹为主，较粗糙。④陶篦1件，敞口、直壁、圆底、高圈足、下端残缺。外壁饰平行凸弦纹，间隙处加圆点纹，蚌泡状凸饰及折线状，黑色，磨光。口径25厘米，腹高21厘米，厚0.5—1厘米。⑤陶罐1件，筒状，黑色，磨光，外壁饰凸弦纹，夹杂圆圈纹，三角形线纹，足上端饰凸弦纹1圈。⑥陶鼎1件，泥质黑陶，盒口，平唇，斜壁，圆底，足呈圆锥形，壁饰凸弦纹。⑦陶罐1件，敛口，仰唇，折腹，扁身。以上陶器均属商周时期器物，现皆藏于省博物馆。铜器类：⑧铜爵1件，二菌状柱，柱端饰纲纹；长卵形腹，饰回文；圆底，三棱形高足；通高21.1厘米，其中足高6厘米。⑨铜觚1件，喇叭口，圆鼓腹，高圈足，素面，残高22.2厘米。⑩铜矛2件，青铜制品，柳叶状，空腹，一侧有小鼻。1件口呈三角形，另1件口呈圆形。⑪铜砗1件，长条形，刃部呈扇面。⑫铜斧1件，凹形，銎长7.4厘米，宽1.2厘米。以上青铜器均为西周器物。还有其它如石箭簇、石砗、骨削器、骨刀、铜罕、铜豆等残件，不一一介绍。

根据这一遗址现存的木构群、彩色土坛以及各种出土文物，经有关专家考证鉴定，它是一处西周时期的大型官衙建筑群，土坛为当时的部落领主（或酋长）祭祀坛、谷神的社稷坛。同时还发现祭祀

坛东北方有夯土房屋群，墙体夯得比较坚实。附近柏树边有陶井1口。整个古遗址面积在2.3万平方米以上。据一些老年人回忆，二十年代前期，毛家嘴东南向不远的袁家畈（旧称芦林畈）还有古城濠环绕钵儿山，后来改田造地时填平了。可见，对这一古遗址考证的结论是正确的。

出土文物新发现

1996年5月12日，条铺村4组（毛家嘴古遗址范围内）一位农民从钵儿山西部的一块水田边经过，发现有一个放光的东西半露在水田的放水沟旁。他当时就下水田将它弄了起来，是一个古铜勺（农村叫铜瓢）。当时有个小学生在这里玩，说是有个人在田沟边捡了个“宝”，村民们都关注这一传说。此时，在场的一位姓张的村小学民办教师听说后，知道是什么文物之类的东西露出地面，因为他知道这一带是西周古遗址，可能这水沟里会埋藏着什么东西。于是，他专门寻个空带工具到这里挖“宝”。天从人愿，他将水打干后，竟有一个青铜器半露出地面。他顺着挖起了这一铜器，原来是一个方鼎。谁知将这个铜鼎取出后，下面还有一个同样的“玩意儿”。取出第二个后，他继续顺着向前挖，先后共挖出5个。他取出这5个铜鼎后，仍向周围的地面搜挖，再没有挖出什么东西。几天后，另一位农民不甘心，也带个镢头来这里挖，真的在离前次出土文物区不到3米的地方挖取了一个圆形铜鼎。到此，一条田沟里共挖掘出7件青铜制品。消息传到乡领导和县文物部门后，他们马上派出有关人员征收，使这批珍贵文件安全地转移到达城乡派出所保管起来。县文化局对发现和发掘文物者按有关政策给予了一定的奖励。

笔者采访张老师的时候，他详细地讲述了这批文物出土的经过。这7件文物在地下时摆成直角形，上一层和下一层紧摞着。其

中方形铜鼎5个，每个高约21厘米，4足直壁式；圆形铜鼎1个，3足孤壁式；铜勺1件。除铜勺破缺外，其它6件均完好无缺，其饰纹多以回文、双回文或凸线文为主，鼎上还有记载部落标记的“图腾”文字。经省文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初步鉴定，这批青铜制品均为西周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文物，价值极其珍贵。

这批文物的发现与出土，与首次发掘的文物几乎是前呼后应。1958年出土文物中的青铜制品没有铜鼎之类，这次一下子就出土了6只铜鼎，并与铜勺一起摆成直角形，说明当时可能是某部落在战时祭祀用的祭具，它将为我们研究远古时期长江中下游文化提供更丰富的实物史料。

□张梁森

武穴理发业探源

理发师的剃刀，厨师的菜刀，缝纫师的剪刀，是广济（今武穴市）出名的“三把刀”。这“三把刀”又以剃刀最出名。它不但技艺精湛，独具传统特色，而且从业人员之多，就业地区之广，也是全国各县所罕见的。从清末起，广济理发业逐渐向外发展。到民国初年，国内外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广济理发师，抗日战争前后，广济的理发业已发展到极盛时期。

一

理发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技艺。在封建社会，历来被列入“下九流”，视为低贱的职业。广济理发之所以发达，一方面由于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人民向有文明卫生习惯，长期以来，比较讲究美化容颜，即使穷乡僻壤，也都有专门从事为人梳辫、盘发、整容、剃头的劳动者，城镇剃头铺、担，比比皆是。形成了独特的行业；另方面，也由于广济人口稠密，灾害频仍。许多贫苦人家子弟为生活所迫，不择职业贵贱而学此技艺，远走他乡籍以糊口。据调查，横岗公社赵俊大队高四房塝，清末仅 10 户人家，竟有 9 人出外从事理发。高祠堂塝清末仅 16 户人家，竟有 15 人出门从事理发。故有“夹包走四方，剃头度饥荒”之说。

清末武穴镇就有 28 家剃头铺，87 把靠椅，73 副剃头担，从业

人员 160 余人；梅川有 8 家剃头铺，70 余副剃头担，从业人员 100 余人。城镇人口集中，理发人员蜂涌而来，为了防止理发网点过多而影响营业收入，他们组织了行业帮口，制订了严格控制的行规。尤其是武穴，清末民初只限定开设 28 家理发店，店与店之间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划分了业务范围，不准增设新点，只许老店转卖。位于闹市之店生意兴隆，一般不转卖，常是子继父业，历数代之久。如位于正街之汉正兴、吕家店和位于刘家巷之江家店均历经几代人。剃头担子也同样受限制，凡增设一副，需经理发帮口公议认可，并须缴一笔入帮费。这一行规直到日寇侵占武穴时，理发店纷纷歇业逃难，只剩下 15 家，行规遂废，但仍保留店与店之间相隔上七、下八的例规。

二

广济理发店店主均是理发出身，除自己躬亲理发外，并延请一至几名客师，不订契约。客师离店只需隔前打个招呼，便可卷铺盖走路。技艺高的客师，各店争聘，技艺差的常被辞退。无论是店主或客师，彼此竞相钻研技艺，提高自己招来顾客的名望，形成学艺刻苦，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建国前名望较高的理发师：武穴有周老四、饶海清、刘堂焰；梅川有刘老大、朱疯子、樊成富；龙坪有樊毛尔等。

无论是开店或挑担，均愿收徒传艺，条件相当苛刻。学徒须请人担保，立学徒字据，注明“生死逃走师傅概不负责”，一学三年，师傅只管吃喝穿着。头年主要作杂活，学艺只能抽空“瞟学”，次年学习基本功。基本功包括练空心捶、摇腕子、习刀法和剪法。做武活的还要练武术、按摩。学徒精通技艺后，开始做“花班”或“棍子活”。三年期满艺成，须请“谢师酒”。此后，还有四年访友，使技艺得到不

断长进。特别是近代随着社会进步，一些善于钻研的技师，又积极吸收外来的先进技艺，掌握了吹风方面的推、拉、压、挑、别五种梳法和配合吹风造型以及熨法方面的修剪、排夹、卷杠、上电、盘卷、梳理和药水的配制等新的操作技术。

广济理发业老传统有文活、武活之分。其操作过程，文、武活基本相同，要求接茬精细，色调匀称，轮廓齐园，厚薄均匀，两鬓无角，高低适度。武活与文活不同之处，是在理发后对顾客进行通身排筋推拿；然后“端腰”。能使顾客舒筋活络，颇受顾客欢迎。能做武活的是身强力壮的师傅，会武术。这些师傅可治头痛、腰痛、发痧、感冒，落枕以及跌打损伤，被称为半个“医生”。抗战前，三镇大多数理发店是文武活兼做，根据顾客要求，愿做文活做文活，愿做武活做武活，多做一个项目多收钱，藉以吸引顾客。汉正兴、江家店均以兼做文武活而出名。老店主周老四、江舵尔晚年放弃理发，专为人“刮痧”和推拿接骨，就诊者甚众。

三

在本县从事理发业，一般养家糊口常有冻馁之虞，就是开店的，也是针梢削铁，发财致富极少，大都是“穿油鞋走凌冰”，随时有倒闭的危险。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时局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风涨，各行各业都提价，唯独理发业卡得很紧，此业处境艰难，到外地去谋生的特别多，仅武穴就有 10 多家、50 余人。

在建国前，南方的沪、汉之间沿江两岸重大城市都有很多广济理发店，其中以武汉的人数较多。北方的山东的烟台、青岛和天津等城市，东北三省的大连、哈尔滨、沈阳、长春、四平、营口、牡丹江、佳木斯、丹东等城市，广济理发店更多。抗日战争期间，广济理发人员有很多流寓西南大后方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重要城市。

在经营方式的发展方面，先后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是串街走巷，游动理发；随后在街头广场设固定的理发摊（东北叫理发棚）；后来才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型理发店。

外出理发师以开店的赚钱多，开店又以收徒弟获利大，收一名徒弟三年当中，少则获利四、五百银元。有些人开店发财致富：如在哈尔滨开店的蔡竹坡、李永年、杨仁德，在大连开店的高四弟，在上海开店的柯细记、查树生等，回乡置田造屋，光耀乡里，穷困人家都非常羡慕。他们不收外籍学徒，纷纷回乡招徒，有些贫穷人家子弟都愿跟他们出外学艺。于是沾亲带故者互相介绍。如此经过百余年的延续、发展，广济理发人员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广济帮”。广济理发店，一般不雇请外地人营业。

据调查，最早到武汉的有夏长恩、伍兰亭等人。夏长恩技艺出众，曾于 1908 年为清廷雇用，到意大利专为使团人员整容、修面、剃头。在意期间，细心观察和学习意国理发的操作技术和发型，辛亥首义回国后，于 1914 年春在武昌闹市中心，创办了第一家“青年理发店”，在继承祖国理发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改用转椅，使用推剪，理西装发型，顾客云集，生意日隆，由此武汉的理发业应时而起。据武汉市工商联 1951 年的资料统计，全市有广济大、中、小型理发店 70 余家，从业人员达 300 多人，加上挑担、夹包和受雇于“黄陂帮”、“扬州帮”的理发工人约计有 700 余人。广济籍理发师曾金山在武汉沦陷以后直到抗战胜利，担任过两任汉口市理发同业工会理事长。“皇宫”理发店经理何深农，也曾担任过武汉理发同业工会理事和短期理事长。1947 年汉口成立理发职业工会，广济理发工人鲁谷成担任过常务理事。

在上海较大的广济理发师开设的中、小理发店共 80 余家，从业人员近千人。著名理发师肖汉记曾在日本开理发店，学就一手的好技艺，民国初年在上海颇有名气；柯细记的理发店有两间小门

面，拥有30余张椅子。“日华轩”有十几把椅子，专做外国人生意。抗日时期在昆明的广济理发人员就有百余人，有20余人合股在闹市区开设“武汉美容社”，因手艺娴熟而顾客盈门。另外还有几家小店，其余理发人员分别受雇于“昆明帮”和“扬州帮”理发店。

广济理发人员涉足北方始于同治年间。传说第一个由广济去东北的理发师叫高甲尔（今赵俊乡高祠堂塝人），他同治年间由烟台辗转到大连挑剃头担。随后，又有高凤仪在光绪初年来到大连，在青泔鱼村定居，用玉米杆围了一个小剃头棚，门前挂着理发营业标志——高挑的一面月牙形布幌，这是东北的第一家“剃头棚”。因此，至今东北群众仍称理发店为“剃头棚”。当时大连缺理发业，高某很讲究质量，服务态度又热情、周到，顾客满座，应接不瑕。后来他回乡招徒，带去不少徒弟。当时，既无路费，交通又不方便，他们就身带理发工具，沿途卖艺糊口，长途步行跋涉。

光绪年间，帝俄占领大连，辟为商埠。俄罗斯人、日本人、朝鲜人大量流入，人口急剧增加，为理发业大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基于这一形势的需要，广济理发师采取同乡“来会”的方法筹措资金，自开理发馆，并回乡招徒。到顶峰时大连的大小广济理发馆约有300多家，都挂“湖北理发馆”招牌，其从业人员竟增到二千几百人。在大连市理发业中名气最大的老一辈理发师有胡六尔、夏六尔、石六尔，人称“广济三六”。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大连开了一家“双泉塘”理发馆，有几十把椅子，雇工大部分是广济技艺高的理发师。

在哈尔滨的广济理发店，于伪满时期最多的有250余家，广济理发人员曾达2000余人。据伪满康德四年（1937）的统计：全市70个较大的理发馆有42家是广济人开的，占总数的61%。当时，在东北各城市，广济理发师占大多数，就连一些小县城如黑龙江的东林、密山等县城，都有几家广济理发店，以致出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非湖北理发馆不进。连河北人开的理发馆，也不得不冒

充广济人，挂起“湖北理发馆”的招牌，以招揽顾客。

在东北老一辈广济理发师中，有的成了有名的骨科医生。如在哈尔滨的张大坤，后来专门开设接骨院，颇有名气。哈尔滨医科大学骨科有时请他去会诊疑难病。在大连的查元发、吴玉堂都是著名的骨科医生，查元发以后开“汉阳大药房”，吴玉堂解放后当了一家医院的院长。此外，以按摩而闻名的有在哈尔滨的舒光辉，在长春市的刘相如。建国前，其他大城市如广州、桂林、长沙等地都有几家乃至几十家广济理发店。在香港地区也有一些广济理发师，如查海明（梅川松阳人）在九龙也开有较大的理发店，彭俊启（余川下彭人）、杨正国（余川孙衙人）、朱金友（余川周芳远人）等均在香港从事理发职业。

在外地从业的广济理发人员颇重乡情。有一次安东一家戏院失火，烧死五、六百人，广济理发人员被烧死十多人，东北各地广济理发师均解囊相助，派代表慰问家属。另外，每年7月13日（农历）各地广济籍理发师均齐集一起祭祀理发始祖罗祖师，以此来联络同乡感情。抗战时期，大连发生了一起反对日寇侵略的爱国事件：广济青年理发工人查子香，于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在大连“忠灵塔”（系安放日本军人骨灰盒的地方）前举行日军侵华阵亡军人追悼会时，查身穿西装，暗藏利斧，混入日本人群中，乘其不备，砍死日本“在乡军”头子。被捕后英勇不屈，从容就义。

（四）

广济理发人员长期在沿海和东北各大城市与外籍人士接触交往中，学会了各种语言。有了语言相通这个基础，就有一部分身怀一技走天下，先后到朝鲜、日本、苏联、东南亚等国。使理发业从国内发展到国外。

民国初年，朝鲜的理发业兴盛，工资报酬高，一般师傅工资每月50多块银元。凡持有“合格证”的师傅每月工资90多块银元。因此，在东北的广济理发人员逐渐向朝鲜移动。到抗日战争前夕，广济在汉城的理发人员达300余人。程宝亭在汉城与人合开“华顺”理发店，有8把椅子，程因技艺较高，兼有文化，在汉城理发业中有一定声望，当上了汉城理发业公会评议长。此外，如仁川、元山、金山、清津、新义洲、大丘、万京、银川等城市也有许多广济理发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朝鲜进行户口大清查，在朝鲜的广济理发人员大部分被驱逐回国，剩下的人不多。

从东北去俄国海参威、伯力的广济理发人员也不少，有的已入俄国籍，有的辗转到莫斯科开理发店。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讲究理发。广济理发人员又逐渐向日本的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地发展，开了一些大小理发店，现在日本神户开理发店的有刘广才（解念兹附近人）。

此外，现在美国侨居的曾金山在美开两大美容院。在缅甸仰光的张衍增开设规模较大的“红光理发店”。

侨居国外的广济理发师，有不少爱国人士。“九一八”事变后，在朝鲜汉城的广济理发师，对日寇入侵中华表示愤慨，自发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五）

建国以后，广济理发行业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注。理发人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全县组织了理发业工会，1955—1956年武穴、梅川、龙坪、田镇四镇理发人员先后组织四个理发合作社。1966年9月，县国营服务公司，从武穴理发社的人员中挑选18名理发师开办“人民理发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各社、镇和机关、学校开设的各种类型的理发店如雨后春笋。到1982年底为止，全县三个县辖镇和其它较大集镇，已有大小理发店34个，从业人员160余人，农村剃头的理发人员约700余人。老理发名师贾振华曾当选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广济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苦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人民安居乐业，出外学理发谋生的人大为减少。也没有理发师回乡招徒。因此，广济在外的理发师便逐渐地减少了。老理发师过去30多年在各大城市的理发行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如武汉红旗理发店73岁的张金秀，热心培养年轻一代理发师，除在武汉参加青年理发人员培训工作外，还整理了理发方面的传统操作规程，编写了《理发要领》、理发《三字经》、《女式烫发的造型与护理》等材料，传之后代；另一方面常回广济和受聘到黄石、十堰、鄂城、纸坊等市镇传授理发技艺。又如哈尔滨市被挑选到“北方大厦”、“国际旅行社”等单位的优秀理发师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广济理发师。老理发师饶华尔曾为周恩来总理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理发。著名理发师宋伯松(宋冲人)与其他同行合编、出版了《理发技术》一书。又如在大连的广济理发师舒东生，因技艺高超，被挑选出国，到非洲传授理发技术。

□武穴市政协文史委

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始末

1957年，我是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县委的安排下，我参加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以下简称“刘展”）的全过程，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荣幸的大事。此事虽说已达40年之久，但回想起来仍觉得此事重大，意义深远。

（一）

刘展是当时全国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全国性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时的地委、省委的支持，更为关键的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当年9月，毛泽东来武汉，在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汇报后指出，这个典型很好，这不是黄冈的刘介梅，也不是湖北的刘介梅，而是全国的刘介梅。可以办展览会，可以拍电影，可以写小说。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批示，才出现了刘展从小到大，从地方到中央的展出活动。刘展是解放初（即1949—1957年），由中共中央直接举办的两个大型展览会之一。一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展览会；二是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

刘展在首都北京筹展及展出期间，受到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审查第一次预展时指出，刘展的气魄太小，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力求把刘展办

好。朱德同志还接见了刘展工作人员，并找刘介梅谈话。朱德同志问："刘介梅，你有多大年龄？"刘介梅回答："今年 36 岁。"朱德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刘说："你 36 岁就不想革命了？你看我们这些老人还在全心全意干革命。"朱德同志指示随行人员，让刘介梅到北京各地参观一下，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国家的发展变化，体会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李先念同志在接见刘展工作人员时，同刘介梅开玩笑说："你就是刘介梅呀！你的那些话讲得好哇！老子管粮食统购统销，可你刘介梅却反对统购统销。老子 16 岁就当县委书记，一条，就是大公无私"。当时国家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臣带着女儿参观刘展，观后接见刘介梅，他一边与刘介梅握手，一边对刘说，我们今天是来受教育的，并对刘讲述了"富不过三代"的道理。

刘展进京经预展审查后，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中央抽出领导力量指导刘展的加工制作工作。中央成立了刘展筹备委员会，主任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陈正人兼任，副主任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兼任。谭震林、廖鲁言等领导经常到展览会指导工作。

为了审查刘介梅同志的个人情况和刘展在黄冈办展的经过，中央还派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办公厅郝主任等二人亲自到黄冈县刘介梅家乡实地调查，并到黄冈县总路咀区看与刘介梅类似的展览活动，看后表示满意。

党中央对刘展是相当重视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了身，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可见刘介梅这个典型和举办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是多么重要啊！

(二)

为什么要举办刘展呢？还要从刘介梅同志的个人经历说起。1919年7月10日，他出生于黄冈县(今团风县)上巴河镇柞林村塝。解放前，他家三代人打长工，三代人讨饭。祖父和母亲在讨米中饿死，叔父打长工死在外乡，尸骨无还。两个不满10岁的妹妹被迫给人家当童养媳。刘介梅自己就打十年半的长工，讨了13年的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饱受了人间的凄苦，受尽了地主老财的凌辱，流尽了辛酸的眼泪。

1949年5月，刘介梅一家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穷人一样获得了解放，见到了光明。当年7月间，上巴河区的区委书记韩大刚访贫问苦时，找到了刘介梅，了解了他苦大仇深的历史。在韩书记的帮助和教育下，刘介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初期，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这段时间，刘介梅的革命热情高涨。乡里酝酿反霸，几千人选举刘介梅当代表。这时他想，我一个讨米乞丐，打长工度日的人，一下子就得到广大穷苦老百姓的尊重，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感到自己确实翻了身，作了新社会的主人。于是怀着革命的激情，积极地投身到清匪反霸的斗争之中。1949年12月6日，区委决定刘介梅带两个人到陶店乡去捉恶霸地主喻振仁。喻振仁是全区头号恶霸地主，全家有12个成人，家大势大，减租反霸中没有斗倒，气焰极为嚣张。他连夜赶到陶店乡。一进喻振仁的家门，被喻家的儿子、姑娘、媳妇上十人一窝蜂地涌来围着打。同去的两个人因害怕都溜了。他一个人从堂屋打到房里，从房里打到堂屋，打了大半夜，他手被打肿了，头被打破了，血流满面，便激起了更深的仇恨。于是他狠狠地一阵拳打脚踢，打开了一条路，趁势把喻振仁的大儿子抓住，

挟着往外走。此时地主的全家都冲上来抢夺。他边打边往外退，到了大门外，喻振仁的二儿子拿起一个筅子向刘介梅头顶扑来，他顺手接过筅子，跟上一脚，把地主的二儿子打倒在地，爬不起来。这时他到村中喊来民兵，接过枪朝天鸣了两响，吓得喻振仁一家大小缩头往屋里跑。最后终于把恶霸地主喻振仁捉到区公所。

由于刘介梅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中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模范。全村群众和区、乡领导都十分信任他称赞他。1950 年 4 月，他由乡农会主席提拔到区里当上土改工作组长。同年 11 月 5 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又在 12 月 6 日与妻子张雪梅结了婚（相继生了五儿一女）。土改中分得了 6.3 亩田地、耕牛及全套农具；还分得了一进两重的宽敞房屋和一些家具。刘介梅的父亲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当田地、耕牛、农具和房屋分得以后，着实地高兴了一阵。这位年近花甲勤劳善良的老人，日夜操持家务，精心耕作田地，粮食年年丰收，全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刘介梅的父亲多次说："我们一家是靠共产党发家的，翻身不忘共产党，饮水不忘掘井人。"他老人家始终保持着这一朴实的信念，去教育儿子、媳妇。在刘介梅犯了思想错误时，1957 年 8 月底，他在县广播站向全县人民以亲身经历，忆苦思甜，用真实的事例批评儿子刘介梅的忘本思想。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刘介梅同志的思想开了岔。土改复查结束后，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是提倡劳动致富，互助合作，共同上升，防止两极分化。可是刘介梅同志小农经济思想严重，一心想个人发家致富，羡慕并赶上富裕中农生活，停止革命，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抵触。他对本村富裕中农曹其斋家产十分向往。他常对家人说："我看曹其斋有 20 亩好田，10 多间瓦房，请一个长工、一个月工，还有百多元放债，再加发脚力（搞搬运）和布生意，土改时没有划上富农，日子过得比谁都好。"并说："曹其斋啊，

我老想着曹其斋。”于是，他就和爱人张雪梅打起发家致富的如意算盘。

1952年3月间，刘介梅同志被抽到第三批土改点枫香桥乡搞土改，他的爱人张雪梅从70多里外赶到枫香桥，一来看望刘介梅，二来夫妻俩商量发家致富的门道。他俩盘算来，盘算去，还是认为种田好。他俩一致认为，首先种好自家的6.3亩田，再开3亩多荒地；其次同伯父刘吉甫榨油坊合伙，一个月也可以赚30多元钱。这样一算下来，吃不完，用不完。过几年就可以赶上曹其斋了。这时刘介梅定了干部级别，每月工资只有24.4元钱。他对爱人说：“在外面干工作还不如开榨坊赚的钱多。”1953年是丰收年。刘介梅回家一看，家中堆有一大囤子谷，心里极为高兴。他想除了留足全家口粮外，还多5担谷和200元钱放债。

正当刘介梅准备实施发家致富计划的时候，县委传达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文件。他参加了全县粮食统购统销会议，听到了中央的文件精神，似觉巨雷轰顶，胸中顿起乌云。县委书记、县长的讲话他听不进去，思想抵触情绪很大，讨论不发言，吃不香、睡不安，一心想着家里的5担余粮。在讨论中，有的说资本家屯粮不售给国家是不法行为，他想这是别人凭本事赚钱屯粮。有的人谈到实行统购统销的重要性，必要性，他想，你说得再好些，还不是要我5担谷，这5担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我要靠它发家啊！会议的第三天要求到会的干部、共产党员带头报家中的余粮，刘介梅再三考虑只报1担5斗，还有3担5斗隐瞒不报。他想这3担5斗谷是发家致富的本钱。散会回家后，他径直来到父亲的房里，一看囤子里的谷没有了，原来他父亲把5担谷都卖给国家了。发家的计划被打乱了，他十分气恼，就在家中大声吼叫，跳出跳进地骂着。过去讨饭时，总是先把讨来的饭给父亲吃，现在为了5担谷把年迈的父亲也骂了。父亲再三劝说，他听不进去，气得连饭也不吃，就走进自己房

里。突然他发现柜角里有两担谷。他爱人对他说:“这是刘明海去年生活困难,在我手里借了两元四角钱,作为1担谷(当时谷价是5.6元/担),今年连本带利还来了两担谷。柜子里还有两匹布,也是人家借去还来的。”刘介梅听后心中惊喜。喜后一想,现在统购统销是大势所趋,再不能用谷放债了,发家致富的梦难以圆,所以他一听到说统购统销四个字就头痛,并且处处与此项政策相抵触。他同党不是一条心,在工作上阳奉阴违,欺骗党,有时公开抗拒党的政策。他在竹陂寺乡搞小麦统购时,有一个村群众自报口粮7209斤,他向上报是12000斤。1957年小麦统购,每人一天留口粮1斤2两,他坚持每人1斤4两。区委书记找他谈话,他也进去谈,却仍坚持每人每天1斤4两。他心里对统购统销不满,口头上公开唱反调,行动上公开抵抗。1953年他分配到团风区挖乡搞统购统销,工作还未开始,他就盲目在区委书记面前叫喊,说县里定的口粮标准低了。区委书记叫他下去认真地调查一下,他抗拒地回答:“低了就低了,调查么事呢?”结果,他还是暗地里按照他自定的标准多留了。1955年在上巴河乡新华一社搞粮食统购,本来可以购6400斤,他只购5200百斤,党支部书记夏少福说:“不只购这些?”他说:“只有这些,那是你把帐算错了!”1956年,他反对布票打折,猪肉、食油凭票计划供应。他对此时常发牢骚,辱骂党的政策是“扼农民的吃穿”。

1954年上半年,村里组织合作社,刘明焱来动员刘介梅全家入社。他说:“我们家不入社。”他为什么不同意入社呢?他私下里盘算是:家中农忙请人干活,一年收25担谷,除了吃喝开销,人工肥料,还要多五、六担谷,这是我们家的一点本钱。统购统销再严格,还是可以把粮食放债,本村刘焱生在年初还放了20担谷的债。如果入了社,请人、放债、囤粮的事都搞不成,所以坚决不入社。可是等刘介梅从防汛的江堤上回到家,父亲、弟弟都报名入社了。此

时刘介梅气冲牛斗，指着父亲说，连你也不跟我一条心，你老糊涂了。因为爱人在养孩子，没有参加合作社劳动，这年的收入比往年少了20多元。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临，刘介梅一家由初级社转入了高级社，田地、耕牛都入了社。他虽牢骚满腹，但见大势所趋，无力阻挡。于是对家里说："算了！只当是没有实行土改的，只当是土改中没有分得田地的。"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是生活在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历史给他的沉积于思想上的自私自利，发家致富的小生产者传统观念是极其顽固的。在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冲击下，要他们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心悦诚服地进入社会主义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艰难的。刘介梅虽入了党，当了干部，但他毕竟是一位地道农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献身的思想并未建立起来，相反，落后的散漫的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扎根较深。面对着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开始傍徨内闷，气愤不平，进而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抗衡，与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格格不入。刘介梅同志的思想错误是很有代表性的，故此党中央在开展对全国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中，抓住这个典型，采用办展览会的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有着重要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三）

自从中共中央关于向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下达以后，中共黄冈县委根据省、地委的安排，于1957年8月13日召开了1068人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进行贯彻。在会议上就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党的领导问题进行大鸣大放。在鸣放中，有些干部坚持错误立场攻击党在农村社会主义

改造的方针、政策，抹煞社会主义建设成绩，他们说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合作化办坏了，农民生活搞苦了等等。刘介梅同志的思想与上述言论极为合拍，他在8月15日在小组会和8月20日全县千人大会上作了发言。此时他热情高涨，发言时手直舞，涎直喷，横着心，鼓着嗓，恶言恶语地大放其词。他说："天天叫群众生活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只有鬼相信。我的父亲64岁了，风烛残年。我这个儿子就不能行片孝心，让他晚年的日子过好些。要吃点粮食只有那么多；要穿点，布票要打折；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要得到农民拥护，最好是取消统购统销。我们干部搞统购统销光挨骂。搞这样的革命工作，还不如我过去讨米被狗子咬。"他还说："领导上一点不深入，不了解情况，光在上面喊合作化这优越，那优越，我看一点也不优越。我家里入了社，父亲、老婆一年到头在社里劳动，就不如土改那两年收入多。"（在小组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伯辰和我均听了他的发言。刘介梅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周伯辰同志向县委汇报后才决定他在大会上发言的）。刘介梅大会发言结束后，到会人员中有许多人为之鼓掌。这说明他的这些错误言论不是孤立，影响很大。有的人在会下称赞他，有勇气，胆大敢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当刘介梅放出上述错误言论后，也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知道他的底细的人就说："刘介梅过去三代打长工，三代讨米，他本人也讨过几年饭。打了十年半长工。解放后分得了田地、房屋和全套农具、耕牛，同时还入了党、当了干部。这样的翻身农民，应衷心拥护共产党，双手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他还反过来攻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县委宣传部长周伯辰曾在解放初期任过刘介梅家乡——上巴河区区长、区委书记。他对刘介梅同志的历史非常熟悉。当刘介梅在小组会上鸣放后，就引起了周部长的深思。在从县招待所返回县委大院的路上，周部长就与同行的我说："我们宣传部的

主要任务是协助县委搞好政治思想教育，为县委当好参谋。你是负责农村中心工作宣传的，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我听后思索一会儿就对周部长说：“部长，能不能把刘介梅同志家庭新旧社会的实物搬到黄州来，在文化宫办个小型展览。”周伯辰同志答复很肯定。当晚就召开宣传部全体干部会，研究举办刘介梅同志展览会的详细办法。宣传干事樊雄还提出在县文化宫搞个解放以来黄冈县各项成就展览。会议结束前，周伯辰同志提出，由我负责刘介梅同志的展览，樊雄同志负责全县成就展览。

第二天（大约是8月21日），周伯辰同志向县委常委汇报举办两个展览，为三级干部会议服务。常委们听后，一致同意，并提出一定要尽快地把刘介梅同志的展览会办起来。县委书记王汝才说：“举办刘介梅同志的今昔生活对比小型实物展览，可以看到刘介梅同志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活对比，可以看到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被人剥削，受人侮辱，没吃没穿的长工；新社会他自己劳动、丰衣足食，而且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和技术指导站站长（1957年，刘介梅任马曹庙乡农业技术站站长）。刘介梅同志这个变化，代表了农村70%的人的变化，他们也和刘介梅同志一样，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翻了身，完全证明了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解放。同时也看到了刘介梅同志近来的思想变化，他在前进道路上动摇了，对党的政策不满意了，甚至工作也没有味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心灵深处蕴藏着的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发作了，他怀念旧道路，想剥削别人自己发财，想过着清闲自在的腐化生活。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丑恶实质。刘介梅这种思想在农村也代表了一部分人，他们一方面痛恨旧社会，痛恨剥削者，另一方面，他们还留恋旧社会，羡慕剥削者的生活方式。当他们自己的生活已经能自给自足摆脱贫困时，就想起来只有用剥削的手段，发财才能更快更大。

这时他们的思想已经变了，立场也就变了，他们说的话不再代表广大的劳动人民利益，而染上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王汝才同志这番讲话极为深刻，得到了全体常委的赞同，并肯定举办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的重大意义。

这就是举办刘展的直接起因，也是刘展产生的历史背景。

（四）

刘介梅放出了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统购统销政策言论以后，在会议期间，引起许多人对他不满，就此展开了大辩论。有的人批评他忘本变质，但刘介梅本人据理争辩，极不服气，硬说他讲的都是事实。因此看来光凭口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时，县委作出决定，以刘介梅本人的亲身经历为典型，举办小型实物展览，用铁的事实教育他本人的回头。

1952年8月21日晚上，根据周伯辰部长的安排，我先到县招待所把刘介梅同志请到周部长的宿舍，部长与刘介梅谈话，传达县委常委会议要举办刘展的决定。征求刘介梅的意见，刘表示同意领导的决定，将家中新、旧社会的实物搬到黄州办展览。为了做好刘介梅同志家属的工作，我于当晚赶到上巴河，找到了刘介梅同志的父亲刘朗臣老人，并同他谈心。开始老人有些顾虑，打听他儿子犯了什么错误，是不是要没收家中的财产。当我细心说明来意，传达县委决定后，刘朗臣老人欣然同意了，并嘱咐说：“我解放前的东西不能丢了，特别是讨米棍和讨米用的破篮子不能丢。”我诚恳地回答了他的要求。在与刘介梅的爱人张雪梅谈话时，她提出的要求与老人相反，请不要把他的新衣服、新床、新柜子搞坏了。我极为肯定地回答，凡有损坏的，由县里负责赔偿。刘介梅家属思想工作做通后，我当即在上巴河区公所给周伯辰部长打了电话，汇报做通思想

工作的情况。第二天我从上巴河赶回黄州。周部长对我说，明天早晨你同刘介梅一道去搬东西，县委派车(当时全县只有一部货车)。

8月23日早晨，我同刘介梅一起乘货车来到上巴河镇。刘介梅的家离上巴河镇约有五华里路程，因道路窄小，不能通车，于是在上巴河区公所的帮助下，组织了30多个劳动力把东西搬到上巴河镇。这些实物反映刘介梅同志一家新旧社会的生活。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实物是：用过祖孙三代的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蚊帐，垫过60多年的破垫子，盖过三代人像猪油渣一样的两床破棉絮，父子三人共睡过几十年的三条腿的破木床，在旧社会又当桌子又当碗柜用了四代的一个没有底的破箱子，吃饭洗脸用的一个用线缝过多处的破葫芦瓢，还有刘朗臣老人珍藏的传家宝——讨米棍和破篮子。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物件有：土改后新做的80件新衣服，热天穿的府绸布衬衣，不冷不热穿的卡叽、毕叽布衣，还有洋布、香云纱等单衣，二四八月有夹衣，冬天穿的毛绒线褂子、羊皮袄，全家老小穿的新棉袄。大大小小的回力鞋、胶鞋、皮鞋共有十多双，有红筋的棉絮9床，新蚊帐两床，哗呖呢花被面、太平洋新被单。用的家具有雕花镂空的红漆床、红漆桌衣柜各一乘。还有热水瓶、瓷盆、瓷碗多个，总之样样齐全。这些东西后来都依质论价，由县政府付给刘介梅同志1000多元钱。其他还有准备父亲后事的一口大棺材和生产用的大型家具，因无法搬运就未搬。此外还留下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些衣物和用品。这些家具衣物装满一辆四吨的大卡车。东西拖到黄州后就放在文化宫，摆在一个大展厅里。当时我们按新旧社会的两大类实物分别展开，人们一看就知道刘介梅同志一家新旧社会两种生活的缩影就呈现在面前。厅门前写了一副横联：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看一看，比一比，想一想。还将刘介梅同志在大小会上鸣放中的言论摘抄出来，供参观者观看。

1957年8月25日，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开幕了。首先

接待第一批观众是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1000多名干部。由于参加会议的干部有70%以上的是出身于贫下中农，看了这个对比鲜明、生动活泼的展览后反映强烈，许多人边看边流泪，对刘介梅翻身忘本的行为极其气愤，展览厅内外气氛浓烈，批评声，指责声接连不断，三级干部会议气氛骤变。这个展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给全体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激发了他们的愤恨和同情，到处都是指责刘介梅的声音。“刘介梅好了伤疤忘了痛”，“刘介梅翻身忘本，叛党变质”。在辩论中，有的还质问刘介梅，旧社会不搞统购统销，不搞农业合作社，你为什么讨米？为什么打长工？你凭良心说，到底是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这时刘介梅同志成天吃不好，睡不着，思想斗争异常激烈。26日晚上，他一个人到展览厅，点着蜡烛去看他自己的东西。他边看边哭，悔恨交加。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真的是翻身忘了本。”8月27日，县委书记王汝才，宣传部长周伯辰再次找刘介梅谈话。刘介梅知道自己错了，从心坎里服气了。当天下午刘介梅同志在1000多人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痛哭流涕地检查了自己。他说：“我自己变了质，1952年，我家收入655元，每人平均吃粮547斤，吃了25斤油，吃了27斤肉，我家的生活确实改善了。你们大家看了我的东西，衣、食、住、行是样样不缺，我真是吃了菇子忘了树的恩。这次是党挽救了我，是同志们帮助了我，我一定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还要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刘介梅这个真实典型的引导下，大辩论时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会议期间，许多人以刘介梅典型事例为先导，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尤其是类似刘介梅出身的干部，触动最大，他们忆苦时都痛哭流涕。如新河乡长春一社社主任吴少甫解放前卖工度日，解放后生活过得非常富裕，这次在会上放了许多反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言论。小组会上同志们同他辩论，他表示“誓死不屈”，还强硬地说：“砍头判

刑，我也要坚持我的意见。”看了刘介梅展览会后，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过去比刘介梅还苦，讨米的篮子和棍子还是共产党来的那一年丢的，家里用的穿的全是解放后添置的。刘介梅自己有22件衣服，我也有22件，这次我说了横话，对不起党。”

这个朴实而生动的小型展览展出了四天，就轰动了黄州城。地、县两级的直属单位的干部、工人、学生、城郊农民，都自发地组织起来参观，每天接待参观人数总在2500人左右，反映很好，效果显著。8月29日，地委书记姜一，地委宣传部长白林先后来到文化宫参观了刘展，并在留言簿上留言。肯定这个朴素而又生动有力的实物展览办得很好，应在各地推广。据当时初步统计展出25天，接待观众达3万余人。

地委抓住刘展这一新生事物，于8月29日晚召开了全区13个县的电话会议（当时的新洲、鄂城等县均属黄冈地区）。地委布置各县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要举办类似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大力推广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举办刘介梅实物展览的经验。从此刘介梅和其实物展览在全区出了名，各县都选择了本地的典型，举办了类似的展览。

姜一同志将黄冈县举办刘介梅实物展览的成功经验向省委书记王任重作了详细的汇报。省委对此极为重视，并将此情况通报全省。武汉市委受到启示后，于同年9月份举办了工人王大姑的今昔生活对比展览，轰动了省会武昌，社会反映效果良好。为了扩大刘介梅这个典型及其展览的宣传效果，中共湖北省委于9月12日向各地委、县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各地开展对刘介梅思想转变的大讨论。省委认为，批判刘介梅的思想对于党内外的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希望各地党内外同志踊跃参加大讨论。省委通知指出，这次大讨论的目的是通过刘介梅这一生动、深刻的典型事例，教育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条道路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斗争。每个人都应在这场斗争中站稳立场，改造自己，争取成为一个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战士。

中共黄冈地委于9月13日就开展对刘介梅思想转变大讨论问题向全区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中共黄冈县委在9月14日作出了《关于在全县开展讨论刘介梅思想转变的决定》。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落实省委通知精神，《湖北日报》于9月13日发表了《惊人的教训　可喜的转变》社论和《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的报道。随着全省对刘介梅思想转变的大讨论开展，《湖北日报》除对各地讨论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外，还于10月8日发表了第二篇社论——《更广泛更深入地讨论刘介梅的转变》。这样一来，刘介梅和其刘展在全省范围内出名了。

1957年9月20日，刘介梅同志受中共湖北省委指示，专程赶到武昌水果湖招待所，当时的省长张体学接见了他。次日张体学省长陪同刘介梅到尚未建成的长江大桥工地参观。张省长对刘介梅说："你刘介梅为了5担谷放债就不想革命，你看这长江大桥工程多浩大，一个桥墩就不知要买多少担谷啊。你是共产党员，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记住入党宣誓时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词。"这时的刘介梅已经转变了思想，听了张省长的谈话后说："我一定听党的话，革命到底。"9月22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洪山礼堂举行刘介梅思想转变的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等单位负责人及部分机关干部。报告会由省长张体学主持。刘介梅同志在这个大会上以真实的情感，生动的事例，作了题为《我思想上的革命》的报告。报告的基本内容是：前言部分，叙述了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大鸣大放中发表的反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的错误言论。第一部分标题是：生活低层，诉说了解放前苦难的经历。第二部分是：思想开了岔，用大量忘本的事实说明了自己

思想变质的经过。第三部分是:党挽救了我,详细介绍了自己忘本回头的经过,特别是看了自己的实物展览的悔恨心情。第四部分是:决心做一个社会主义坚强战士,表示与资本主义思想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刘介梅同志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于9月24日的《湖北日报》第二版上全文刊登出来了。这样刘介梅在湖北全省的影响就更大了。

(五)

1957年9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派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理论教育处处长陈仲莱来黄冈县实地考察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随行的还有湖北省群艺馆的三名同志。这时刘展尚在县文化宫展出。县委派我接待陈仲莱同志。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将其带到县文化宫去参观刘展。他们参观完毕后,均表示满意。在言谈之中得知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市委宣传部有将刘展搬到武汉展出的意图。当天陈仲莱同志将刘展的情况分别向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并提出完全可以搬到武汉展出。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惇表示同意。我得此情后,向县委书记王汝才和宣传部长周伯辰报告,县委领导一致同意要我负责把这件事办好。9月5日早晨,我就分配机关事务工作人员买来一些木板,请木工钉成大箱子,箱子规格是依实物展品的大小而定。经一天一夜努力终于赶成功。9月6日将全部展品用船运到武汉市展览馆(当时称中苏友好宫)。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这次展览要扩大规模,不仅把刘介梅的实物放在展馆最突出的位置上,而且要根据刘介梅忘本回头的整个事实写成脚本、解说词。用大量绘画和大量的照片,分成若干版面来进行展览。当时省委要求用半个月的时间搞成。为了落实省委关于扩大刘展规模的指示,省委宣传部

和武汉市委宣传部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先后从湖北美院和武汉市美术家协会抽调绘画、美术设计、美术编辑人员30多个，集中在武汉展览馆工作。刘展的脚本、解说词是根据刘介梅同志在省委机关干部大会的报告《我思想上的革命》，由《湖北日报》记者任洁民、《黄冈县报》副主编李汝舟负责编写。由于在黄冈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刘介梅同志的一切活动以及举办展览整个过程，加之参观刘展后的效果等情况，均未拍成照片，这给在汉展出刘展的规模扩大带来了困难。遇到此情况，我平心地对省委、武汉市委负责刘展的领导同志说："我认为刘展只在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展出的小型实物展览，为本县三级干部会议服务就行了，根本没有考察到省委、地委如此重视，这是我们没有拍下有关照片的原因。"既然如此，省委决定组织人力，再返黄冈，赶拍所需照片。

赶拍照片是展览会的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这是扩大刘展规模，真实、完整地反映刘介梅思想转变，以及刘介梅这个典型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的需要。1957年9月8日，《湖北日报》社摄影记者贾蕙赶到黄冈县，向县委说明来意后，在我的陪同下，到境内各地补拍照片。其基本内容有：刘介梅在小组会、大会上大鸣大放的照片；上巴河区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小组人员开展辩论的情况；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与刘介梅交心谈心的照片；黄冈县各地如总路咀区、团风区、上巴河镇等八处举办本地典型人物实物展览的照片；在参观刘展以后，思想转变的典型人物的照片；刘介梅家属的照片；全县开展刘介梅思想大讨论，出现新气象的照片；宋坳区倪素珍创办的"四无塘"的照片；还有其他一些需要的照片。在时间紧，拍照任务大，又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我同贾蕙同志不辞劳苦，跑遍全县各地，以6天的时间把各种照片拍齐了，于9月12日回到黄州城。当时黄州只有一条街，照像馆只有一家较好点。为了确保照片的质量，贾蕙同志只将胶卷送到照像馆冲洗出

来，不在此地洗印和扩印。9月13日，我和贾蕙同志赶到武汉，将在黄冈县补拍的照片胶卷交给刘展会筹备处。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规模扩大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展览的规模、气势就比原小型实物展览大多了。整个展览共有60多幅绘画、照片组成，图文并茂，并配有新旧社会的实物。展览会的进门处立有刘介梅（如本人同样高大）新旧社会两张大幅照片。全部展品共分六个部分，主体内容除与《我思想上的革命》文章基本相似外，还补上通过刘介梅思想大讨论出现的新气象，新变化。展览是在武汉展览馆楼大厅展出。首先是由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张平化、省委宣传部长曾惇以及省委、武汉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作最后审查。经审查同意后，才开始正式对外展出。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第一天正式开幕时，武汉展览馆外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第一天来馆参观人员达2万多人，不论是青年学生，解放军战士，还是老工人，老干部，看到刘介梅苦难家史，无不泪流满面，看到刘介梅翻身忘本，无不气愤不已，深受感动，深受教育。观众留言簿一天要得两三本。《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记者每天来馆摘抄留言，发表于次日的报纸上。正当刘展在武汉展出达到高潮的时候，省委接到中央的通知，中央决定刘展进京展出。我记得这时刘展在武汉展出还不到一个星期，省委通知我们刘展停止展出。1957年9月25日，武汉展览馆在刘展厅外贴出通知，刘展停止展出。记得当天展览馆前门大广场上挤满了人群，要求参观刘展。因为第二天展品就要乘火车运往北京，展览会的领导同志安排有关人员到展厅前围观的群众中做工作，说明刘展去北京展出的紧迫性、重要性。经大家深入细致地说服，广场的人群渐渐地散去，可是少数人一直停留到深夜才肯离去。1957年9月27日，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的全部展品运到了北京，展品停放在北京人民文化宫（原清朝的太庙）的大厅内，准备展出的筹

备工作。

（六）

1957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来武汉视察工作，省委书记王任重在汇报全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谈到了黄冈县利用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典型，全面开展刘介梅思想大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听后十分高兴，他说，刘介梅思想转变这个典型很好。为什么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来湖北得知刘介梅的情况呢？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9月10日左右，县委书记王汝才到县委宣传部找到我，像下死命令一样地对我说，今天上午你一定要把黄冈县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情况的报告写出来，下午地委书记姜一要到省委向党中央来湖北的领导汇报。我在当天下午两点钟以前就把报告赶写起来了，因姜一书记马上动身去武汉，报告来不及打印，就在手稿了盖上中共黄冈县委的印章后送到地委去了。为了慎重起见，党中央于9月中旬派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郝主任和一名随行人员来黄冈考察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和全县社会主义教育中讨论刘介梅思想转变的情况。县委派我陪同郝主任乘坐地委派出的仅有的一台小汽车，首先到达刘介梅的家乡上巴河区了解情况，随后参观了总路咀区举办的本区类似刘介梅同志的典型事例展览会。当时总路咀区区委副书记是李文雁，他向郝主任汇报了本区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大讨论的情况。最后郝主任一行还到刘介梅家中进行了看望和询问。郝主任在黄冈考察了三天就返回北京了。现在看来，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由武汉运到北京展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中央早有安排的。

刘展在北京展出前的筹备和展出活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亲自抓的。当时的刘展筹备委员会主任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陈

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般石任主任委员，农业部宣传局局长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机关还抽调了大批工作人员。当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武汉的全部展品运到北京人民文化宫后，就开箱将全部展品摆在文化宫的第一大展厅里，此展厅大约有2000m²。中央安排展览会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吴劳。我私下认为，刘展在武汉展出的规模较大，展品完善。可是经中央筹委会负责同志和总设计师吴劳的审查，原展览会离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原计划在1957年国庆节期间开馆展出，筹委会领导认为要进行深加工，故此展出时间后拖。

一场围绕刘展的规模再扩大，艺术再加工的紧张战斗开始了。除中央有关领导经常来筹委会指导工作外，吴劳同志抽调近100名在北京很有造诣的美术、书法人员，对部分板面进行重新绘制，展览板面都比武汉展出时大一些，文字说明也进行了修改和加工，照片也都扩大了，清晰度也强了。仅木工一项最紧张时人数增到100多人。文字说明改写得简洁、生动，书写更是十分讲究。记得板面说明词的书写，是请在故宫内为清朝皇帝写诏书的一位老人来写的。所写正楷苍劲有力，古朴工整，间架结构精妙绝顶。

整个展览共分五个部分，其程序是：第一部分是前言，简介刘介梅同志的简历。第二部分是介绍刘介梅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上鸣放的错误言论，配合照片是刘介梅在黄州大礼堂会场上发言的情景和在小组会上全体成员讨论的合影照。第三部分是介绍刘介梅同志解放前苦难的经历，配有刘介梅一家讨米的悲惨绘画和被地主狗咬的绘画等。第四部分是刘介梅忘本回头，这是展览的重点，展出的板面的有30块之多。此中有县委书记王汝才同刘介梅个别谈话的照片，有宣传部长周伯辰个别教育的照片，有小组会辩论时的照片，有刘介梅半夜看自己展览的照片，有解放后翻了身，入了党，当了干部，全家生活幸福，美满家庭的照片，有刘介梅在县

三级干部会议上检查自己错误，痛哭流涕的照片等等。每一个板面是一个内容，并配有刘介梅的实物展出。每个板面文字说明、实物、照片和绘画匹配恰当，结构严谨，生动感人。第五部分是介绍黄冈县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大讨论带来的新气象。有全县生产大发展的照片，有“四无垸”的照片，全县各地办同刘介梅类似典型展览的照片，以及全县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上升的照片等等。在展览会的中央，观众一走进展览大厅，就可以看到刘介梅同志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生活对比的个人巨照。

大约在10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代表中央对刘展会的展品艺术形象和思想内容作最后的审查。当朱德同志走进展览大厅时，全体工作人员一致鼓掌欢迎。朱德同志叫大家去干自己的工作，他要专心地看一看刘展的内容。他老人家看得非常仔细认真，随行人员拿一张椅子，朱德同志看完一个板面后，又看第二个版面，随行人员就把椅子拿到第二个版面下，请朱德同志坐下细看，如此轮回，一直到看完为止。当朱德同志看完刘展的全部内容以后，对筹委会领导同志说，刘介梅这个展览很好，但气魄不大，还要继续加工，力求把规模搞得大一些，刘介梅同志忘本回头的内容还要充实一些，……。朱德同志审查了刘展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在北京人民文化宫接见了刘介梅同志，对他进行了教育，并嘱咐工作人员，要刘介梅同志看一看北京，看一看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各项建设成就。

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刘展筹委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又忙碌起来了。刘介梅同志是10月初来北京的，到此时就住了二十多天，他本人想回家。为了进一步做好刘介梅同志的思想工作，中央办公厅通知黄冈县委派宣传部长周伯辰到北京做刘介梅的思想工作。周伯辰部长到北京后，一方面与刘介梅谈心，要求他放心地住下来，配合展览作好工作，另一方面帮助他学习提高，进一步深挖忘

本的思想根源和回头的思想斗争经过。中央刘展筹委会这时不断地给黄冈县打电话，要求黄冈县为刘展会提供所需的材料。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于11月6日在北京人民文化宫开幕。这天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苏联驻京记者来展览会采访，后来苏联《消息报》上专门发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开幕的长篇报道，并刊登了刘介梅的照片。经过深加工后的刘展，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了慎重起见，对外开展前，首先由副部级以上干部集体参观、审查；第二步是邀请有关专家参观鉴定；第三步是请中外记者参观。在得到各方的好评之后才开始对外展出。

从11月6日开展起，到1958年5月6日结束，刘展在北京展出时间达半年之久，北京市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按签到簿统计）达70多万人，社会反映良好。我先后向《湖北日报》社寄发了情况报道，特别1958年5月，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长篇报道，发表在《湖北日报》的第二版上。

（七）

为了扩大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在中央刘展筹备会的领导下，我们还开展了以下一些重要活动。

第一、举行报告会。具体是由中央统一安排，刘介梅同志作《我思想上的革命》的报告。第一场报告会是在人民日报社（北京王府井大街）礼堂，向全体报社同志作报告。刘介梅同志报告的内容跟武汉洪山礼堂的报告一样，由于他本人不会讲普通话，有许多方言土语要在报告中经常作解释，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听后反映是满意的，但时间太长，内容不精炼。根据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的

意见，我们对刘介梅的报告进行了加工，突出了重点。报告内容、层次定型后，所需时间一般都在两个半小时左右。文化部、教育部两家联合举行了一次报告会。最受感动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报告会。当时气温极低，天下着鹅毛大雪。因师生人数较多，除主会场能容纳1000多人外，学校安排了多个分会场。师生们为了看到刘介梅的形象，顶着鹅毛大雪，在主会场门前听报告。有的人几乎成了雪人仍在那里站着听，直到报告讲完，见到刘介梅同志才离开。刘介梅同志在北京共作了20多场报告，听众达15万人之多，反映效果良好，就连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听了报告后说："刘介梅同志的报告，不仅教育了青少年一代，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听了，也受益不浅啊！"

第二，是拍摄和放映刘介梅新闻记录片。在北京人民文化宫展览大厅的左侧旁，有一排很长、很大的平房，在这里放映刘介梅的新闻纪录片。人们看了展览后，又可以去看刘介梅的纪录片。此片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于9月中旬在黄冈县实地赶拍的。记得1957年9月中旬，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派了6名技术人员，由县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陪同到刘介梅同志家乡拍摄电影。其内容是刘介梅家庭情况，刘介梅所在的出产情况，刘介梅一家全部生活情况，以及黄冈县开展刘介梅思想转变大讨论效果的情况。全片放映35分钟。

第三，《北京晚报》连载章回小说《刘介梅》。《北京晚报》在刘展对外展出期间，连续发表著名章回小说作家端木良同志的小说《刘介梅》。在半年的展览中，该晚报连续转载30多回。由于《北京晚报》发行量大，对北京市来看展览的人们教育作用很大。

第四，出版刘展图片册。刘展在北京对外展出不久，正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各省、市负责同志参观了刘展以后，震动很大，都纷纷向党中央提出要求，请求刘展搬到各省、市展出。当时的情

况是难以满足各地的请求，为此中央宣传部研究决定，将刘展全部版面和实物拍成照片，再精制成刘展图片册，向全国各省市发行。据当时负责这个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讲，刘展图片册共发行5000万册。

第五，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加大了对刘展的宣传力度。在刘展展出的前后，北京各大报纸，地方各级报纸均转载了刘介梅思想转变的文章，特别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撰写的报道，评论性文章最多。如《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在刘展开幕之后，登出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性文章。刘展在北京开幕以后，人民日报有两名记者专门负责报道，《中国青年报》不仅报道了刘展的情况，还报道了黄冈县“四无垸”的事迹。此间《人民日报》社还派了两名记者到黄冈县实地采访。这两名记者中有一名是黄冈县樊家楼人，名字叫林晰。他们到黄冈县上巴河区刘介梅的家乡采访农村两级分化的情况。在《人民日报》社两名记者未来黄冈县采访以前，县委宣传部已组织有关人员作过类似的调查，并写有调查材料，他们根据现有的调查材料又进行了三天的调查采访，写出了长达4800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

第六，以刘介梅忘本回头为题材的戏剧纷纷创作演出。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典型事例，通过展览会、报告会、报刊宣传报道后，戏剧界认为此典型是戏剧的最佳题材，于是各种剧种的剧本纷纷编写出来。最先是黄冈县文化馆戴凤林同志写出了一个短剧，题目是《刘介梅忘本回头》，发表在当时的湖北省的文艺刊物《布谷鸟》上。随后有湖北省话剧团、武汉市汉剧团、武汉市楚剧团纷纷来黄冈县实地采访、座谈。他们先后编写《刘介梅》剧本，1957年9月下旬至10月份，武汉各大剧院争相演出《刘介梅》。演出效果很好，场场爆满。在北京市也(1957年11月份至1958年的5月份)出现全城争演新剧《刘介梅》的喜人局面。开始是由北京评剧团演出的评剧《刘

介梅》。该团由著名演员新凤霞和张德福主演刘介梅和刘介梅的妻子张雪梅。评剧艺术家们对演出《刘介梅》非常认真，为了演好此剧，评剧团的导演、主要演员新凤霞、张德福等专程到刘展工作人员住地，请我和陈仲莱同志座谈刘介梅同志家庭成员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等。并邀请我们去该团观看他们的彩排，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北京市第一家开始演出刘介梅的剧团。1958年2月底，湖北省话剧团来到北京，首先到展览会找到陈仲莱和我，后经文化部指定，由当时的中国文联负责接待安排。第一场彩排性演出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该剧院是当时北京市最有权威性的剧院，负责审查剧目的是最负盛名的老作家老舍先生，还有一些在京的著名戏剧家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彩排演出结束后，老舍先生接见了主要演员、编导和我们刘展人员。老舍先生充分肯定了话剧《刘介梅》的思想性、艺术性，他指出："话剧《刘介梅》演出很成功。并祝湖北省话剧团在京演出成功。"自此以后，话剧《刘介梅》在京轰动，湖北省话剧团就忙碌起来了。每天安排二至三场，先后在北京天桥剧场、政协礼堂等十多个大型剧场演出，场次都由北京市文化局负责安排。湖北省话剧团按其级别来说，在北京只能算二三流的剧团，如果不是演出《刘介梅》，是根本进不了北京的，更谈不上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样高品位的场所演出。在北京的三个多月里，他们共演出100余场。该团负责人对我们说，此次进京演出，获得了政治、经济双丰收。1958年5月刘展搬到山东省济南市展出时，湖北省话剧团随刘展会到了山东省，该团先后在济南、青岛等地演出《刘介梅》多场。山东省京剧团趁刘展在济南市展出时，也排演了京剧《刘介梅》。在首次演出时，省、市委负责人出席观看，该团也请了刘展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观看演出，刘介梅、陈仲莱和我也都参加了。

第七，《刘介梅》连环画册出版。为了配合刘介梅思想转变大讨论的宣传，由武汉市美术协会和黄冈县报副主编李汝舟，根据刘展

的内容，将其绘制少年儿童阅读的连环画册，湖北省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年底出版发行。这本连环画册故事性很强，感染力大，给少年儿童教育作用大。

第八，《刘介梅》电影片拍摄成功。1958年10月，电影《刘介梅》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毕，并由中国影片公司向全国发行拷贝。这是解放以来(1949—1958)，用真人真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在拍《刘介梅》电影中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开始中央定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刘介梅》，导演定为电影界著名导演吴天。记得一天上午，吴天同志自报家门地找到了我和陈仲莱同志，提出协商拍摄电影《刘介梅》的有关事宜。其一是定剧组人员问题，我们认为，剧组可定湖北省话剧团，吴天同志不太同意，他说，湖北省话剧团演员阵容不行，而且普通话都说得不纯正，只能由北影来承担。当时北影正在山东枣庄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吴天同志说，当铁道游击队一拍完，原班人马就到武汉拍《刘介梅》。无奈，我们就同意导演吴天同志的意见。为了进一步修改好剧本，湖北省话剧团团长许伯照夫妻俩被邀请到北影，将《刘介梅》话剧改编为电影剧本。以后为了更快地把《刘介梅》拍摄出来，中央领导就指示以湖北地方戏——楚剧来拍《刘介梅》，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武汉市楚剧团来完成。正当刘展在山东省济南市展出期间，武汉市戏曲工作室两名编导带着楚剧团的本子从上海来到山东济南，找到陈仲莱、刘介梅和我，同我们一起讨论楚剧电影剧本的内容，经几天的讨论研究，最后把电影《刘介梅》剧本定下来了。通过来人，我们才知道，由话剧改为楚剧，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改为上海海燕制片厂拍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定的，剧本要征求刘展负责人和刘介梅本人的意见也是周扬同志指示的。刘介梅同志参加审稿讨论时，也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我的错误很大，但没有你们写的这么多。"两位编导听后感到很为难，就求陈仲莱同志和我，当着刘介

梅的面把能删的东西删掉了一些，刘介梅才算答应了。关于电影在艺术处理上有些加工的，有些提高地方，我就向刘介梅作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懂得了这个道理后也就同意了。第三天两位编导离开济南赶赴上海。大约在1958年5—6月份，楚剧《刘介梅》的电影拍摄成功了，拷贝的发行量打破了历史纪录。

（八）

1958年5月，因山东省委的强烈要求，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刘展在北京停展，全部展品和有关工作人员赶赴山东省展出。1958年5月7日，刘展离开北京，乘火车奔向山东。这次展出是由山东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争取第一展览点。当时邓小平同志的批文是："同意先在山东，以后再听中央安排。"当时铁路运输还处于繁忙时期，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得知刘展要到山东展出的情况后，当即作出决定：不准铁路沿线压运刘展车皮。由于刘展经北京的加工扩大，全部展品装了两个车皮。刘展在北京展出结束后，原来的筹委会自动撤销，这时由我任刘展会工作队队长，北京刘展会的讲解员20人（其中武汉市有4名）都一同乘车到济南。5月7日夜10时，刘展工作队全体人员在北京天桥车站上车，北京刘展筹委会负责人及北京市讲解员家属到车站送行。当时场面极为热烈，人们心情异常愉快。

5月9日早晨，我们到达了山东省会济南市，受到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济南市委宣传部两位部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欢迎。在交谈中得知济南市委宣传部叶部长是湖北省汉川人。见面时，叶部长握着我的手说，家乡的客人请到了。并得知刘展会的全部展品已经运到了，早已搬到即将展出的地点——山东省委招待所（珍珠泉）。刘展会全体工作人员吃住也在珍珠泉招待所。为了争取早日

展出，5 月 11 日就开始培训当地的讲解员（因为从北京只带来部分讲解员和每部分负责人）。刘展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由济南市委宣传部调来一名处长和两名科长负责。新调来的讲解员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高中文化程度，行政享受 20 级的机关干部。经过一边培训，一边布置展品活动，他们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基本符合对外展出的要求。5 月 15 日，刘展会在山东省济南市珍珠泉正式开幕了。第一天，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同志都来参观了。从此每天参观人员络绎不绝，每天接待万余人。山东省、市各大报纸、电台报道刘展展出盛况的文章连续不断。山东省《大众日报》社领导、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提要求请刘介梅同志来山东，由刘口述，叫我记录，写出文稿在他们报纸上发表。在山东展出共计 70 天，观众人数达 50 多万人。

刘介梅同志在北京只呆了两个多月（1957 年 10 月初至 12 月初），因为当时北京气温很低，经常是在零下 20 度左右，最冷达零下 27—28 度。刘介梅怕冷，就提前回黄冈了。刘介梅回到黄冈后，中共黄冈县委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加强培养教育刘介梅同志的指示，于 1958 年 3 月送他上省委党校文化班学习。刘展开幕以后，山东省委与湖北省委联系，要求刘介梅赴山东一趟。这样，刘介梅于 6 月上旬，由湖北省妇联主任送到山东济南（省妇联主任未下车，到青岛开会）。一天晚上，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我的陪同下乘车到火车站迎接刘介梅同志。他被安排住在省委招待的新贵宾室。第二天，省委书记舒同及其他领导在招待所小客厅设宴招待刘介梅，我和陈仲莱同志都参加了宴请。宴会上，省委书记舒同提出请刘介梅在山东各地作报告。刘介梅同志欣然答应了。自此刘介梅同志就忙起来了，他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先后在济南、青岛、烟台、曲阜（泰山地委）作了 50 余场报告。在曲阜县作报告时，该县广播台向全地区人民群众作现场播出，听众无法统计。

刘介梅同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每场报告都讲得生动感人，给群众教育的效果很好，多次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称赞。刘展在济南市展出结束时，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叶部长代表省市委领导送行时说："这次感谢党中央的关怀，感谢湖北省的支持，感谢刘介梅同志亲临山东，为山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共湖北省委要求刘展回湖北展出。于是我们在7月25日从济南出发，乘火车向武汉方向进发。当我们一行到达江苏徐州市转车时，时间已是深夜，徐州市委早已派人在车站等候着。当我与来人接洽时，确实如此。这样来人将刘展的全体工作人员接到中共徐州市委办公室。市委书记对我们说："我刚从南京开会回来，听工作人员讲，《大众日报》发的消息说，刘介梅同志经过徐州的时间，所以我派专人守候。果然把你们接来了，既来之则安之，请你们在这里休息几天，并请刘介梅同志向我们干部作几场报告。"徐州市委的盛情难却，刘展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徐州呆了一个星期，刘介梅同志作了12场报告。

8月2日，刘展全体工作人员和刘介梅同志一道，从徐州登车回湖北。当时正值黄河汛期，洪峰恰到，火车不通，被迫停在郑州车站。当时车站旅客很多，无法买到车票。当铁路工作人员得知是刘展和刘介梅等同志到达车站，并急请买票转车时，他们答应再挂一列车皮。我作为刘展会工作队长就下车到郑州火车站办公室办理车票签证手续。正当我到达车站出口处，就有人高声叫喊："哪位是刘介梅同志？"我看到那人在不停地叫喊着，就上前问清情况。原来是河南省委从《徐州报》上看到刘介梅同志一行从徐州前往武汉的消息。从徐州到郑州必须办理车票签记手续，为了找到刘介梅同志才派专人到车站等候。前来迎接的是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们一行十几人就被接到河南省委招待所。第二天，省委书记接见

了刘介梅同志，请刘介梅在郑州作报告。自此，我们在河南省委热情的接待下，在郑州市住了20天，刘介梅同志作了30多场报告，听众达20余万人。

8月28日，刘介梅同志及刘展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回到武汉，大家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在中苏友好宫重新布置展品。此时，刘介梅同志放假回家。9月3日，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又重新展出。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副书记张平化，省长张体学，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及省市主要领导同志对刘展重新展出进行预审参观，评价很高。自此，武汉市又再一次出现参观刘展会的热潮。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的内容，刘展会还印制了宣传提纲。刘介梅同志于9月中旬赶到武汉，他先后在省、市直属机关单位、学校、工矿企业作了30多场报告，效果反映良好。

为了刘展会下次赴南京、上海等地展出，陈仲莱同志根据省委宣传部的指示，专程赴南京、上海等地组织刘展筹委会，后因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的高潮来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武汉展出后就停止了。自此就再也无人提到这个展览会。1959年以后，刘展会的全部展品都交给湖北省博物馆保存。

□吴子勋 口述
万学华 整理

后　记

《黄冈文史资料》第一辑已经付梓，这是市政协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文史资料书籍，为今后进一步做好文史工作开了一个头。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有益今人，惠及后人”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此，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学习、去研究，努力争取把这一工作做好。在征集、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了两个问题：一是撰写资料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区别于其它史料的显著标志。我们理解，“三亲”不是单纯的个人回忆录，撰稿人既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又讲包括调查、采访、座谈整理出的材料。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三亲”特色，所记的资料也不致于偏颇。二是资料的真实性。真实是文史资料的命脉，是第一位的，可读性应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使文史资料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本书在这些方面多花了一些功夫，但做得还不够。限于能力和经验，本书在编辑工作中，难免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热情盼望有关方面、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去批评、指正。

本书问世，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热忱支持和鼓励，还得到市直有关单位和黄州区、团风、红安、麻城、浠水、罗田、英山、蕲春、武穴、黄梅等县、市政协文史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编　者

1998 年 10 月 31 日